

# 中华民族共同体语境下四川民族地区中小学师德涵养研究

谭 勇

(中共成都市双流区委员会党校,四川成都 610299)

**[摘 要]**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德政工程。发展教育、建设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是民族地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旨在进一步加强国家教师队伍建设并缩小东部、中部、西部教师队伍质量差距,但依然存在一些短板和“顽疾”。四川作为教育大省,具有幅员辽阔、民族众多之特征。在中华民族共同体语境下涵养民族地区优良师德师风,才能筑牢民族地区教育发展之基。本文立足民族地区中小学师德发展困境,探讨民族地区中小学师德涵养对策,以期为民族地区教师高质量发展增能赋力。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四川民族地区;中小学;师德

**[作者简介]**谭勇(1981—),女,四川成都人,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法学硕士,研究方向:党史党建理论及思想政治教育。

**[基金项目]**本文系四川省成都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新时代统一战线文化创新研究基地”研究课题“中华民族共同体语境下四川民族地区中小学师德涵养研究”(项目编号:TZWC202322)。

**[DOI]** <https://doi.org/10.62662/kxwxz0210001>

**[中图分类号]** G40-05

**[本刊网址]** [www.oacj.net](http://www.oacj.net)

**[投稿邮箱]** [jkw1966@163.com](mailto:jkw1966@163.com)

2014年,在北京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提出要“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要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把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作为战略任务来抓”。党的十九大明确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进了党章。之后,在2021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准确把握和全面贯彻我们党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重视民族工作是党一直以来的传统。十八大以来,我国积极开展各项民族工作,各民族围绕共同体绘就同心圆,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识经历了由“积极培养”到“铸牢”的重要转变,“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了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主线,切实体现了党和国家对民族问题的认识已经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相关研究综述

近年来,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党和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措施。学术界纷纷围绕此主题,进行了大量的、深入的相关研究。

从横向来看,主要以当代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

的多民族融合模式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为基础。这类研究将中华民族共同体逐一解构为五个共同体,即政治共同体、经济共同体、文化共同体、社会共同体和生态共同体。其中每个共同体都是研究和探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所在。从纵向来看,回望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大致经历了萌芽、发展及完善三个过程。查阅相关文献,发现这类研究大多采用了追溯历史的方式,通过此方式来阐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及发展过程。其中,有部分学者将它划分为“自在—自觉—自为”三阶段。从国内外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度来看,学术界普遍认为在当前全球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的民族工作仍面临着严峻挑战,具体表现为:国际上,部分西方国家试图利用人权作为幌子,企图破坏我国的社会秩序并干扰民族宗教政策的实施;国内来看,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带领全国各民族奋勇前进,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呈现出突飞猛进的态势,然而,与内陆或沿海的发达地区相比较,差距依然明显。这种差距极易导致国人心态失衡。学者周平教授就指出“这种心态的失衡一旦针对或指向国家、政治或政策,就有可能导致国人对自身民族认同的削

弱、侵蚀或消解,乃至对国家认同、民族认同产生消极影响”。

尽管目前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相关研究越来越多样化,但国内外专家、学者甚少从历史的维度来探讨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问题。因此,以建党百年为时间线分别研究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历史时期的民族工作相关政策及其演变历程,据此深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逻辑,以便从制度、体制、机制的视角研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策略,是民族工作研究的新指引。

总而言之,既要客观认识现有研究的重大意义,又要正视高质量发展征程中实现和增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所面临的新挑战。

## 二、发展四川民族地区教育是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语境的关键

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是习近平总书记基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历史与现实,着眼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锚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目标,提出的科学、完整、系统的理论体系。它是各民族长期交融的结果,也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维的实体。新时代,各民族地区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全面消除了绝对贫困,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和资源分配不均等矛盾依然存在且凸显,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仍然呈现相对滞后特征。

加强民族地区经济建设,努力补齐经济不平衡的短板,教育工作尤为关键。正所谓教育是民族复兴和国家强盛的基石和根本。四川民族地区作为多民族聚居地,其教育事业的发展不仅关系到当地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更对实现民族团结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语境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推动教育发展也是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 三、四川民族地区中小学师德发展困境

四川作为农业和教育大省,因其广阔的土地与多元的民族构成而独具特色。基础教育作为国家教育体系的核心支柱,肩负着培育社会主义建设者与传承者的重任,承载着家庭与社会的厚望。常言道“教育兴则人才旺,人才旺则国运昌”,因此教育的发展关系国家强盛。教师队伍是推进教育事业的核心力量。良好的师德是高素质教师队伍的重要标尺。少数民族地区的中小学教师尽管普遍具备高尚的职业道德和奉献精神,但受制于资源配置的不均衡,面临硬件设施相对落后以及学科分布不平衡等问题。加之,西部农村部分县、乡财政困难等原因,导致教育相对落后。为推动四川民族地区基础教育的发展和进步,必须加强四川民族地

区中小学师德建设工程。目前,四川民族地区中小学师德发展面临多方面的困境。

首先,在四川民族地区,位于边远山区且交通不便、经济相对落后、教育资源相对匮乏、非本地教师的生活习惯难以适应等因素都有可能影响教师的职业满意度和投入度,从而对师德产生影响。其次,现有的教育考核评价机制往往以升学率和成绩高低来评价学校和老师的工作成效,导致“重智育,轻德育”的现象比较普遍。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师德素养的地位,使得一些教师可能更加关注教学成绩而忽视了自我修养的提升。此外,在多元文化背景之下,四川民族地区中存在着不同民族之间文化、观念及价值观的较大差异。这使得在师德涵养中还需要更加关注跨文化的交流、融合,把尊重传承各民族优秀文化纳入考量范畴。

## 四、四川民族地区中小学师德涵养对策

2014年第30个教师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师范大学时,在勉励广大师生的讲话中强调,要做一名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四有”好老师。教师作为“教书育人、塑造价值观、培育时代新人”的主力军,其职业特性就决定了教师的师德规范在教育全域中的核心作用。在教育教学改革不断深化的今天,师德规范更应发挥其“紧箍咒”的作用。

### (一)营造崇德向善的师德环境

在党的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针对科教兴国战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关键在于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更在于培育高素质教师队伍,并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气。

### 1. 强化尊师重教的社会认同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期,市场经济背景之下价值观呈现多元化的趋势,这对教师职业产生了一些冲击。受不良社会风气影响,部分民族地区中小学教师出现职业认同危机,乃至出现一些师德失范行为。因此,亟需通过广泛宣传,稳固教师职业的崇高地位,让全社会深刻认识到教师的职业价值及社会贡献,鼓励更多优秀人才投身教育事业、奉献教育事业。

### 2. 构建正面积极的舆论生态

公正、客观的舆论环境是教师职业道德健康发展的基石。媒体作为公众了解教师的重要渠道,应承担起正向引导社会舆论的责任。一方面,要避免过度神化教师职业,减轻教师的职业压力;另一方面,要防止师德失范行为扩大化,以免影响教师群体形象。通过构建积极向上、客观公正的媒体环境,赢得全社会对教师职业的尊重与支持。

## (二)完善师德管理体系

建立及完善师德管理机制,是推进师德建设的重要保障。

### 1. 强化社会监督,构建多元监督体系

伴随教师队伍日益庞大,对教师的监督与管理也需要与时俱进。民族地区应建立起包括政府、学校、家长、学生及社会各界在内的多元监督体系,对教师的教学行为、师德表现等方面进行全面监督。同时,要加大对师德违规行为的惩处力度,提高违规成本,形成有效的震慑作用,以警醒教师们保持清醒与警惕,具备底线思维和红线意识,洁身自好,时刻不忘自己的教师身份,永葆教育初心。

### 2. 优化师德激励机制,激发教师内在动力

师德激励机制是提升教师职业道德水平的关键抓手。民族地区应结合实际情况,制定切实可行的激励措施。一方面,注重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的有机结合,通过提高教师待遇和福利水平、拓宽职称晋升渠道、提供科研支持等方式,满足教师的合理需求;另一方面,加强情感激励与榜样激励,关心教师的生活与工作,树立身边的师德楷模,传颂师德楷模典型事例,引导教师对标看齐,提升自我道德修养。

## (三)提升教师自我修养

提升自我修养,激发教师内在驱动力,是师德建设的重要内容。当前,教师提升自我修养的途径主要有:

### 1. 强化理论学习,明确师德要求

“育人为本,德育为先”是教育工作的根本要求。2019年我国出台了《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师德师风建设的意见》,该文件为教师的师德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民族地区教师作为教师群体的一部分,需深入学习领会党的教育方针和师德规范,明确自己的职责与使命。只有通过不断加强政治理论学习和师德教育培训,提高自身的政治素养和道德水平,才能担负教书育人的重任,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贡献力量。

### 2. 提升专业素养,强化师德自律

教师作为知识的传播者和学生成长的引路人,必须具备高尚的职业道德和扎实的专业知识。民族地区教师应不断加强自身学习,提升专业素养和教学能力。随着专业素养的不断提升,教师在教育教学中的表现也会更加出色和自信。这种自信和出色的表现会进一步激发教师的职业热情 and 责任感,从而促使他们更加自觉地遵守职业道德规范、提升自己的师德水平。此外,还要加强师德法律法规的学习与遵守,做到知法守法、依法执教,坚持立

德树人。

## 3. 夯实信息化手段,提升师德素养

随着“互联网+”被确立为国家战略,其迅猛发展的浪潮重塑了教育领域。推广信息化手段是提升教学能力的其中一部分。这些信息化手段运用在规范教师师德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如:

### (1)提供师德教育平台

利用信息化手段开发师德教育的在线课程。在线课程可以涵盖教师职业道德、法律法规、教育心理学等理论内容,也可以涵盖一些典型案例。教师可以通过网络平台自主学习、在线讨论等形式,引发反思,从而树立正确的职业道德观念,提升自身师德修养。

### (2)建立师德评价体系

利用信息化手段建立学生评价及同行评价系统,让学生匿名对教师的教学态度、师德表现进行评价,鼓励同行教师之间相互评价。这些评价方式能够客观、全面地反映教师的师德状况,为教师改进工作提供依据,也为教师的职业发展提供指导。

### (3)加强师德监督与管理

利用信息化手段建立教学管理系统并生成师德档案,对教师的教学行为进行实时记录。通过数据分析,可以及时发现并纠正教师的不当行为。生成的师德档案,记录着教师的师德表现、奖惩情况等信息。它可以作为教师晋升、评优等方面的重要依据,激励教师自觉遵守职业道德规范。

## 五、结语

强国必先强教,强教必先强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提升教师教书育人能力,健全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2024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又进一步强调“将师德师风和教育家精神融入教师教育课程和教师培养培训全过程”。党中央这一系列文件明确了师德师风建设的重要地位,聚焦民族地区师德师风涵养,助推教师队伍建设任重道远。

## 参考文献:

- [1]黄明涛,刘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十大方法与路径——基于相关文献的研究述评[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23,25(1):17-31.
- [2]娜仁琪琪格,王树荫.习近平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论述及现实意义[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22(3):20-27.
- [3]保虎.中国共产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程及经验启示[J].民族学刊,2022,13(12):49-58,151.
- [4]陈海燕.立德树人背景下高职院校师德建设研究[J].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2025,38(8):62-64.

- [5] 向东. 面向自我:何以成为教师师德塑造的根本保证[J]. 教育科学文献,2025,2(5):189-193.
- [6] 严庆,郭雨晨. 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构建的思考[J]. 西北民族研究,2024(2):5-17.

- [7] 米仁豪,杨陈. 民族地区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的法律路径[J]. 中国军转民,2023(22):98-99.
- [8] 傅维利,于颖. 教师职业道德的独特品性及其价值实现[J]. 教育研究,2019,40(11):151-159.

## Research on the Cultivation of Teachers' Ethics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in Ethnic Areas of Sichuan within the Context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TAN Yong

(Party School of the Shuangliu District Committee of the CPC, Chengdu Sichuan 610299, China)

**Abstract:** Education is a crucial cornerstone for national rejuvenation and social advancement, as well as a virtuous governance undertaking that will bring benefits to both the present and future generations. Developing education and building a team of high-quality professional teachers are important ways to achiev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ethnic areas.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state has issued a series of policy documents aimed at further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teachers and narrowing the quality gap between eastern, central and western teachers.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some shortcomings and "stubborn diseases". As a large province of education, Sichuan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vast territory and numerous ethnic groups. Only in the context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can we cultivate teachers' excellent ethics and styles in ethnic areas to buil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in ethnic areas.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predicament of teachers' ethics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in ethnic area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ountermeasures to cultivate teachers' ethics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in ethnic areas,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eachers in ethnic areas.

**Key words:**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Sichuan ethnic areas;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teachers' ethics

# 中国云南省贫困大学生逆境信念与创业意图的关系研究:兼论性别之影响

罗祥奇<sup>1</sup>, 柏雪艳<sup>2</sup>, 李 磊<sup>3,4</sup>

(1. 云南新兴职业学院医学康复学院, 云南昆明 650217; 2. 云南新兴职业学院工程学院, 云南昆明 650217; 3. 赣西科技职业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中心, 江西新余 338099; 4. 马汉科理工大学国际学院, 泰国曼谷 10700)

**[摘要]** 创业是振兴经济的核心, 但中国云南省大学生的创业意图却很弱, 特别是贫困生群体。而在逆境中的信心是促进大学生创业的关键, 因此, 借助三元交互决定论, 研究了中国云南省贫困大学生逆境信念与创业意图的关系, 以及性别的差异性影响与调节效果。本研究以中国云南省 2 所高校的贫困大学生为研究对象, 使用虚拟问卷、立意抽样法收集样本, 共回收问卷 501 份(有效率 83.033%)。结果表明, 中国云南省贫困大学生的性别使得逆境信念存在显著差异性; 逆境信念与创业意图呈正向关系; 性别有促进作用。

**[关键词]** 贫困大学生; 逆境信念; 创业意图; 性别

**[作者简介]** 罗祥奇(1991—), 男, 云南德宏人, 云南新兴职业学院助教, 硕士, 研究方向: 医学生技能、数字国际学习。柏雪艳(1990—), 女, 云南曲靖人, 云南新兴职业学院助教, 硕士, 研究方向: 护生未来综合能力与价值观发展。通信作者: 李磊(1987—), 男, 江西鹰潭人, 赣西科技职业学院与马汉科理工大学人文社科实习研究员, 博士, 研究方向: 未来创业与虚拟学习环境。

**[DOI]** <https://doi.org/10.62662/kxwxz0210002>

**[中图分类号]** G444

**[本刊网址]** [www.oacj.net](http://www.oacj.net)

**[投稿邮箱]** [jkw1966@163.com](mailto:jkw1966@163.com)

大学生创业对于就业、可持续发展、竞争性和经济灵活性, 都是极其重要的资源。Abdulina 等人(2021)、Aykan 等人(2019)、Membrillo-Hernández 等人(2021)强调,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 大学生创业实现可持续性的发展对于各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实现成功的可持续性水平非常重要。近年来, 全球化进程促使企业寻求能够创造可持续竞争优势和价值的活动, 而大学生创业是国民经济中最重要的角色之一, 大学生们以不同的观点和创新方法进行创业实践, 并为社会带来更多活力和机会。正如 Ayalew(2021)所说, 大学生通过推动创新、改善经济结构、推动技术进步和创造新的就业机会, 对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促进经济繁荣、财富和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同时, 研究者声称, 随着商业界的变化、竞争加剧, 就业减少和劳动性质的变化增加了创业发展的重要性, 同时也推动了信息技术和服务部门的经济增长。特别是大学生创业, 为全球的创业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渠道。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大学生, 大约 3700 万,

面对如此庞大的群体, 就业和创业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此, 为了吸引和鼓励大学生创造创业和就业机会, 中国政府为支持创业提出了前所未有的、多元化的政策。此外, 创业是高校人才培养的重要模式, 在创业实践中, 大学生对商业实践和专业成果进行应用, 增强了他们的创业意识。大学生还可以通过创业进一步了解社会的需求和发展的瓶颈, 提高使命感、责任感。创新创业有助于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创新驱动的本质是人才驱动, 大学生是创新人才的重要组成部分。支持大学生创新创业, 可以为科技创新和经济转型升级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障。

而想要构建大学生创业的支持体系, 就需要关注大学生群体的信念。三元交互决定论认为个体、行为和环境因素三者之间存在相互作用, 三者之间存在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因此, 逆境信念作为个体因素, 受到个体行为能力和环境因素的制约, 而逆境信念(cultural beliefs about adversity)是个体对逆境本质的认识, 有利于学生适应能力的提升。相对而言, 逆境信念还能抑制问题行为与抑郁的发

生。正如 Shek 等人(2003)所言,积极逆境信念认同程度越高的青少年,其心理健康状况和环境适应能力越好,问题行为越少。创业意图(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s)则反映个体将为实施创业行为所做的努力。此外,研究发现,信念对创业意图有显著正向影响,而逆境信念与创业自我效能的内涵类似,两者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生长环境。正如 Zhang 和 Huang(2021)所言,与创业相关的信念是创业意图的主要前因,换言之,信念的有效性可以提高大学生的创业努力。然而,目前尚无关于逆境信念与大学生创业意图的研究先例,在中国云南省范围内更是从来没有被研究过。正如 Chatak 和 Bhowmick(2022)所言,探索不同群体的创业意图前因,对当地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另一方面,逆境信念的心理特性尚未在面临逆境和创伤的个人和社区中进行评估,特别是,经济劣势的个人和家庭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因此,了解贫困家庭对逆境的看法对于研究人员、社会工作者和政策制定者制定有效的干预策略和政策来帮助家庭面对逆境至关重要。这对于研究者了解个体在面对经济约束时的价值观和态度也是有意义的。因为,当经济弱势家庭的人认为自己的生活机会是由命运决定的,而自己的贫困状况是无法控制的时,他们所感受到的无力感可能会诱发一种低成就需要、低延伸需要、高依赖需要的特定动机模式,并进一步表现出不成比例的冒险行为,对机会感兴趣、对反馈缺乏兴趣、缺乏主动性、缺乏信念和信任等行为结果。相反,对逆境有积极信念的经济弱势家庭可能会在面对逆境时建立起弹性,奋发图强。因此,研究逆境信念选择在贫困背景下测量大学生逆境信念的心理测量特性是至关重要的。正如 Ibidunni 等人(2020)所说,企业家精神研究作为摆脱大多数发展中经济体中明显存在的贫穷恶性循环的途径,正日益受到重视。不可否认,它作为一种概念是一种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实际办法,而可持续发展一直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目标。而中国由于其庞大的地域性特征,经济充斥着许多社会经济问题,包括贫困、收入差距、高失业率和不利的商业环境等,阻碍了公民培养创业意图。正如谭成明和谭红梅(2022)声称的,近年来,全球失业率不断上升,尤其是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年轻人被认为是受影响最大的群体,这一直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然而,马永霞和孟尚尚(2022)指出,创业被认为是解决青年失业和低生活水平的可行方案,这点对于处于中国的云南省同样重要。所以,这也是本研究选择中国云南省贫困大

学生作为研究群体的原因。

此外,云南省是中国的西南部省份,寻找激发云南省大学生创业的潜在前因有很大的研究价值。正如研究者所描述的,中国云南省的大学生创业是重振区域经济、发展未来活力的重点源泉。然而,事实上云南省的经济依然相对滞后,人均收入过低,这都亟需更多的创业以刺激经济的活力。正如李忠岷等人(2022)所说,评估中国云南省大学生的创业现状对未来经济是至关重要的。而大学生创业可以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之一,也可以成为技术创新和新兴产业发展的动力。另一方面,如何使贫困大学生群体在未来实施创业活动,也是非常重要的,但贫困大学生群体是容易被忽视的一个重要群体。然而,开展高校贫困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是推进教育公平,实现教育强国,以及培育社会主义时代新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任务。但是受不同区域经济条件制约,贫困大学生创业遭受阻力较大,成果并不突出。因此,有必要对影响中国云南省高校中的贫困大学生创业意图的因素进行探索,以明确影响它的主因,从而有效地发展云南省的未来经济。

综上所述,本研究将探讨贫困大学生逆境信念与创业意图的关系,为高校创业教育提供理论见解。目前,部分学生会选择自己创业而不是毕业后找工作。通过对中国云南省贫困大学生逆境信念与创业意图关系的研究,可了解大学生个体认知、行为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还可将其作为创业教育、咨询服务的依据,以提升创业的准确性。同时,中国云南省高校可以将研究贡献融入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以更好地培育他们的创业能力,营造积极的创业环境,提高创业实践的成功率。

## 一、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 (一)三元交互决定论

逆境信念与创业意图联系起来的理论框架由 Bandura(1986)的三元交互决定论提供,它可以解释行为是如何被相关条件塑造和影响的。本研究将考察个体认知和行为之间的动态的交互作用,即认知对行为的影响是潜在的。认知与行为因素是相互决定的,信念正向影响个体行为。因此,认知和行为是相互决定的。基于此,本研究将逆境信念视为个体认知,将创业意图定义为行为,考察逆境信念与创业意图的关系。

此外,研究表明,自我效能对创业意图有正向影响。因此,本研究推论,同样作为认知的逆境信念与创业意图具有关联性。此外,创业意图被描述为一种行为倾向,是个体想要成为创业者的倾向。

而逆境信念则被定义为个体对逆境本质的认识,是一种积极的认知。因此,本研究将逆境信念视为个体差异,将创业意图定义为行为,并考察两者的关系。因此,本研究提出一个可行的研究框架,这或可为提供更多对三元交互决定的解释力带来可能性。

## (二) 逆境信念

逆境信念起源于压力与应对研究,几十年以来,对压力和应对的研究增强了对人们如何在各种情况下应对压力以及压力对个人身心健康的影响的理解。应对通常被定义为:一个人不断改变认知和行为努力,以管理特定的外部或内部需求,这些需求被评估为消耗或超出了个人的资源。在过去,应对研究主要以问题关注型应对和情绪关注型应对为主。然而,最近人们对研究压力过程中以逆境意义为中心的应对方式越来越感兴趣,研究人员开始更加努力地了解人们如何将逆境意义归因于不利环境以及这种意义解释如何影响结果。而根据O'Connor(2003)的观点,逆境意义既不是情境所固有的,也不是个人所固有的,而是在个体理解情境的过程中被理解的。因此,以逆境意义为中心的应对被广义地定义为在消极环境或逆境中寻找积极逆境意义的认知应对策略。在文献中,已经确定了个人以积极和建设性的方式重构逆境的两种主要方式:意义建构和利益发现。逆境意义建构是指对不良事件做出相对良性解释的认知策略,而利益发现则涉及从创伤或逆境的经历中识别利益或吸取教训。

此外,逆境也被认为是与不幸、创伤、痛苦、困难或悲剧事件相关的艰难或痛苦的状态。而逆境通常与发展和环境风险、弹性,以及应对机制相关。从广义上讲,面对逆境的应对有三类:以评价为中心的应对、以问题为中心的应对和以情绪为中心的应对。然而,研究的重点放在后两类,以评价为中心的应对在文献中常被忽视。直到最近,研究人员才开始关注人们如何解释逆境的含义,以及这些解释如何影响个人行为。因此,Pan等人(2008)将逆境信念描述为中国学生在东道国社会的生活和学习中所经历或正在经历的困难或压力源。此外,它还被描述为个体对逆境本质的认识,是一种积极的认知。

## (三) 创业意图

为了加深对个人创业动机的理解,创业研究越来越关注意图理论。创业意图被定义为一个人有意识的意识和信念,即他/她打算发起一个新的商业冒险,并计划在未来这样做。创业研究中意图也

涉及成为自雇人士和收购企业的意图。Lortie和Castogiovanni(2015)增加了机会识别、创新或形成联系等在创业意图方面的内容。目前的文献中,假设创业意图包含影响创业行为的激励因素。创业意图源于心理学的一个基本概念意图,文献中有多种意向的定义。Ajzen(1991)将意图定义为人们表现出执行期望行为的动机的程度。

研究人员将个人在正式创业之前所采取的初始创业行动等同起来,包括撰写商业计划、搜索信息、寻找建筑或设备。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研究者将创业意图定义为潜在的企业家对是否开始创业活动的态度;它是企业家的一种精神状态,目的是创造一项新业务或为现有组织增加价值。创业意图则反映个体将为实施该创业行为所做的努力。从概率的角度来看,也有研究者将其视为个人未来创业的可能性。陈露(2017)则认为,创业意图是一种行为倾向,是人们想要成为创业者的倾向。类似的还有,Lu等人(2021)将创业意图定义为个体未来选择创业的心理倾向。创业意图是创业过程中的一个前因素,它可能导致个人创建和管理新企业。

## (四) 性别与逆境信念

Ozyilmaz(2011)认为,性别不平等在许多文化中以许多不同的形式存在。正如Maxwell等人(1972)所说,不同性别的人对待事物会产生不同的态度与认知、行为等。此外,Ghatak和Bhowmick(2022)发现,男性比女性更有可能在不考虑压力和失败的情况下创业。因此假设:

H1: 贫困大学生的性别使得逆境信念存在差异性。

H2: 贫困大学生的性别在逆境信念与创业意图之间有调节作用。

## (五) 逆境信念与创业意图

Wang和Huang(2019)的研究发现,大学生的创业信念与他们的创业意图呈正相关。具体来说,更强的信念使他们更积极地相信自己有能力在创业中取得成功。因此,本研究推论,随着同样作为认知因素的逆境信念的提高,创业意图会有所增强。正如Osadolor等人(2021)所言,创业信念越强的个体对自己的创业能力越有信心,未来更有可能参与创业。

逆境信念被描述为对逆境本质的认识,有利于学生适应力的提升。Shek(2004)的研究发现,对逆境的积极信念认同度较高的青少年通常有更好的心理健康和适应力,问题行为也较少。正如Jackson等人(2007)所言,逆境是应对困境的有效机制。而在家庭背景下,逆境的意义对于成员应对挑战

尤为重要。

此外,Guzman 和 Choi(2013)认为在给定的环境中,强创业信念的个体感觉世界充满了机会,而弱创业信念的个体则从成本和风险的角度来考虑世界。Krueger 和 Brazeal(1994)提出,面对困难、风险和不确定性,信念强的人更善于把握成功的机会,能更准确地预测未来,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创业任务中。因此假设:

H3: 贫困大学生的逆境信念与创业意图呈正相关。

二、方法

(一)研究模型

根据研究目的与假设构建模型,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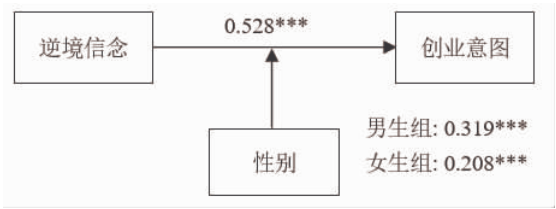


图 1 研究模型

(二)研究对象、程序

调查时间为 2024 年 3 月,以立意抽样选取中国云南省 2 所高校的贫困大学生作为样本,以虚拟问卷调查他们对逆境信念、创业意图之看法,最终有效样本为 501 份(有效率 83.033%)。

(三)衡量

逆境信念量表:李磊等人(2023)精编 Shek(2004)的工具,单因子,共 7 项( $\alpha=0.95$ )。创业意图量表:陈露(2017)设计,分为创业的倾向性( $\alpha=0.810$ )、希求性( $\alpha=0.80$ )、可行性( $\alpha=0.86$ ),3 个因子,共 12 项。问卷以 5 等衡量、自评。

三、结果分析

(一)人口特征分布

如表 1 所示,样本中有 294 人为女生,占比最多(70.673%);年级项目中,1 年级大学生占比最高,占比 37.981%。

表 1 人口特征分布

| 项目 | 分类   | n   | %      |
|----|------|-----|--------|
| 性别 | 男    | 122 | 29.327 |
|    | 女    | 294 | 70.673 |
| 年级 | 1 年级 | 158 | 37.981 |
|    | 2 年级 | 101 | 24.279 |
|    | 3 年级 | 157 | 37.740 |

(二)适配度

如表 2 及图 2 所示,SRMR=0.037,匹配度优。

表 2 适配度

| 统计检验量       | 标准          | 总模型     |
|-------------|-------------|---------|
| $\chi^2$    |             | 327.061 |
| df          |             | 148     |
| P           | $\leq 0.05$ | 0.000   |
| RMR         | $\leq 0.05$ | 0.026   |
| SRMR        | $\leq 0.05$ | 0.037   |
| RMSEA       | $\leq 0.08$ | 0.054   |
| GFI         | $\geq 0.90$ | 0.926   |
| AGFI        | $\geq 0.90$ | 0.905   |
| NFI         | $\geq 0.90$ | 0.932   |
| RFI         | $\geq 0.90$ | 0.921   |
| IFI         | $\geq 0.90$ | 0.961   |
| TLI         | $\geq 0.90$ | 0.955   |
| CFI         | $\geq 0.90$ | 0.961   |
| PGFI        | $\geq 0.50$ | 0.721   |
| PNFI        | $\geq 0.50$ | 0.806   |
| PCFI        | $\geq 0.50$ | 0.832   |
| CN          | $\geq 200$  | 226     |
| $\chi^2/df$ | $\leq 3.00$ | 2.210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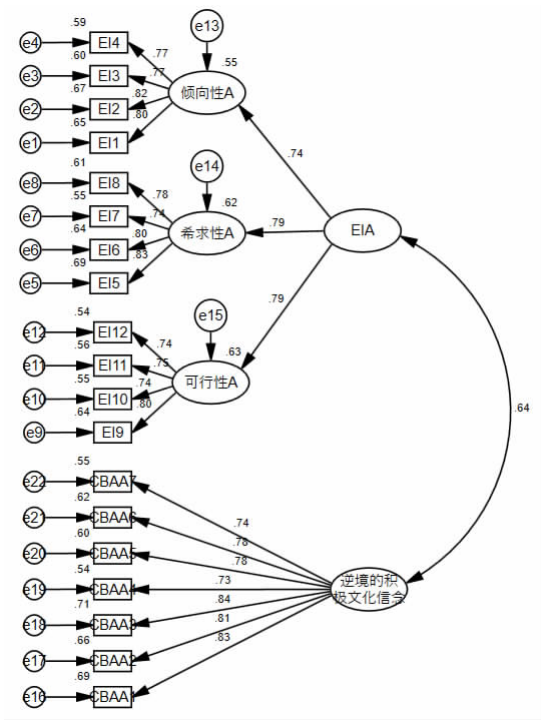


图 2 适配度

(三)差异性

如表 3 所示,男大学生的逆境信念显著高于女生(男生  $M$  为 3.960,女生  $M$  为 3.650,  $t=3.991^{***}$ ),假设 H1 成立。

表 3 性别的差异性分析

| 变数   | 性别 | M     | SD    | $t$   | $p$   |
|------|----|-------|-------|-------|-------|
| 逆境信念 | 男  | 3.960 | 0.731 | 3.991 | 0.000 |
|      | 女  | 3.650 | 0.717 |       |       |

(四)相关矩阵

如表 4 所示,贫困大学生的逆境信念与创业意图呈正相关( $\beta=0.528^{***}$ ,  $p<0.001$ ),假设 H3 成立。

表 4 相关系数矩阵

| 变数       | 1         | 2         | 3     |
|----------|-----------|-----------|-------|
| 1. 性别    |           |           |       |
| 2. 逆境信念  | 0.176 *** | 0.789     |       |
| 3. 创业意愿  | 0.216 *** | 0.528 *** | 0.774 |
| M        | 1.998     | 3.741     | 3.721 |
| SD       | 0.871     | 0.734     | 0.578 |
| $\alpha$ |           | 0.919     | 0.902 |
| AVE      |           | 0.623     | 0.599 |

(五)调节分析

性别在逆境信念预测创业意图的路径上有促进效果( $Wald=0.036^{***}$ ),男生的逆境信念对创业意图的影响显著高于女生( $\beta=0.319^{***}$ ,  $\beta=0.208^{***}$ ),假设 H2 成立(系数详见图 1)。

四、结论

(一)讨论与结论

结果表明,中国云南省大学生的性别使得创业意图存在显著差异性,这与以往研究结果是相同的。究其原因,可能是负面刻板印象导致女性创业意愿下降。在社会上,人们普遍认为男性更适合经商,从事更具改革性或冒险性的职业,因此男性在创业时感受到更大的社会期望和压力;而女性则被鼓励专注于家庭事务和养育子女,而不是创业,从而降低了女性的创业意愿。故此,本研究中的中国云南省贫困大学生可能受到了这些性别刻板印象的影响,从而导致贫困女大学生的创业意图显著弱于男生。

结果表明,中国云南省贫困大学生逆境信念与创业意图呈正相关。该结果与 Wang 和 Huang(2019)

的研究趋同,他们的发现逆境信念越强,创业意图越强。这说明,逆境信念强的贫困大学生在面对创业时更加自信,更加关注创业信息,能够主动获取创业知识,积极探索创业路径,参与创业实践,提升自身能力,从而提升创业意图。正如 Shek(2005)所说,逆境信念强的个体更加自信,并更加认为自己有足够的应对创业活动和不确定性,能够对职业关注和职业探索采取正确的态度,有更大的职业控制力,愿意为自己的职业发展负责,从而产生较高的适应性。

结果表明,中国云南省贫困大学生的性别在逆境信念与创业意图之间有促进效果。Guzman 和 Choi(2013)认为,在给定的环境中,强创业信念的个体会感觉世界充满了机会,而弱创业信念的个体则从成本和风险的角度来考虑世界。支持该观点的还有 Krueger 和 Brazeal(1994),他们也认为,面对困难、风险和不确定性,信念强的人更善于把握成功的机会,能更准确地预测未来,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创业任务中。

(二)研究贡献

贡献如下所示:

首先,现有文献表明,中国大学生为什么选择创业,目前还不太清楚。而本研究是第一次试图通过探索中国云南省贫困大学生逆境信念是否更有可能促进大学生创业意图的发展来填补这一重要空白。认知和行为因素对于更好地理解贫困大学生选择创业是至关重要的,这可以将行为和认知与潜在的创业行为(即意图)的交互联系起来。

其次,本研究强调贫困大学生的独特特征,并努力了解他们在创业选择方面的背景情况,特别强调逆境信念的强大作用,并将其与行为联系起来。因此,本研究以三元交互决定论的视角为基础,对贫困大学生创业意图的前提条件进行理论解释,并结合三元交互决定论,形成理论框架。正如 Wang 和 Huang(2019)所言,只有将认知差异结合起来,并由相应的行为触发,对行为因素的影响才会变得实质性。

最后,本研究结果既丰富了逆境信念与贫困大学生创业意图的相关文献,还补充了两者关系的空白。正如 Cai 等人(2021)所言,信念对构建大学生创业支持体系至关重要。另一方面,针对贫困大学生群体的研究还对帮助个人与家庭面对逆境至关重要。

(三)建议

结合研究结果,形成以下几点实践建议:

第一,根据贫困大学生逆境信念正向预测创业

意图的结论,提出以下建议:高校应举办各种逆境信念的专项培训计划,增加创业培训课程的数量,这将使贫困大学生能够确定自己的创业专业和方向,而不是局限于对概念或理论的理解。通过实践训练,培养学生的逆境信念,使他们能够独立思考,正确应对创业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第二,政府、高校、企业要加强协作,为贫困大学生创业实践提供机会和条件,设立创业项目支持基金,在创业信息、培训、资金等方面为大学生提供保障和服务。如果贫困大学生能够直接接触市场,发现大量的创业选择,那么他们不仅可以丰富创业经验,还可以提高识别和抓住创业机会的能力。

第三,中国云南省高校应积极邀请校友和成功企业家通过论坛交流和分享他们的创业和团队管理经验。此外,大学应将人际交往和沟通纳入日常教育,通过社交课程或演讲传播人际交往知识,还可以成立各种创业社团,加强学生的人际交往,培养他们的协调和管理潜质。

第四,中国云南省高校应为创业的贫困学生提供心理咨询服务,增强其心理健康和应激反应能力,使其能够合理应对压力和风险。此外,为做好创业准备,贫困大学生还应加强自身心理素质,培养积极主动的特点,培养观察和分析能力,密切关注创业过程中发生的商业和环境变化,克服创业过程中遇到的障碍、失败和自我怀疑。

### 五、限制与展望

研究地域仅为云南省,因此,研究结果可能无法推广到其他地区。建议未来的研究扩大地区,例如:东南亚边境地区,以及新疆、内蒙古等地,以更好地获取对大学生逆境信念和创业意图之间关系的理解。

此外,建议在未来的研究中构建更多的中间过程机制研究,如金融素养、电子创业生态系统、心理丰富性、数字技能、沉浸感。

### 参考文献:

- [1] Zulficar S. , Al-reshidi H. A. , Al Moteri M. A. , Feroz H. M. B. , Yahya N. , Al-Rahmi W. M. Understanding and Predicting Students'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Through Business Simulation Games: A Perspective of COVID-19[J]. Sustainability, 2021, 13(4): 1-27.
- [2] Abdulina N. , Abisheva A. , Movchun V. , Lobuteva A. , Lobuteva L. Overcoming Gender Stereotypes in the Process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Getting Higher Education in Digital Environment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merging Technologies in Learning, 2021, 16(12): 36-50.
- [3] Aykan E. , Karakuş G. , Karakoç H. The Effect of

University Students' Individual Innovation and Lifelong Learning Trends on Entrepreneurship Orientation [J]. Sustainability, 2019, 11(22): 1-16.

[4] Membrillo-Hernández J. , Lara-Prieto V. , Caratozzolo P. Sustainability: A Public Policy, a Concept, or a Competence? Efforts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Sustainability as a Transversal Competence Throughout Higher Education Programs [J]. Sustainability, 2021, 13(24): 1-17.

[5] Ayad T. , Sobaih E. E. , Elshaer I. A. University Incubator Support and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among Tourism Graduates: Mediating Role of Personal Attitude [J]. Sustainability, 2022, 14(23): 1-18.

[6] Laouiti R. , Haddoud M. Y. , Nakara W. A. , Onjewu A. K. E. A Gender-based Approach to the Influence of Personality Traits on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22(142): 819-829.

[7] Ayalew M. M. Multilevel Analysis of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of Engineering Graduating Students in Ethiopia[J]. Journal of Applied Economics, 2021, 24(1): 366-391.

[8] Ghatak A. , Bhowmick B. Should I Start My Own Venture? Moderating Effect of Pull Factors on the Relationship of Push Factors with Women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s [J].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 Journal, 2022, 12(3): 299-327.

[9] Bao J. , Dou J. The Formation of Subsequent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Happiness Matters[J]. Sustainability, 2021, 13(21): 1-18.

[10] Dragin A. S. , Mijatov M. B. , Ivanović O. M. , Vuković A. J. , Džigurski A. I. , Košić K. , et al.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of Students (Managers in Training): Personal and Family Characteristics[J]. Sustainability, 2022, 14(12): 1-15.

[11] Wu J. , Rudnák I. Exploring the Impact of Studying Abroad in Hungary on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among International Students[J]. Sustainability, 2021, 13(17): 1-18.

[12] Lu G. , Song Y. , Pan B. How University Entrepreneurship Support Affects College Students'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s: An Empirical Analysis from China [J]. Sustainability, 2021, 13(6): 1-25.

[13] Wang C. , Mundorf N. , Salzarulo - McGuigan A.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Sustainable during Entrepreneurial Process—The Moderating Role of Entrepreneurial Creativity[J]. Sustainability, 2021, 13(19): 1-18.

[14] Yasir N. , Mahmood N. , Mehmood H. S. , Rashid O. , Liren A. The Integrated Role of Personal Values and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o Form a Sustainable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J]. Sustainability, 2021, 13(16): 1-21.

[15] 张苗. 大学生“行为图鉴”趣谈[J]. 检察风云, 2023(1): 66-67.

[16] 曾盈. 大学生创新思维与创业能力培养——评《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的发展模式与改革创新研究》[J]. 中国教育学报, 2023(1): 130.

- [17] Luo L., Guo M., Huang J., Yang J., Research on the Effect of an Entrepreneurial Environment on College Students Entrepreneurial Self-efficacy: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Entrepreneurial Competence and Moderating Effect of Entrepreneurial Education[J]. Sustainability, 2022, 14(11): 1-17.
- [18] 张凤娟, 潘锦虹. 我国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政策的范式变迁及其嬗变逻辑[J].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2022(5): 151-156.
- [19] 李德丽, 刘立意. “科教产教”双融合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逻辑与范式改革——基于创新创业实验室的探索[J].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2023(1): 189-194.
- [20] 马永霞, 孟尚尚.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创新创业教育质量提升路径研究——基于50所高校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J]. 高教探索, 2022(2): 13-21.
- [21] 陈晓红, 蔡莉, 王重鸣, 等. 创新驱动的重大创业理论与关键科学问题[J]. 中国科学基金, 2020, 34(2): 228-236.
- [22] Wang L., Huang J. Effect of Entrepreneurial Self-efficacy on the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s of Students at a University in Hainan Province in China: Taking Social Support as a Moderator[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earning, Teaching and Educational Research, 2019, 18(9): 183-200.
- [23] Cai W., Gu J., Wu J. How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Social Capital Promote Nascent Entrepreneurial Behaviours: The Mediating Roles of Entrepreneurial Passion and Self-efficacy[J]. Sustainability, 2021, 13(20): 1-11.
- [24] Bandura A. Social Foundations of Thought and Action: A Social Cognitive Theory[M]. Upper Saddle River: Prentice-Hall, 1986.
- [25] Shek D. T. L.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Chinese Cultural Beliefs about Adversity,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Delinquency and Substance Abuse in Chinese Adolescents with Economic Disadvantage[J].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005, 71(1-3): 385-409.
- [26] Wang Q., Liu X. How Beliefs about Adversity Predict Depression among Chinese Rural Left-behind Adolescents: The Roles of Self-esteem and Stressful Life Events[J]. Children and Youth Services Review, 2022(132): 1-16.
- [27] Shek T. L., Tang V., Lam C. M., Lam M. C., Tsoi K. W., Tsang K. 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Cultural Beliefs about Adversity and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in Chinese Families with Economic Disadvantage[J]. American Journal of Family Therapy, 2003, 31(5): 427-443.
- [28] Liñán F., Chen Y. Development and Cross-cultural Application of a Specific Instrument to Measure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s[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2009, 33(3): 593-617.
- [29] Shek D. T. L. Chinese Cultural Beliefs about Adversity: Its Relationship to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School Adjustment and Problem Behaviour in Hong Kong Adolescents with and Without Economic Disadvantage[J]. Childhood: A Global Journal of Child Research, 2004, 11(1): 63-80.
- [30] Zhang J., Huang J. Entrepreneurial Self-efficacy Mediates the Impact of the Post-pandemic Entrepreneurship Environment on College Students'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J].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021(12): 1-9.
- [31] Shek D. T. L. Quality of Life Research: Responses to Emerging Issues in a Changing World[J].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011, 100(3): 371-374.
- [32] Leung J. T. Y., Shek D. T. L.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Beliefs about Adversity Scale[J]. Research on Social Work Practice, 2013, 23(3): 326-335.
- [33] Ibidunni A. S., Mozie D., Ayeni A. W. A. A. Entrepreneurial Characteristics Amongst University Students: Insights for Understanding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s Amongst Youths in a Developing Economy[J]. Education + Training, 2020, 63(1): 71-84.
- [34] 李俊青, 张雪莹, 袁博. 社会网络异质性与人力资本误配[J]. 经济研究, 2023, 58(12): 167-184.
- [35] 谭成明, 谭红梅. 高职学生就业途径探讨——评《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创业指导》[J]. 科技管理研究, 2022, 42(12): 225.
- [36] 李忠岷, 陆俊汕, 姜自婷. 边疆民族地区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对大学生职业发展效能的研究——以云南省为例[J]. 天津大学学报, 2022, 31(5): 84-90, 96.
- [37] 李永康, 万勇, 孙琦琦, 陶泉沙. 社会支持对大学生创新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广东和云南650份样本的比较分析[J].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学报, 2023, 33(2): 66-72.
- [38] 杨婧, 巴淳, 张廷欣, 袁源. 云南大学生创业方向方式选择调查[J]. 合作经济与科技, 2022(11): 108-110.
- [39] 姚荣玉. 大学生创业成功率的关键因素研究[J]. 科技创业月刊, 2023, 36(3): 91-94.
- [40] Su Y., Zhu Z., Chen J., Jin Y., Wang T., Lin C., et al. Factors Influencing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of University Students in China: Integrating the Perceived University Support and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J]. Sustainability, 2021, 13(8): 1-17.
- [41] 冯蝶.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引导贫困大学生返乡就业创业的调查与思考[J]. 就业与保障, 2022(5): 49-51.
- [42] 徐波波. 高质量就业导向下高职院校创新创业教育有效性研究[J]. 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 2025, 38(10): 13-14, 24.
- [43] 李磊, 张珂. 环境宽松性对创业学员网络后续创业意图的影响机制研究[J]. 教育科学文献, 2025, 2(7): 1-7.
- [44] 苏迪, 杨莹莹. 贫困大学生创业意向的性别差异及其成因[J]. 创新与创业教育, 2022, 13(4): 67-73.
- [45] 张楷. 创新创业视角下本科高校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与服务的策略研究[J]. 知识经济, 2022(16): 171-173.
- [46] 臧小林, 周廷勇. 高校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的四重维度[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学版),2021,27(6):250-261.

[47]杨茜,马琳.创新创业背景下高校贫困大学生创业就业问题研究[J].陕西教育(高教),2022(9):56-60.

[48]Bandura A. Self-efficacy: Toward a Unifying Theory of Behavioral Change[J]. Psychological Review, 1977, 84(2): 191-215.

[49]陈露.我国大学生创业意向维度结构的实证研究[D].大连:辽宁师范大学,2017.

[50]Pan J. Y., Wong D. F. K., Chan K. S., Chan C. L. W.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the Chinese Making Sense of Adversity Scale: Acculturative Stressors as an Example[J]. Research on Social Work Practice, 2008, 18(5): 479-486.

[51]Avcioğlu M. M., Karanci A. N., Soygur H. What Is Related to the Well-being of the Siblings of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An Evaluation Within the Lazarus and Folkman's Transactional Stress and Coping Model [J]. Omeg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Psychiatry, 2019, 65(3): 252-261.

[52]Park S. A., Sung K. M. Effects on Stress, Problem Solving Ability and Quality of Life of as a Stress Management Program for Hospitalized Schizophrenic Patients: Based on the Stress, Appraisal-coping Model of Lazarus & Folkman [J]. Journal of Korean Academy of Nursing, 2016, 46(4): 583-597.

[53]O'Connor M. F. Making Meaning of Life Events: Theory, Evidence, and Research Directions for an Alternative Model[J]. OMEGA - Journal of Death and Dying, 2003, 46(1): 51-75.

[54]Folkman S., Moskowitz J. T. Positive Affect and the Other Side of Coping [J]. American Psychologist, 2000, 55(6): 647-654.

[55]Jackson D., Firtko A., Edenborough M. Personal Resilience as a Strategy for Surviving and Thriving in the Face of Workplace Adversity: A Literature Review [J]. Journal of Advanced Nursing, 2007, 60(1): 1-9.

[56]李磊,周思雅,周思扬,董雪,谢安晋.身残志坚:残疾高职生逆境信念对终身学习倾向的影响机制研究[J].同行,2023(7):89-91.

[57]Botezat E. A., Constăncioară A., Dodescu A. O., Pop-Cohuț I. C. How Stable Are Students'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s in the COVID-19 Pandemic Context? [J]. Sustainability, 2022, 14(9): 1-22.

[58]Nabi G., Holden R., Walmsley A.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s among Students: Towards a Re-focused Research Agenda [J]. Journal of Small Business and Enterprise Development, 2010, 17(4): 537-551.

[59]Shook C. L., Priem R. L., McGee J. E. Venture Creation and the Enterprising Individual: A Review and Synthesis [J].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03, 29(3): 379-399.

[60]Lortie J., Castogiovanni G.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in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 What We Know and Future Directions [J]. 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 and Management Journal, 2015, 11(4): 935-957.

[61]Liñán F., Fayolle A. A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on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s: Citation, Thematic Analyses, and Research Agenda [J]. 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 and Management Journal, 2015, 11(4): 907-933.

[62]Donaldson C., Liñán F., Alegre J.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s: Moving the Field Forwards [J]. Journal of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in Emerging Economies, 2021, 30(1): 30-55.

[63]Ajzen I.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J].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1991, 50(2): 179-211.

[64]Aldrich H. E., Martinez M. A. Many Are Called, but Few Are Chosen: 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for the Study of Entrepreneurship[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2001, 25(4): 41-56.

[65]Krueger N. F., Brazeal D. V. Entrepreneurial Potential and Potential Entrepreneurs [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1994, 18(3): 91-104.

[66]Wu S., Wu L. The Impact of Higher Education on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s of University Students in China[J]. Journal of Small Business and Enterprise Development, 2008, 15(4): 752-774.

[67]Phan P. H., Wong P. K., Wang C. K. Antecedents to Entrepreneurship among University Students in Singapore: Beliefs, Attitudes and Background[J]. Journal of Enterprising Culture, 2002, 10(2): 151-174.

[68]Ozyilmaz A. The Effects of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n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in the Pre-venture Stage of Entrepreneurship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trepreneurship and Small Business, 2011, 14(3): 406-424.

[69]Maxwell M. H., Bleifer K. H., Franklin S. S., Varady P. D. Demographic Analysis of the Study[J]. Jama: Th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1972, 220(9): 1195-1204.

[70]Osadolor V., Agbaeze K. E., Isichei E. E., Olabosinde S. T. Entrepreneurial Self-efficacy and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The Mediating Role of the Need for Independence [J]. Journal of Entrepreneurship, Management and Innovation, 2021, 17(4): 91-119.

[71]De Guzman A. B., Choi K. O. The Relations of Employability Skills to Career Adaptability among Technical School Students [J]. 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 2013, 82(3): 199-207.

[72]Qiao X., Huang J. Effect of College Students' Entrepreneurial Self-efficacy on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Career Adaptability as a Mediating Variabl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Methodology, 2019, 5(3): 305-313.

[73]蔡莉,张玉利,蔡义茹,杨亚倩.创新驱动创业:新时

期创新创业研究的核心学术构念[J]. 南开管理评论, 2021, 24(4): 217-226.

[74] 蒋瑞格, 安晓镜, 刘小丽. 当代大学生国家认同与逆境信念的关系: 人生意义感的中介作用[J]. 邢台学院学报, 2021, 36(3): 188-192.

[75] 刘济榕, 王泉泉. 日常压力对流动儿童诚信感的影响: 社会支持与逆境信念的调节作用[J].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18, 34(5): 548-557.

[76] 张莉, 王乾宇, 赵景欣. 养育者支持、逆境信念与农村留守儿童孤独感的关系[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4, 22(2): 350-353.

[77] 薛韩容, 彭丽. 创业环境·自我效能感和农业院校大学生创业意向研究[J]. 安徽农业科学, 2021, 49(11): 272-274.

[78] Păunescu C., Molnar E. Country's Entrepreneurial Environment Predictors for Starting a New Venture—Evidence for Romania[J]. Sustainability, 2020, 12(18): 1-18.

[79] Li L., Zhang K., Xiang F. Higher Vocational Students' Future Self-continuity and Sustainable Entrepreneurial Preparation Behavior in China: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Financial Literacy and Belief in a Just World[J]. Educational Science Literature, 2024(8): 27-43.

[80] 魏江, 苏钟海, 路云飞, 刘洋, 沈睿. 平台企业主导的创业生态系统研究: 回顾与展望[J]. 科学学研究, 2023, 41(8): 1433-1441, 1483.

[81] 郑庆华. 高校创新创业生态体系的构建与实践探索[J]. 中国高等教育评估, 2022(2): 74-78.

[82] Li L., Bunnag C., Zhang K. Multi-agent Interaction in the Digital Entrepreneurial Ecosystem and Digital Re-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in Jiangxi Province, China: The Roles of Opportunity Belief and Episodic Future Thinking[J]. MUT Journa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2025(1): 222-238.

[83] Shu Y., Li L. The Affecting Mechanism of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Psychological Rich on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 in Hunan Province of China[J]. Educational Science Literature, 2024(9): 1-15.

[84] 李磊, 周思雅, 周思扬, 董雪, 李燕萍. 虚拟学习社区与大学生数字技能之关系研究: 互联网自我效能与网络学习满意度作为中介[J]. 新课程教学, 2023(146): 188-190.

[85] Li L., Xie J., Li Y. Effect of Online Learning Community on College Students' Civic Attitudes, Knowledge, and Skills—Taking Grit and Immersion as Moderator Variable[J]. Journal of the Open University of Shanxi, 2022, 24(4): 11-18.

## A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ultural Beliefs about Adversity and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s of Impoverished College Students in Yunnan Province, China: The Impact of Gender

LUO Xiang-qi<sup>1</sup>, BAI Xue-yan<sup>2</sup>, LI Lei<sup>3,4</sup>

(1. Medical Rehabilitation School, Yunnan Xinxing Occupations Institute, Kunming Yunnan 650217, China;

2. Engineering School, Yunnan Xinxing Occupations Institute, Kunming Yunnan 650217, China;

3. College Student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Center, Ganxi Vocational Institute of Science & Technology, Xinyu Jiangxi 338099, China;

4. International College, Mahanakor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Bangkok 10700, Thailand)

**Abstract:** While entrepreneurship is the core of revitalizing the economy,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s of college students in Yunnan Province, China, are low, especially among the impoverished student group. Confidence in adversity is the key to promoting entrepreneurship among college students, therefore, with the help of triadicreciprocal determinis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ultural beliefs about adversity and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s among impoverished college students in Yunnan Province, China, and the differential influence and moderating effect of gender were investigated. This study took impoverished college students from 2 universities in Yunnan Province, China,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used virtual questionnaires and the intention sampling method to collect samples, and 501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validity rate 83.033%). The results show that cultural beliefs about adversity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ccording to the gender of impoverished college students in Yunnan Province, China; cultural beliefs about adversity have a positive relationship with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s; and gender has a facilitating effect.

**Key words:** impoverished college students; cultural beliefs about adversity;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s; gender

# 分布式领导与特殊教育教师专业性之 关系研究:兼论组织幸福之中介影响

张珂<sup>1</sup>,周思扬<sup>2</sup>

(1. 博仁大学中文国际学院,泰国曼谷 10700;2. 兰实大学国际中文学院,泰国曼谷 10700)

**[摘要]**进入智能时代以来,如何更好地发展特殊教育教师专业性,是教育改革的重点。而校长领导力与教师专业性密切相关,因此,利用活动理论和组织学习理论,研究了分布式领导与教师专业性的关系,以及组织幸福的中介作用。本研究以中国江西省9所特殊学校的管理者与教师作为样本,使用电子问卷、目的抽样法收集数据,共回收问卷359份(有效率89.75%)。结果表明:分布式领导对教师专业性有显著正向影响,组织幸福有部分中介效应。这说明,特殊学校不仅需要民主与协作的领导力,还需要与组织中情感体验的联系,才能充分地提高教师的专业性。最后,建议在中国江西省特殊教育学校的教育管理中,应重点对校长的领导力与教学能力进行培养与管理。

**[关键词]**特殊教育;分布式领导;教师专业性;组织幸福

**[作者简介]**张珂(1982—),女,河南漯河人,博仁大学中文国际学院助教,博士,研究方向:教师继续专业发展、未来创业。周思扬(1997—),男,云南曲靖人,兰实大学国际中文学院硕士在读,研究方向:东盟地区虚拟创业生态学习系统、预知能力进阶。

**[DOI]** <https://doi.org/10.62662/kxwxz0210003>

**[中图分类号]** G76

**[本刊网址]** [www.oacj.net](http://www.oacj.net)

**[投稿邮箱]** [jkw1966@163.com](mailto:jkw1966@163.com)

众所周知,今天的学校一直面临着各种挑战。为应对快速变化的环境,学校需要满足未来社会的需求,并不断地变革,以促进组织的有效性和效率。然而,为学校提供信息的传统领导和组织理论之间仍然存在差距。而传统的组织和领导理论以及学校改进工作通常认为组织结构和环境与学校代理人及其行为是分开的,这也突显了学校改革的不足之处。如果要将学校组织和领导理论的假设用作理解学校组织和帮助教育领域领导实践的可行工具,则必须同时考虑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学校组织和领导者。

除非考虑到领导力实践、教育工作者的日常生活和学校的再培养,否则学校的改革运动可能无法实质性地实现其根本性和可持续变革的目标。此外,由于政府干预,校长和教师的工作量已经增加,使得他们的工作与责任变得更加困难;另一方面,教育工作者的组织角色和日常职能变得愈发复杂。因此,任何能够改善学校的努力都必须同时考虑学校组织的代理人、组织情况以及他们之间的互动。在这种情况下,相关研究强调在学校进行分布式领导(distributed leadership)的实践,以发展教师的专

业性(teacher professionalism)。提高学生成绩是教师的主要责任,发展教师专业性,可以提高学校的教育质量,并克服以政府为中心的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局限性。

学校是教育学生成为公民,并为未来工作与生活培养人才的地方,学校教育应不断以提高学生成绩为目标。为达成这个目标,或许可以通过组织幸福(organizational happiness)来提高教师的专业性,因为增强教师专业性是实现超越教师自身感受的教育方法。而以往相关研究过度集中在定性研究,定量研究则很少。因此,本研究的目标是改善学校教育管理和提高教师专业性。

以往研究尚未在中国背景下探索组织幸福在分布式领导与专业性之间的中介效应。此外,鉴于中国特殊教育组织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与西方国家存在差异,并且中国学校组织具有自上而下的管理特征,本研究旨在调查中国江西省特殊教育教师对分布式领导的看法,还有他们的教师专业性程度,以及情感体验的组织幸福在上述关系之间的介导效应。澄清这些关系与差异可以帮助学校确定促进教师专业性的关键因素,并且还有助于保障学生

的学习与福祉。

### 一、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 (一)理论基础

分布式领导假设领导者与教师和情境因素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分布式领导强调人类的认知活动是在学校组织的情境方面延伸和构建的。这些方面包括学校文化、学校结构和沟通(活动理论)。研究表明,组织和个人的能力可以通过协作和共同执行的领导实践和努力来增强(组织学习理论)。在这种情况下,分布式领导强调个体代理人与网络组织关系这两个重要属性的作用。这些概念可以用活动理论和组织学习理论来表示,它们是学习活动的理论机制。在相互依存的组织关系中发展机构和个人能力对于实现组织目标和建立组织范围内的能力以适应根本性变化至关重要。

#### (二)分布式领导

教育领域的相关人员对分布式领导越来越感兴趣,这主要是因为世界各地的学校面临着复杂而分散的需求,需要应对社会不断的变化。根据Amels等人(2021)的观点,将分布式领导概念化为组织领导力,其表现为所有团队成员之间的动态过程。学校团队包括教师和其他所有员工,如助教和有额外正式任务的教师。根据要解决的问题的类型,团队成员可以根据他们的知识、与特定角色的亲和力和经验担任领导角色。因此,配备最好或最熟练的团队成员可以在特定目标方面发挥领导作用。分布式领导可以涉及正式和非正式的领导角色,责任由所有团队成员共同分担。校长作为正式领导者,应致力于使人才和专业知识与学校的愿景和目标保持一致,并不断地对这些目标进行改善。

除了组织事项、教育主题等领域之外,分布式领导在学校中的有效应用还取决于学校领导对它的看法,他/她对学校教师的专业知识和个人能力的看法,以及他/她对环境和学校需求的理解。校长的态度也很重要,作为制度的管理者,校长可以做出决定,因为他/她拥有权力。相比之下,根据分布式观点,校长在促进和支持教师方面发挥着领导作用,但这需要不同的技能。

分布式领导的观点可以用多种方式来解释。例如,Macbeath(2005)区分了三种不同的类型,首先,当学校领导为团队成员提供空间以实现学校改进的长期目标时,他们正在使用战略领导分配。其次,当校长因需求增加而临时委派任务时,就会发生务实的分配。委派的任务可能与组织事务或教育主题有关。最后,正式分配意味着学校领导通过正式分配教师的领导角色来授予教师影响力。这

种领导力分布有助于证明领导力和对他人的权力是合理的。根据这些不同的解释,分布式领导可以分为两种方法:(1)分布式领导作为分析学校领导实践的工具;(2)分布式领导作为组织领导的框架。本研究遵循第二种观点,因为调查了特殊教育教师对分布式领导的看法,以及他们是否将这种观点视为在学校工作的一种方式。

#### (三)分布式领导与教师专业性

领导力与教师专业性有着密切联系,人们也意识到领导者具有的民主与协作特征在促进教师专业性中的重要作用。教师专业性被定义为“教师的教学技能,以及教师在课堂上采用的方法和活动”。发展教师专业性,是提高学生成绩的重要手段。而分布式领导被发现是提高教师教学技能、方法、活动的最有效因素之一,对教师专业性有着重要影响。而领导行为中的民主与协作可以利用多种能力来影响教师的专业性,当教师认为他们的领导者具备“增强指导、组织效率和建设组织的能力”,可以为他们提供发展时,就将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更加专注于自我发展,并提高他们的教学技能、方法和活动。据此假设:

H1:分布式领导对教师专业性有显著正向影响。

#### (四)分布式领导与组织幸福感

组织幸福被描述为“个体与组织相关的幸福体验”,它会对教师的工作表现产生正面影响。分布式领导则被认为是可以“增强指导、组织效率和建设组织的能力”,它可以影响教师的专业性。学校就提高教师专业性所需要关注的因素之一,是对领导力中的负面领导行为进行有效管理。组织应该建立和培养积极的领导行为,因为这影响着教师的幸福体验。而分布式领导是一种积极的领导行为,它可以通过民主与协作方式有效提升教师的组织幸福。据此假设:

H2:分布式领导对组织幸福有显著正向影响。

#### (五)分布式领导、组织幸福感与教师专业性

以民主与协作为中心的领导力,可以增强学校的指导、组织效率和建设组织能力,是一种积极的领导行为,可以促进教师专业性的提高。而令人愉快的情绪可以通过个人的情感体验,进一步地提升教师的教学技能,以及教师在课堂上采用的方法和活动。如果教师认为分布式领导的民主与协作对自己是有益的,并且认为领导者具有较高的分布式领导能力,那么积极的情感体验就会提高教师的专业性。相反,消极的情感体验将会降低教师学习的热情。

组织幸福通常被认为是心理功能方面的一种相关现象。因此,体验到的幸福感成为促进教师专业性的一种机制。以类似的方式,相关研究还发现幸福感与教师工作表现的关联有一些经验支持,这表明组织拥有较高的幸福感也能够有效地提高教师工作表现。此外,先前的研究表明,体验到的心理功能因素能够在教师专业性的过程中起到特别重要的作用。因此,本研究预测体验到的组织幸福将在此链接中起中介作用。据此假设:

H3:组织幸福对教师专业性有显著正向影响。

H4:组织幸福在分布式领导与教师专业性之间有介导效果。

二、方法

(一)研究模型

根据研究目的与假设构建模型(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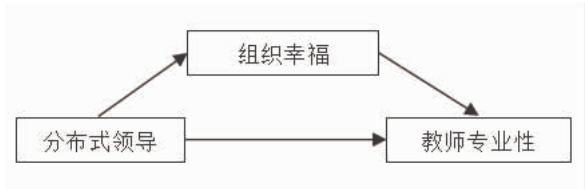


图1 研究模型

(二)研究对象、程序

调查时间是2023年9~10月,以目的抽样选取江西省9所高校的管理者与教师作为样本。以电子问卷调查他们对分布式领导、教师专业性、组织幸福之看法,最终有效样本为359份(有效率89.75%)。

受访者中男性占78.9%,女性占21.1%。23~30岁年龄比例为44.9%,31~40岁为26.0%,41~50岁为14.1%,51岁及以上为15.0%。结果显示,大多数参与者拥有学士学位。具有研究生学位的教师占参与者的5.9%。大约三分之一的教师的教学经验不到10年。51.5%的教师具有10至19年的教学经验。大多数被调查者有固定的教学职位,而教师领导、系主任的比例为28.9%。

(三)衡量

分布式领导量表:由Joo(2020)设计,量表的Cronbach's  $\alpha$  为0.929(范围从1“完全不同意”到5“完全同意”),有14个题项,分别衡量校长领导力、教师参与2个维度。本研究中量表的Cronbach's  $\alpha$  为0.901。

组织幸福量表:由Zheng等人(2015)开发,量表的Cronbach's  $\alpha$  为0.964(范围从1“完全不同意”到5“完全同意”),有18个题项,分别衡量生活幸福感、工作场所幸福感、心理幸福感3个维度。本研究中量表的Cronbach's  $\alpha$  为0.913。

教师专业性量表:由Joo(2020)设计,量表的Cronbach's  $\alpha$  为0.924(范围从1“完全不同意”到5“完全同意”),有17个题项,分别衡量关键行为、帮助行为2个维度。本研究中量表的Cronbach's  $\alpha$  为0.908。

在收集数据的过程中,本研究选择了性别、年龄、学位、教龄作为控制变量(不含职位)。所有的量表均使用李克特5点测量、自评。

三、结果分析

(一)适配度

表1的适配度指标均符合要求,匹配度较好。

表1 适配度

| 统计检验量       | 标准          | 总模型     |
|-------------|-------------|---------|
| $\chi^2$    |             | 519.783 |
| df          |             | 425     |
| P           | $\leq 0.05$ | 0.000   |
| SRMR        | $\leq 0.05$ | 0.038   |
| RMSEA       | $\leq 0.08$ | 0.026   |
| GFI         | $\geq 0.90$ | 0.915   |
| IFI         | $\geq 0.90$ | 0.986   |
| TLI         | $\geq 0.90$ | 0.985   |
| CFI         | $\geq 0.90$ | 0.986   |
| $\chi^2/df$ | $\leq 3.00$ | 1.223   |

(二)相关矩阵

表2显示所有变数之间均有显著关联关系( $\beta = 0.379^{***}$ ,  $\beta = 0.471^{***}$ ,  $\beta = 0.562^{***}$ ,  $p < 0.001$ )。

表2 相关系数矩阵

| 变数       | 1                    | 2                    | 3    |
|----------|----------------------|----------------------|------|
| 1. 分布式领导 | 1                    |                      |      |
| 2. 组织幸福  | 0.379 <sup>***</sup> | 1                    |      |
| 3. 教师专业性 | 0.471 <sup>***</sup> | 0.562 <sup>***</sup> | 1    |
| M        | 3.52                 | 3.56                 | 3.61 |
| SD       | 0.83                 | 0.780                | 0.96 |

(三)假设验证

表3为回归分析,使用性别、年龄、学位、教龄作为所有回归的控制变量。M2显示了分布式领导对教师专业性的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分布式领导对教师专业性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P = 0.440^{***}$ ,  $R^2 = 0.396$ ),假设H1成立。M4显示了分布式领导对组

织幸福的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分布式领导对组织幸福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P=0.355^{***}$ 、 $R^2=0.324$ ),假设 H2 成立。M5 显示了组织幸福对教师专业性的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组织幸福对教师专业性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P=0.462^{***}$ 、 $R^2=0.375$ ),假设 H3 成立。M6 显示了分布式领导和组织幸福同时对教师专业性的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组织幸福在分布式领导与教师专业性之间有部分中介效应( $P=0.328^{***}$ 、 $P=0.318^{***}$ 、 $R^2=0.465$ ),假设 H4 部分成立。

表 3 回归与中介分析

|              | 教师专业性      |            | 组织幸福       |            | 教师专业性      |            |
|--------------|------------|------------|------------|------------|------------|------------|
|              | M1         | M2         | M3         | M4         | M5         | M6         |
| 性别           | -0.037     | -0.010     | -0.020     | 0.001      | -0.028     | -0.010     |
| 年龄           | 0.131 *    | 0.142 **   | 0.278 ***  | 0.287 ***  | 0.003      | 0.051      |
| 教龄           | 0.203 **   | 0.188 **   | 0.102      | 0.090      | 0.156 **   | 0.160 **   |
| 学位           | 0.060      | 0.042      | 0.048      | 0.034      | 0.037      | 0.031      |
| 分布式领导        |            | 0.440 ***  |            | 0.355 ***  |            | 0.328 ***  |
| 组织幸福         |            |            |            |            | 0.462 ***  | 0.318 ***  |
| $R^2$        | 0.204      | 0.396      | 0.200      | 0.324      | 0.375      | 0.465      |
| Adj $R^2$    | 0.193      | 0.386      | 0.189      | 0.313      | 0.364      | 0.454      |
| $\Delta R^2$ |            | 0.192      |            | 0.124      | 0.171      | 0.068      |
| F            | 18.228 *** | 38.691 *** | 17.758 *** | 28.327 *** | 35.387 *** | 43.743 *** |

四、结论

(一)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调查了中国江西省特殊教育教师对分布式领导与教师专业性的看法,以及组织幸福在两者之间的介导效应。结果表明,分布式领导显著正向影响教师专业性。因此,分布式领导似乎对教师的教学技能、方法、活动很重要,这有助于学校进行改革并突破“自上而下的传统文化”的阻碍。领导力中的分布式领导是一种积极的新概念,它是提升教师专业性的重要途径,相对地,也能够降低教师消极的压力体验。

当下,全球教育环境正面对巨大挑战,特殊教

育学校领导者正在实施更多激励、引导和支持教师学习和学校改进的活动,例如:民主与协作。这些都是分布式领导重要的结构,在这个过程中,教师重塑了原本的教学能力,也促进了他们教学技能、方法、活动的发展。因此,发展和保持领导者的民主与协作特征对于促进教师的教学能力非常重要。

研究结果还表明,分布式领导显著正向影响教师的组织幸福。这就解释了有着超凡能力的分布式领导能够有效提高教师在学校组织中体验到的幸福感。这或许是因为分布式领导能够创造并促进学习活动与情感体验的融洽,从而增加了教师积极的情绪与体验。相对地,领导者提供的资源还可以保护教师免受负面情感的困扰。分布式领导这种积极的领导力在实现减少负面情感方面可以起到重要作用,领导者所增强的指导、组织效率和建设组织的能力可以起到保护和提高的作用。这说明,一个具有民主与协作特征的领导行为可以改善情感体验,并作为一种预防或保护机制,有效地应对负面情感。

研究结果也证实,组织幸福显著正向影响教师专业性。教师在学校之中,体验到的生活幸福感、工作场所幸福感、心理幸福感,这种积极的情感心理状态体验可以提高教师的教学能力。相对地,还可以降低他们的负面思想的发生。具体而言,组织幸福作为一种持久而稳定的情感联结的心理状态对教师积极的教学能力十分重要。这是因为,当教师在他们工作的学校中感到幸福时,会提高主观情感体验,从而提高教学能力。

结果进一步表明,组织幸福可以部分介导分布式领导与教师专业性之间的关系。组织幸福在解释为什么在具有民主与协作的领导力中,教师的教学能力可以得到进一步提升的作用机制。这或许是因为分布式领导创造并促进了“民主与协作”的融洽,增加了教师积极的情感体验,并进一步提升了教师教学能力的发展。相对地,领导者所提供的资源可以保护教师免受消极情感体验的困扰。

简而言之,基于“中国传统文化”背景,本研究首次从实证研究的角度,证实了组织幸福在分布式领导与教师专业性之间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也支持了上述假设。此外,建议中国江西省的教育机构与领导者通过建立与学习“分布式领导”来提升教师教学能力中的教师专业性。此外,组织幸福部分地介导了上述两者之间的关系。这也提示中国江西省的学校和校长也需要重视教师的组织幸福的管理,以增强分布式领导对教师专业性所产生的影响。

## (二)研究启示

本研究的结果表明,分布式领导这种积极的领导力有利于提高特殊教育教师积极的情感体验。这一发现与教育领域对“深度学习与领导力”的重视是相关的。

因为一个激励、参与和维持教师持续发展的领导力,特殊教育教师对教学的激情将有所增加,对学生的教育质量表现将更好。在实践中,目前的学校也都很重视具有民主与协作的领导力。因此,更应在学校中建立具备“民主与协作”特征的领导行为,这将有效促进教师专业性的提升,如此才能为学生的学习提供保证。此外,本研究还发现分布式领导对组织幸福有着直接与间接的积极影响。这意味着特殊教育学校可以将组织幸福纳入教师专业发展中,这将有助于进一步提高教师的教学能力。

实践意涵是,在这个充满挑战的创新时代,学校应重点改革教育管理,并建立与发展具有“民主与协作”特征的领导力实践。近期,中国已经有少数的学校实施了各种旨在改革学校的计划,特别是将民主与协作的领导力、教师情感体验、教学能力纳入到改善之中。这也说明教育领域已经认识到这些因素对特殊教育学校变革的必要性。本研究的结果支持这些假设,并强调了在特殊教育学校中建立有着“民主与协作”的领导行为之重要性。中国的特殊教育学校需要意识到这一点,以便为教师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政策支持,并保障学生的教育质量。

## 五、限制与展望

本研究存在一定限制与局限性。首先,数据是单次收集的,来自中国江西省9所不同来源的学校,这可能会增加公共源/方法偏差的风险。在这个问题上,本研究努力通过控制一些人口变数来缓解这种偏见。然而,研究结果的均值、标准差、研究变量间的显著性都表现为正常。可见,在本次研究中,偏差并不是一个严重的缺陷。其次,样本选择的范围因资金、时间等因素造成只于江西省实施。因此,研究适用性可能不能具有广泛之代表性,特别是未能获取一线与偏远地区学校之样本,未来研究可充分考虑这些因素,并扩大数据选择范围和学校种类等。此外,从研究人群的角度来看,本研究选择的分布式领导之衡量标准限制在少数人身上,因此这项研究可能不能在其他背景下推广。

未来的研究中建议探索分布式领导与大学生创造创新技能之间的关系,以及其他“教育4.0,全球框架”内的其他技能。另一方面,作为预知的心理能力(未来情景思维)、未来自我连续性、心理丰富性,也是一个值得论证的主因。

## 参考文献:

- [1] Tamadoni, A., Hosseingholizadeh, R., Bellibaş, M. Ş. A Systematic Review of Key Contextual Challenges Facing School Principals: Research – informed Coping Solutions [J]. Educational Management Administration & Leadership, 2024, 52(1): 116–150.
- [2] Narayanti, P. S., Pranajaya, S. A., Sucianti, I., Rifky, S., Hajerina, H. Values Education in the Era Globalization: Preparing Students to Face an Increasingly Competitive World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2024, 2(3): 615–626.
- [3] McDiarmid, G. W., Zhao, Y. Time to Rethink: Educating for a Technology – transformed World [J]. ECNU Review of Education, 2023, 6(2): 189–214.
- [4] Okada, A., Gray, P. A Climate Change and Sustainability Education Movement: Networks, Open Schooling, and the “Care – Know – Do” Framework [J]. Sustainability, 2023, 15(3).
- [5] Algan, E. K., Ummanel, A. Toward Sustainable Schools: A Mixed Methods Approach to Investigating Distributed Leadership, Organizational Happiness, and Quality of Work Life in Preschools [J]. Sustainability, 2019, 11(19): 2–20.
- [6] Shin, H. S., Joo, Y. H. Issues and Challenges of Distributed Leadership Research [J]. Journal of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and Policy, 2016, 1(1): 1–11.
- [7] Hoy, W. K., Miskel, C. G.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 (9th ed.) [M]. New York: McGraw Hill, 2012.
- [8] Mifsud, D. A Systematic Review of School Distributed Leadership: Exploring Research Purposes, Concepts and Approaches in the Field Between 2010 and 2022 [J]. Journal of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and History, 2024, 56(2): 154–179.
- [9] Yalçınkaya, S., Dağlı, G., Aksal, F. A., Gazi, Z. A., Kalkan, Ü. The Effect of Leadership Styles and Initiative Behaviors of School Principals on Teacher Motivation [J]. Sustainability, 2021, 13(5): 2–18.
- [10] Jakobsen, M. L., Kjeldsen, A. M., Pallesen, T. Distributed Leadership and Performance – related Employee Outcomes in Public Sector Organizations [J]. Public Administration, 2023, 101(2): 500–521.
- [11] Liu, Y., Watson, S. Whose Leadership Role Is More Substantial for Teacher Professional Collaboration, Job Satisfaction and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A Lens of Distributed Leadership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eadership in Education, 2023, 26(6): 1082–1110.
- [12] Polatcan, M. An Explor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stributed Leadership, Teacher Agency, and Professional Learning in Turkey [J].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in Education, 2024, 50(4): 789–803.
- [13] Vu, T. M. H., Tchounikine, P. Supporting Teacher

Scripting with an Ontological Model of Task-technique Content Knowledge[J]. *Computers & Education*, 2021, 163(4): 1-12.

[14] Larsson, P., Löwstedt, J. Distributed School Leadership: Making Sense of the Educational Infrastructure[J]. *Educational Management Administration & Leadership*, 2023, 51(1): 138-156.

[15] Veletić, J., Price, H. E., Olsen, R. V. Teachers' and Principals' Perceptions of School Climate: The Role of Principals' Leadership Style in Organizational Quality [J]. *Educational Assessment, Evaluation and Accountability*, 2023, 35(4): 525-555.

[16] Edwards, G., Bolden, R. Why Is Collective Leadership So Elusive? [J]. *Leadership*, 2023, 19(2): 167-182.

[17] Harris, A., Azorín, C., Jones, M. Network Leadership: A New Educational Imperative?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eadership in Education*, 2023, 26(5): 919-935.

[18] Spillane, J. P. Distributed Leadership [M].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2012.

[19] Joo, Y. H. The Effects of Distributed Leadership on Teacher Professionalism: The Case of Korean Middle Schools [J]. *Educational Management Administration & Leadership*, 2020(6): 1-21.

[20] Thoonen, E. E. J., Slegers, P. J. C., Oort, F. J., Peetsma, T. T. D., Geijssels, F. P. How to Improve Teaching Practices: The Role of Teacher Motivation, Organizational Factors, and Leadership Practices [J].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Quarterly*, 2011, 47(3): 496-536.

[21] Kirsten, N. A Systematic Research Review of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s a Policy Instrument[J]. *Educational Research Review*, 2020(31): 1-31.

[22] Purcell, W. M., Henriksen, H. A., Spengler, J. D. Universities as the Engine of Transformational Sustainability Toward Deliver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Living Labs" for Sustainability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ustainability in Higher Education*, 2019, 20(8): 1343-1357.

[23] Dahl, K. K. B. Narrative Learning Through Life: Kenyan Teachers' Life-stories and Narrative Learning, and What This Means for Their Relation to the Teaching Profession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2015(40): 145-155.

[24] Heck, R. H., Hallinger, P. Assessing the Contribution of Distributed Leadership to School Improvement and Growth in Math Achievement [J].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Journal*, 2009, 46(3): 659-689.

[25] Hulpia, H., Devos, G., Rosseel, Y.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Scores on the Distributed Leadership Inventory [J]. *Educational and Psychological Measurement*, 2009, 69(6): 1013-1034.

[26] Gronn, P. Distributed Properties: A New Architecture for Leadership [J]. *Educational Management & Administration*, 2000, 28(3): 317-338.

[27] Lakomski, G. Functionally Adequate but Causally Idle: W(h)ither Distributed Leadership? [J]. *Journal of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2008, 46(2): 159-171.

[28] Fonsén, E., Szecsi, T., Kupila, P., Liinamaa, T., Halpern, C., Repo, M. Teachers' Pedagogical Leadership i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J]. *Educational Research*, 2023, 65(1): 1-23.

[29] Murphy, G. Leadership Preparation, Career Pathways and the Policy Context: Irish Novice Principals' Perceptions of Their Experiences [J]. *Educational Management Administration & Leadership*, 2023, 51(1): 30-51.

[30] Pan, H. L., Wiens, P. D., Moyal, A. A Bibliometric Analysis of the Teacher Leadership Scholarship [J]. *Teaching and Teacher Education*, 2023(121).

[31] Amels, J., Krüger, M. L., Suhre, C. J., Veen, K.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imary School Leaders' Utilization of Distributed Leadership and Teachers' Capacity to Change [J]. *Educational Management Administration & Leadership*, 2021, 49(5): 732-749.

[32] Azizi, L. Which Leadership Processes Encourage Sustainable Transitions Within Universitie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ustainability in Higher Education*, 2023, 24(1): 46-68.

[33] Fahrurrozi, M., Wathoni, H., Basri, H., Dwimaulani, A. Entrepreneurial Leadership Values in Tourism Classroom Teaching. Enhancing the Learning Processes for Tourism Business [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 Tourism*, 2023, 14(2): 458-468.

[34] Jarvis, A., Mishra, P. K. Leadership for Learning: Lessons from the Great Lockdown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eadership in Education*, 2024, 27(2): 316-331.

[35] Macbeath, T., Lynch, D., Turner, D., Provost, S. C., Smith, R., Willis, R. L. School Leadership and School Improvement: An Examination of School Readiness Factors [J]. *School Leadership & Management*, 2019, 39(5): 434-456.

[36] Woods, P. A. Authority, Power and Distributed Leadership [J]. *Management in Education*, 2016, 30(4): 155-160.

[37] Jones, M., Harris, A. Principals Leading Successful Organisational Change: Building Social Capital Through Disciplined Professional Collaboration [J].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Change Management*, 2014, 27(3): 473-485.

[38] Day, C., Gu, Q., Sammons, P. The Impact of Leadership on Student Outcomes: How Successful School Leaders Use Transformational and Instructional Strategies to Make a Difference [J].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Quarterly*, 2016, 52(2): 221-258.

[39] Macbeath, J. Leadership as Distributed: A Matter of Practice [J]. *School Leadership and Management*, 2005, 25(4): 349-366.

[40] Palazzeschi, L., Bucci, O., Fabio, A. D. High

Entrepreneurship, Leadership, and Professionalism (HELP): A New Resource for Workers in the 21st Century[J].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018, 9(4): 1-7.

[41] Borich, G. D. *Effective Teaching Methods* (5th ed.) [M]. Upper Saddle River: Pearson Education, 2004.

[42] Zheng, X., Zhu, W., Zhao, H., Zhang, C. Employee Well-being in Organizations: Theoretical Model, Scale Development, and Cross-cultural Validation[J].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2015, 36(5): 621-644.

[43] Dulun, Ö., Lane, J. F. Supporting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Needed for the 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Diploma Programme: A Content Analysis of a National and Two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Programs in Turkey[J]. *Thinking Skills and Creativity*, 2023(47).

[44] Gust, S., Hanushek, E. A., Woessmann, L. Global Universal Basic Skills: Current Deficits and Implications for World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24(166).

[45] Majewska, I. A. Teaching Global Competenc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J]. *College Teaching*, 2023, 71(2): 112-124.

[46] Trinidad, J. E., Raz, M. D., Magsalin, I. M. "More than Professional Skills:" Student Perspectives on Higher

Education's Purpose [J]. *Teaching in Higher Education*, 2023, 28(6): 1380-1394.

[47] Udvari, B., Vizi, N. Employing the Flipped Classroom to Raise the Global Citizenship Competences of Economics Students to a Global Issue [J].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ement Education*, 2023, 21(1).

[48] Yang, Y., Kuo, N. Blended Learning to Foster EFL College Students' Global Literacy [J]. *Computer Assisted Language Learning*, 2023, 36(1-2): 81-102.

[49] Li, L., Chuensumon, B., Zhang, K. Multi-agent Interaction in Digital Entrepreneurial Ecosystem and Digital Re-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in Zhejiang Province, China: The Roles of Opportunity Belief and Episodic Future Thinking [J]. *MUT Journa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2025(1): 45.

[50] Li, L., Zhang, K., Xiang, F. Higher Vocational Students' Future Self-continuity and Sustainable Entrepreneurial Preparation Behavior in China: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Financial Literacy and Belief in a Just World [J]. *Educational Science Literature*, 2024(8): 27-43.

[51] Shu, Y., Li, L. The Affecting Mechanism of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Psychological Rich on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 in Hunan Province of China [J]. *Educational Science Literature*, 2024(9): 1-15.

##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stributed Leadership and Special Education Teacher Professionalism: Taking Organizational Happiness as Mediating Effect

ZHANG Ke<sup>1</sup>, ZHOU Si-yang<sup>2</sup>

(1. Chinese International College, Dhurakij Pundit University, Bangkok 10700;

2. International Chinese College, Rangsit University, Bangkok 10700, Thailand)

**Abstract:** How to better develop special education teacher professionalism has been a focus of educational reform since entering the smart era. While headmaster leadership is closely related to teacher professionalis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stributed leadership and teacher professionalism and the mediating role of organizational well-being were investigated using activity theory and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theory. This study used electronic questionnaires and purposive sampling methods to collect data from a sample of administrators and teachers in nine special schools in Jiangxi Province, China, and 359 questionnaires were returned (validity rate 89.75%). The results show that distributed leadership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teacher professionalism, with organizational well-being partially mediating the effect. This suggests that special schools need not only democratic and collaborative leadership but also a connection to the emotional experience in the organization to enhance teacher professionalism adequately. Finally, it is recommended that the educational management of special education schools in Jiangxi Province, China, should focus on the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of headmasters' leadership and teaching competence.

**Key words:** special education; distributed leadership; teacher professionalism; organizational happiness

# 基于大数据分析的高校智慧宿舍建设模式

阮梦慧, 陈 阳

(安徽工程大学国际工程师学院, 安徽芜湖 241000)

**[摘 要]**分析当前各个高校宿舍管理提出的需求和面临的问题,提出了基于大数据分析的高校智慧宿舍建设模式。通过整合与宿舍相关的业务系统数据和业务应用,建设一个完整的综合性智慧宿舍管理平台,实现各个相关系统与宿舍相关业务的高度融合和低成本、高效率的宿舍业务管理。同时,利用大数据聚类技术分析智慧宿舍管理平台产出的数据,为高校学生提供个性化需求与服务,为校园管理者提供科学的决策支持,打造良好的四个智慧化服务和三个育人环境。

**[关键词]**大数据分析;高校;智慧宿舍管理平台;决策支撑

**[作者简介]**阮梦慧(1995—),女,安徽芜湖人,安徽工程大学国际工程师学院助理工程师,工程硕士,研究方向:图像处理与计算机视觉、大数据分析可视化。陈阳(1977—),男,安徽含山人,安徽工程大学国际工程师学院正高级工程师,工程硕士,研究方向:现代教育技术、大数据应用。

**[基金项目]**本文系安徽省教育基本建设学会科研项目(项目编号:2205-13)。

**[DOI]** <https://doi.org/10.62662/kxwxz0210004>

**[中图分类号]** G434

**[本刊网址]** [www.oacj.net](http://www.oacj.net)

**[投稿邮箱]** [jkw1966@163.com](mailto:jkw1966@163.com)

随着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飞速发展,“互联网+教育”模式受到国家和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认可。各大高校纷纷加大宿舍信息化建设的投入力度,积极响应教育部关于教育信息化建设的号召。于是,高校宿舍管理过程中各类信息系统不断堆积,同时系统产生的数据规模日渐庞大冗余。然而,如何使用数据挖掘技术分析系统产出的数据,为学生提供更好的个性化需求与服务,为校园管理者提供科学的决策支持成为高校宿舍信息化建设的重大挑战。

## 一、高校宿舍管理面临的问题

随着高校不断扩大招生规模,在校生的思维方式、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性格特点、兴趣爱好呈现出多样化、复杂化的趋势,当前阶段的大学生对宿舍服务质量要求也越来越高,传统的人工加办公软件的管理方式早已不符合高校的实际管理需求。因此,使用信息化技术提升后勤工作人员的管理效率,减轻工作上的负担,使用数据挖掘技术为学生提供更好的个性化需求与服务,为校园管理者提供准确的决策支持成为高校宿舍信息化建设的重大

挑战。尽管当下大多数学校已建成一些管理系统投入宿舍管理使用,但是这些系统往往功能简单,散落分布,产出的数据量庞大冗余且得不到有效利用。目前宿舍管理面临的问题主要如下:

(1)与宿舍管理相关的业务应用繁多、管理不统一。各个系统数据独立且高度冗余,完整性、准确性不高,数据之间未实现共享,信息孤岛现象严重;

(2)尽管信息化系统已大规模投入到宿舍管理中,但是日常宿舍管理还是依赖人工处理,存在“僵尸”系统现象。管理人员业务能力参差不齐,导致系统数据准确度不高,管理效率低下;

(3)缺少智慧化管理,管理育人功能体现不明确,效果不突出。当下高校宿舍管理系统大多数都是后台管理,缺少精细化的数据处理、可视化的数据展示和智慧化的决策支持。

## 二、需求分析

建设智慧宿舍管理平台包含:学校三大平台(统一身份认证平台、公共数据平台、门户平台)、一卡通系统、智能监控系统、能耗监控系统、智能门禁门锁系统、一键报修系统、学工系统、教务系统等信

息化系统。目前,大部分高校均已完成基础系统搭建,并形成一定的应用规模,高校的师生员工信息化素养稳步提升,基本明确建设智慧宿舍管理平台的需求。于是,针对宿舍管理面临的问题提出以下需求:

(1)建立一个完整统一、数据高度共享的智慧宿舍管理平台。整合现有散落的业务系统,确保数据完整准确,实现数据共享,提高管理效率。

(2)学生工作的管理需求是学生在学校的学习与生活,实现统一管理的同时开展针对性的教育引导。需要建立一套具有强规范性的宿舍管理体系,实现学校一体化的服务管理;利用各个业务系统产生的数据为学校管理提供决策支撑,实现个性化教育。

(3)为高校落实宿舍“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环境育人”(简称“三个育人”)提供保障,打造“智慧环境、智慧管理、智慧服务、智慧育人”(简称“四个智慧”)的学生宿舍。

### 三、智慧宿舍管理平台设计

智慧宿舍管理平台涵盖的业务系统数量多,数据高度冗余且独立。要想高效地实现宿舍智慧化管理,则需要先做好顶层设计再搭建平台,特别是前期需求分析要充分,逻辑设计要合理,业务流程要规范。同时,大部分高校已完成建设平台所需的基本外在信息化系统,并形成一定的应用规模,所以在设计方案时应充分考虑高校实际情况,避免重复建设,实现登录统一、业务统一、用户统一、数据统一;建立一套运行安全稳定、数据高度开放共享、业务高度融合的规范化宿舍管理体系,实现学校一体化的服务管理,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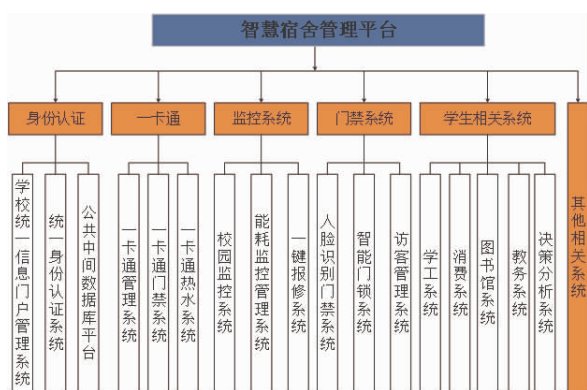


图 1 智慧宿舍管理平台与各类系统的关系

由图可知,智慧宿舍管理平台有效地打破了信息孤岛现象,平台与已建成的基础信息化系统业务

紧密融合,各类信息化系统之间相互提供数据接口,共享业务数据,实现学生宿舍统一管理与服务。

#### (一)平台系统架构

智慧宿舍管理平台系统架构是一个数据与业务集成的统一管理平台,实现业务紧密融合,数据高度共享的全用户、全过程、全终端智慧宿舍管理,如图 2 所示。平台具有以下功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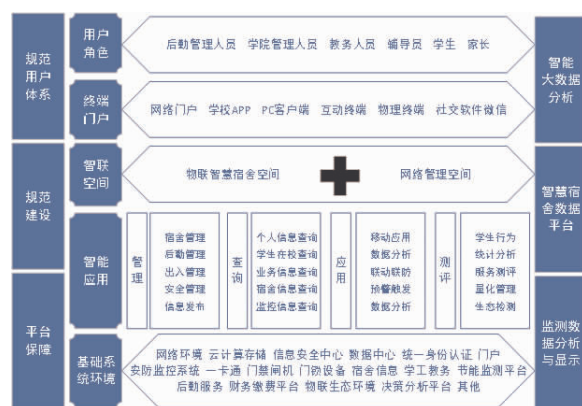


图 2 智慧宿舍管理平台的系统架构

(1)终端互联:平台涉及的终端门户包括网络门户、学校应用 App、个人 PC 客户端、物理互动终端、移动社交软件等;涉及的用户角色包括:后勤管理服务人员、学院管理人员与辅导员、学生、家长等。平台通过互联网将所有的终端门户互联起来,为不同的用户角色提供智能的终端服务,实现全用户、全终端的智慧管理;

(2)流程重组:平台将相关业务融合,规范宿舍管理业务流程,突破部门管理需要和不同系统对接的技术壁垒,打破信息孤岛。系统提供管理、查询、应用、测评等功能,重建全过程的,规范化、智慧化宿舍管理流程;

(3)业务融合:平台融合了与宿舍管理相关的基础信息化系统,为智慧宿舍管理提供完备的基础系统环境。通过开放数据接口,实现数据高度共享,业务深度融合。其中,基础系统环境包括:基础网络、统一身份认证平台、公共数据平台、门户平台、云存储、一卡通、门禁与门锁、安防监控、学工教务、能耗管理、财务缴费、学工教务、决策、信息安全以及其他相关业务。

智慧宿舍管理系统平台系统架构采取模块化、智慧化的结构管理,实现应用高度集成、各个业务联动、综合数据分析,进而为高校宿舍管理提供科

学决策。

## (二) 主要功能模块

### 1. 主要信息管理

主要信息应包括:楼栋号、房间号等宿舍信息;院系、年级、专业等基本人事信息;消费、通行等一卡通信息;人脸识别、监控等门禁信息;考勤、成绩信息等等。基础信息管理应结合现有的统一身份认证平台,建成基础信息标准化数据字典,实现统一登录和基础信息同步查询;针对不同类别人员分配不同权限,提供账号模块化授权管理;开放接口,无缝对接不同业务系统。

### 2. 用户业务模块

用户端应通过网页、App 等方式集成平台上所有业务应用。业务主要包括:智能查询,实现门禁、考勤、水电、消费、能耗、预警以及其他宿舍相关的业务信息查询;智能热水,实现线下饮水、洗浴、洗衣等功能,线上充值、缴费、预约等功能;智能报修,通过网页、App 等途径实现报修、查询、派单和评价一体化的智能报修。

### 3. 智能门禁管理

对接学校一卡通、监控等系统,高效获取学生人脸门禁、学号、班级等基本信息,精准定位学生身份;平台根据一卡通系统、监控系统、门禁系统等数据进行分析,轻松掌握学生出入情况和在校行踪轨迹,为管理者提供决策依据,实现科学智能的个性化学生管理工作。

### 4. 智能门锁管理

对接一卡通宿舍门禁,利用物联网技术,实现房间门锁的动态管理;将学生信息自动同步到门锁,实现智能分配权限,无需单独发卡,节省人力、物力成本;采用智慧宿舍管理系统调度房间资源,提升门锁管理效率,自动统计和查询学生在寝情况。

### 5. 热水及小电器智能管理

对接一卡通热水系统,主要实现饮用水、洗衣、洗浴等便捷生活服务的充值缴费;利用网络实现设备之间的互联互通,实现线上申请使用租赁设备、查询消费流水等;通过移动客户端接收水电停供,设备故障、维护等通知。

### 6. 在线预约管理

实现自习室动态管理,完成空位查询与预约;实现新增、删除自习室等功能;完成实时显示自习室使用情况和余量可视化。

### 7. 信息推送管理

通过网络门户、学校 App、PC 客户端、微信、邮

箱等多种平台推送信息给管理者和各类用户;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生成各类信息,通过动态设置分类分级阈值,触发消息提醒。

### 8. 能耗管理

对接学校能耗监控管理系统,进行能耗智慧管理和大数据分析,主要实现根据室内温度和湿度调节空调,根据室内光线强度调节照明,定时控制冷热水电控设备,定时控制洗衣机、吹风机、微波炉等用电设备,实现超负荷用电安全管控。

### 9. 宿舍业务管理

宿舍门禁权限管理、视频监控管理、充值消费管理、热水洗浴管理、宿舍一键报修管理、公共场所设备设施管理、网络管理、安全文明查寝管理、信息通知发布管理、宿管等工作人员值班巡视过程化管理和交接班管理。

### 10. 部门考核管理

基于平台产生的业务数据,实现系统应用管理考核、系统数据质量考核、服务能力评估考核、故障处理能力考核等功能。采用关键绩效指标(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 KPI)考核算法按月对各部门业务能力进行评估: $\Sigma$ 月度考核分 = ( $\Sigma$ 目标任务考核分)  $\times 70\%$  + ( $\Sigma$ 综合评价考核分)  $\times 30\%$ , 其中  $\Sigma$ 目标任务考核分 = (系统应用管理满意度 + 系统数据质量考核 + 业务故障处理能力),  $\Sigma$ 综合评价考核分 = 业务完成率考核分 + (工作效率加减分 + 工作态度评价分 + 工作创新奖励分)  $\times 30$ 。上述指标和权重均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 (三) 大数据分析

智慧宿舍管理系统平台产生的各类业务数据庞大且冗余,为了降低数据维度,提高数据利用率,首先需要预处理系统数据,流程如图 3 所示;其次使用聚类大数据分析算法,采用 K-means 聚类算法分析预处理后的数据,流程图如图 4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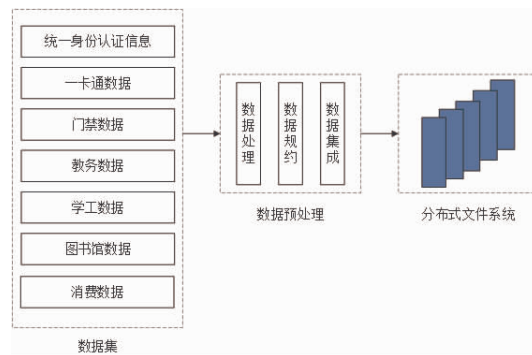


图3 数据预处理

为了方便计算距离,需要将不同的数据含义转为特定的数字,如门禁系统中学生状态在寝、晚归、未归,用 0、1、2 表示;一键报修系统中报修未受理、报修已受理、等待处理、处理完成,用 0、1、2、3 表示;等等。针对多维数据离散问题,基于每天 24 小时确定 K-means 聚类算法簇的数量  $k = 24$ ,取 1, 2, 3, ..., 24, 维度包括平台中一卡通缴费、门禁门锁、课程课表、一键报修、洗衣洗浴等  $n$  个对象数据库信息。按照最小欧式距离原则分配到相关最邻近聚类,计算所有维度误差函数平方和,对学生行为特征进行聚类分析学生行为习惯和预警信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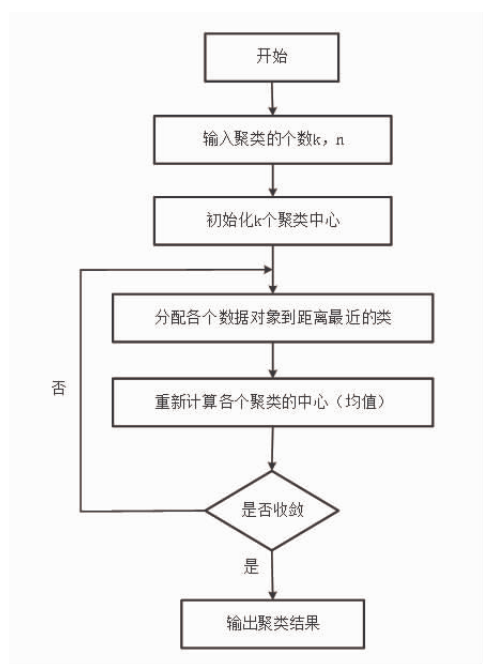


图 4 K-means 聚类算法流程图

假设与宿舍相关的数据集为  $X = \{x_m | m = 1, 2, 3, \dots\}$ , 数据集  $N$  个维度业务属性用  $A_1, A_2, \dots, A_N$  表示, 则数据样本  $x_i = (x_{i1}, x_{i2}, \dots, x_{iN})$ ,  $x_j = (x_{j1}, x_{j2}, \dots, x_{jN})$ , 其中  $A_1, A_2, \dots, A_N$  为样本  $x_i$  和  $x_j$  对应  $N$  个描述属性, 具体取值为  $x_{i1}, x_{i2}, \dots, x_{iN}$  和  $x_{j1}, x_{j2}, \dots, x_{jN}$ 。样本  $x_i$  和  $x_j$  之间的距离用  $D(x_i, x_j)$  表示, 值越小则样本  $x_i$  和  $x_j$  越相似; 值越大则样本  $x_i$  和  $x_j$  越不相似。

欧式距离计算公式如下:

$$D(x_i, x_j) = \sqrt{\sum_{k=1}^N (x_{ik} - x_{jk})^2}$$

误差函数平方和计算公式如下:

$$D = \sum_{k=1}^N \sum_{a=1}^{A_k} \sum_{i=1}^{C_a} (x_{ik} - \bar{x})^2$$

其中,  $x_{ik}$  为样本值,  $N$  为维度,  $A_k$  为所在维度的属性值,  $C_a$  为聚类数量,  $\bar{x}$  为聚类中心。

以上方法可以准确全面地分析学生学习生活习惯, 生成各类丰富的统计报表; 实现宿舍多维度可视化, 从而完成精细化管理; 通过分析学生宿舍习惯, 对比学生在寝行为轨迹, 完成学习、生活、失联等预警; 通过与日常行为进行对比, 及时预测反常行为, 提醒管理人员介入处理并提供决策分析; 根据教务系统信息, 实现学生考勤数据分析; 根据消费系统信息和学工系统信息, 实现学生消费能力分析, 进而为重点帮扶提供决策支持; 根据系统运行维护数据, 实现对宿管、运维等工作人员的考核分析和其他大数据分析。

#### 四、结束语

在“互联网+教育”新模式背景下, 构建一个基于大数据分析, 管理高效、业务融合、高度集成的综合性智慧宿舍管理平台, 是高校管理事业发展的主要诉求。由于智慧宿舍管理涉及的业务内容复杂繁多, 在平台建设期间, 需要校内相关业务管理部门通力协作, 力争数据开放共享, 业务高度融合。同时, 规范化的宿舍管理体系运行过程中, 为保证各项业务管理有效有序开展, 需要打造一个具有信息化素养的专业管理团队。本文构建的平台紧跟信息化智慧化时代潮流, 采用大数据和业务高度融合的思路, 利用信息化手段精准掌握学生在校动态, 真正意义上实现智慧宿舍管理, 为高校学生提供个性化需求与服务, 为校园管理者提供科学的决策支持, 打造良好的四个智慧化服务和三个育人环境。

#### 参考文献:

- [1] 李长保, 金鑫. “互联网+”背景下高校教育管理信息化的建设研究[J]. 黑龙江教师发展学院学报, 2024, 43(2): 66-69.
- [2] 孙丽丽. “互联网+教育”对基础教育教学的影响[J]. 甘肃教育研究, 2024(1): 84-86.
- [3] 支金满. “互联网+”大数据时代数据科学的发展方向及应用分析[J]. 数字技术与应用, 2024, 42(1): 137-139.
- [4] 张祯巍. 基于数据挖掘技术的高校智慧宿舍系统的研究与实现[D].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 2019.
- [5] 李涵, 傅文鸿, 范昱煊, 等. 基于数据挖掘技术的宿舍智能分配系统[J]. 微处理机, 2021, 42(3): 31-34.
- [6] 徐凯. 基于高校智慧校园平台大数据的学生行为研究[D]. 广州: 广东工业大学, 2021.
- [7] 唐瑞明, 谭倩芳. 高校宿舍信息化管理系统设计[J].

电子技术与软件工程,2023(4):258-262.

[8]陶俊岚,王烽元,王伊文,等.基于物联网的信息化智能宿舍管理系统设计与实现[J].电脑编程技巧与维护,2021(2):138-139,158.

[9]徐玉惠.注重宿舍文化建设: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建设的关键所在[J].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2025,38(8):104-105,108.

[10]刘合富,史永银,江迎春,等.信息化 2.0 背景下高校智慧宿舍建设模式研究[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2020,54(2):218-223.

[11]梁利亨.基于人脸识别技术的“智慧宿舍”管理平台设计[J].石家庄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0,32(2):10-15.

[12]张霞,范亚楠,刘岩.高校公寓管理中育人路径研究[J].高校后勤研究,2022(2):26-28.

[13]李龙胜,闫向东,陈明泉.建设智慧化服务育人的后勤管理平台研究[J].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0,20(3):18-21.

[14]马洪丽.基于 KPI 的企业绩效管理体系优化研究[J].现代商业,2024(1):153-156.

[15]戴昀.基于大数据的 K-means 聚类算法的网络安全监测应用研究[J].信息记录材料,2023,24(4):140-142.

[16]杨文君,刘新,薛宝平,等.基于教育大数据分析的高校学生行为预警研究[J].现代职业教育,2020(40):20-21.

[17]任彦龙,孙绪华,康健.北京建筑大学大数据分析让高校精准掌握学生动态[J].中国教育网络,2019(6):72-74.

## The Construction Model of Smart Dormitori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Based on Big Data Analysis

RUAN Meng-hui, CHEN Yang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ngineering Education, Anhui Polytechnic University, Wuhu Anhui 241000, China)

**Abstract:** Analyzing the current needs and problems faced by dormitory management in variou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 construction model of smart dormitori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based on big data analysis is proposed. By integrating dormitory-related business system data and business applications, we build a complete comprehensive smart dormitory management platform to achieve a high degree of integration of various related systems and dormitory-related businesses and low-cost, high-efficiency dormitory business management. At the same time, big data clustering technology is used to analyze the data produced by the smart dormitory management platform to provide personalized needs and services for college students, provide scientific decision-making support for campus managers, and create good four smart services and three education human environments.

**Key words:** big data analysi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mart dormitory management platform; decision-making support

#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的重重维度

杨梓因

(西南石油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成都 610000)

**[摘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也是思政课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在新时代思政教育不断创新发展背景下,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对于增强思政课价值引领、提升思政课教学创新、增强学生文化自信具有重要的作用。二者融合过程中,需始终秉持三大原则:坚持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统一、创新性与原则性相统一、系统性与特殊性相统一。同时,要不断完善教育内容、整合育人平台、加强队伍建设,充分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育人价值。

**[关键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政课实践教学;文化自信

**[作者简介]**杨梓因(1999—),女,四川宜宾人,西南石油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硕士,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DOI]** <https://doi.org/10.62662/kxwzz0210005>

**[中图分类号]** G641

**[本刊网址]** [www.oacj.net](http://www.oacj.net)

**[投稿邮箱]** jkw1966@163.com

习近平总书记对学校思政课建设作出重要指示,“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为内容支撑,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力量根基,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守正创新推动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不断提高思政课的针对性和吸引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肩负着培根铸魂、启智润心的历史使命。当前,随着“大思政课”建设理念的深入推进,实践教学作为联通理论认知与价值体认的关键环节,亟需激活更强有力的生命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与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在育人目标、价值导向、方法路径等方面具有高度的耦合性,为破解实践教学表层化、同质化困境提供了破解路径。

##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能思政课实践教学的内生动力

作为中华民族五千余年文明演进中形成的本土文明成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成了民族精神的文化基因与核心价值体系,不仅为思政课实践教学提供了精神支撑,更是增强价值引领、提升教学创新、厚植文化自信的重要依托。

### (一)增强价值引领:筑牢立德树人的文化根基

在新时代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沃土,始终贯穿于个体社会化进程的初始阶段。“盘古开天”所彰显的开拓精

神、“精卫填海”蕴含的坚韧品格、“夸父逐日”体现的进取意识等传统神话体系,构成了中华民族精神谱系最初文化符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向世界青年发展论坛致贺信中强调:“各国青年要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以实际行动推进全球发展倡议”。青年是民族复兴的中坚力量,更是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生力军。一方面,利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好“德育课”,是提升思政引领力的需要。育人先育“德”,“德”的培育是教育发展的根基,不断强化核心素养培育的价值引领功能,才能保障育人方向的正确性,培养适应国家战略需求的高素质人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大量“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中华美德,通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思政教育的融合,将传统精神资源进行现代性转化,使思想政治教育在培根铸魂过程中兼具历史厚度、理论深度与情感温度,更好地发挥思政引领力的作用。另一方面,利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好“文化安全课”,有效地抵制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在快节奏、高强度的智能时代,作为“数字化时代土著民”的“Z世代”青年,呈现出视野开阔、意识超前、思维活动等特点,表现出更强烈的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同时也受到泛娱乐化思潮的负面冲击,信息真假难辨、谣言四起、流量造假等现象屡禁不止。同时,美国等西方政府抓住一切机会对我国进行打压遏制。无孔不入的

政治渗透,呈现出组织化、系统化、精细化的趋势,形式更加隐蔽,对象更加精准,手段更加现代化。面对这一挑战,要加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思政课融合,打造青年喜闻乐见的“国潮”内容,提升青年价值认同,增强青年文化抵御力,让青年在古今对话中筑牢价值根基,成为兼具家国情怀与全球视野的时代新人。

(二)提升教学创新:激活“社会大课堂”的文化基因

北宋大儒张载以“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塑造了中华文化中“士人精神”的核心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济世安民”的使命感和对文化传承、社会理想的不懈追求。思政课是青年从“小我”跨越至“大我”的关键环节,“讲好文化的道理,把直接关涉文化的教学重点难点阐释清楚、讲解透彻,是讲好思政课道理的题中之义”。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思政课实践教学提供丰富的素材。在内容上,馆藏文物与历史遗迹为思政教育提供了生动教材,具象化的呈现使治国智慧、变革理念、价值追求不再是抽象概念,而是可触可感的文化基因。在形式创新方面,现代科技与传统文化的融合,构建起“知、情、意、行”相统一的思政教育新模式。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入有效激发了学生的主动性。《哪吒之魔童降世》的现象级传播、《黑神话:悟空》的文化破圈、国潮设计风靡,都印证了青年群体对传统文化价值的深度认同,将理论知识用青年喜闻乐见的方式展开,让知识接收从“被动接受”到“主动探索”。从《论语》“己欲立而立人”的仁爱之道,到《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的民本思想;从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家国情怀,这些承载着民族精神的文化瑰宝,为青年构建正确的价值坐标提供了历史参照,将其融入思政课实践教学中,能充分发挥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监督作用。

(三)厚植文化自信:构建民族复兴的精神坐标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独特精神标识,是中华文化的“本”和“源”。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全球化与文明互鉴的交织背景下,文化自信既是我们应对西方文化霸权的话语武器,更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根基。青年强,则国家强,民族兴。青年正处于人生的“拔节孕穗期”,思政课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更有利于青年感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深厚底蕴,厚植文化自信。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政课实践教学,为培育时代

新人提供了新路径。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政课要立足传统文化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协和万邦”等深刻内涵,把中国道理、中国精神讲深、讲透,破除对西方理论体系的盲目崇拜,让青年在多元文化碰撞中建立起独立自主的价值判断,提升文化认同感而不是简单的情感共鸣,最终成长为在全球对话中保持战略定力的有志气、有骨气、有底气的时代新人。另一方面,运用思政课,有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天人合一”的生态观转化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支撑,组织学生开展民俗调研、非遗技艺体验等实践活动等,将“仁爱”“天下为公”等核心理念嵌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并付诸于实践的方式,使传统文化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之路上焕发新机,为构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培育了兼具历史眼光与创新能力的传承者。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政课实践教学的基本要求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思政课的源头活水,为实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供了丰富养料,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要坚持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统一、坚持系统性与针对性相统一、坚持创新性与原则性相统一等基本要求。

(一)坚持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统一

思政课实践教学作为思政课理论教学向“社会大课堂”的补充与拓展,根植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方法论,肩负着传播党的创新理论、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教育使命,体现了其鲜明的理论性。同时,思政课实践教学是提升大学生的理论阐释能力、社会实践能力、网络行为能力的重要教学活动,必须凸显思政课教学的实践性向度。理论最终是为了指导实践,“第二个结合”只有落实到一个个具体领域之中,才能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发挥实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政课实践教学,如果只强调理论灌输而忽视实践锻炼,容易导致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流于空泛,陷入“纸上谈兵”的困境。反之,如果只注重实践活动而缺乏理论深度,学生无法理解文化内涵和历史背景,无法形成系统的文化认知,更无法实现自我反思、自我完善和自我更新的教育目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政课实践教学,应该坚持理论性与实践性的辩证统一,理论性是实践性的基础,实践性是理论性的延伸,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在教学中,既要注重理论讲授,帮助学生构建系统的文化认知体系,又要设计丰富的实践活动,让学生在亲身参与中深化对文化的理解。同时,实践教学与

理论灌输应相互渗透、相互促进。在“认识—实践—再认识—再实践”的螺旋式上升循环中,培养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与社会主义建设者。

### (二)坚持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统一

思想政治教育守正是前提,创新是源头活水。只有创新才能面对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不断丰富和完善学科基础理论。在教学实践中,需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彰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遵循思想政治工作规律、教书育人规律、学生成长规律,这些都体现出其鲜明的原则性。在Z世代深度数字化生存与圈层化传播的时代语境下,传统“我说你听”的单向灌输模式已难以触达青年群体的认知深处。随着VR、AI等技术的兴起,思政课正突破平面化、静态化的知识呈现范式,以3D立体化、动态交互化的教学形态重塑传播路径与诠释方式,彰显出突出的创新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政课实践教学,若片面强调原则性而忽视创新性,将导致思政教育的系统僵化与时代脱节。一味求新求变、过度依赖技术工具、盲目迎合流行文化,这样的教育方式虽然具有表层吸引力,但是内容“空心化”严重,导致青年容易被西方的错误思潮牵着鼻子走,背离思政教育培根铸魂、启智润心的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是守正创新的民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政课实践教学,要坚持创新性与原则性辩证统一,才能既保持教育内容的思想深度,又增强传播方式的时代效度,真正实现思政课在“守正”中“创新”、在“创新”中“固本”的内涵式发展。一方面,要以原则性为锚点,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精髓,与新时代理念相贯通,引导学生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智慧回应时代之问,增强青年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认同感及投身基层的责任感;另一方面,以创新性为引擎,善用数字技术打造案例式、体验式、互动式课堂,用青年喜闻乐见的形式激活文化生命力,培养出既能深谙“何以中国”的文化自觉,又具“创造未来”的创新能力的时代新人。

### (三)坚持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统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政课实践教学是一项系统性工程,要遵循整体性、层次性的育人规律,构建覆盖全过程的育人链条。从纵向看,构建大中小学一体化的教学体系,实现文化传承的循序渐进,从横向看,要统筹课堂讲授、社会实践、网络学习等多维场域同频共振、共同发力。同时,也要立足地域文化特色和资源禀赋,实现差异化、精准化的教学设计,彰显其特殊性。在思政课实践教学过程中,若过度强调系统性而忽视特殊性,会导致文

化育人流于形式化、教条化;反之,若片面追求特殊性而弱化系统性,则易陷入文化碎片化。因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政课实践教学,要坚持系统性与特殊性辩证统一。一方面,在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上应该进行系统化的设计,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统领,围绕家国情怀、伦理道德、人文精神等维度,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典籍思想、历史典故、艺术形态等文化元素提炼为可融入思政实践教学课程,并配套开发覆盖全学段的教学评价体系,实现教学目标、内容、成效、评价的闭环管理;另一方面,我国地域辽阔,文化资源呈现“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的鲜明特征,为思政课实践教学提供了独特素材。高校要立足本地文化优势,依托文物古迹、革命老区、民族特色等,开发因地制宜的特色教学,避免“千校一面”的同质化倾向;着力打造既坚守文化内核,又彰显地域特色的思政课,实现“各美其美”与“美美与共”的有机统一,真正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滋养青年成长的活水源头。

##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政课实践教学的实践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建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国,应当具有强大的思政引领力。思政课实践教学作为落实这一战略部署的重要载体,既是打通“知”“信”“行”转化链条的关键环节,更是构建“大思政课”育人格局的支点。利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上好思政课实践教学,可以从完善教育内容、整合育人平台、加强队伍建设三个方面,提升思政引领力。

### (一)完善教育内容:构建文化浸润的育人内容体系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关键在于形成具有文化浸润力的育人内容体系。这需要从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的结合中寻找突破口,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融通,形成“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教学闭环。第一,加强顶层设计。打破学科壁垒,组建专项工作小组,定期召开专题研讨会,设立专项研究课题,设定教学课时占比、学生参与率、成果转化量等量化指标。同时,构建分层分类的课程内容体系,根据不同学科专业特点与学生认知规律,制定差异化的融入方案。第二,强化价值引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丰富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加强家国情怀教育、社会责任教育、人格素养教育。同时,也要重视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的浸润,通过礼仪规范养成、民俗节庆体验、艺术实践创作等生活化场景,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融入日常学习生活,使学生在潜移默化

化中感悟文化精髓,培养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第三,完善评价机制。将文化认知深度、价值内化程度、行为外化效果纳入考核框架。通过学生参与实践活动的频次、质量及日常表现,结合小组互评、导师评价、社会反馈等多主体评价,建立量化与质性相结合的评估模型。同时,强化评价的育人导向,将学生对核心理念的阐释能力、文化自信的实践表达、家国情怀的行动外化作为核心考察点,通过主题辩论、文化展演、社会调研报告等载体,考察其从“知”到“行”的转化效能,推动文化育人目标落地见效。

(二)整合育人平台:搭建资源融合的实践创新载体

“大思政课”建设要成其“大”,核心在于善用“大资源”。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度融入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既是提升思政教育实效性的必然要求,也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重要路径。一是要充分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学资源平台。立足地方特色,建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学素材库,依托当地博物馆、红色遗址、非遗传承基地等资源,建立分课群、分主题的教学资源数据库,系统整合文献典籍、影像资料、口述史等多元素材,形成兼具普遍性与独特性的教学资源库,为课程提供鲜活案例。整合师资力量,打造示范精品课程,联合专家学者、优秀思政教师、文化传承人,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道理、学理、哲理与思政课的重点、热点、难点相结合,搭建可推广的教学框架,打造可共享的精品课程,形成可复制的育人范式。巧用数智技术,推进体系化教学资源库建设。运用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深度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提升智能检索与精准推送能力,高效对接教学重难点。二是要搭建“知行合一”的实践育人平台。校内,以活动为载体,定期举办红色主题演讲比赛、中华经典诵读,鼓励学生自编自演传统文化情景剧,让理论学习“活起来”,同时依托校园志愿服务、劳动教育第二课堂,将传统美德转化为实际行动,培养学生责任意识。校外,强化校地联动拓展实践场域,借助“三下乡”“返家乡”社会实践,组织学生开展田野调查、非遗技艺传承调研;与博物馆、文化馆共建实践基地,开展沉浸式研学活动;联合基层单位设立实训岗位,引导学生在乡村振兴、社区治理中践行传统文化价值,实现“知”的深化与“行”的转化。三是创建网络学习云平台,构建“数字思政”与传统文化深度融合的线上空间。整合学习通、中国大学MOOC等网络平台资源,依托VR/AR、AI、全息投影等技术搭建集资源整合、虚拟体验、互动交流于一体的云平台,将

传统文化经典文本、非遗技艺纪录片、历史场景复原影像等转化为可交互的数字资源。同时,联动B站、抖音、微博等社交平台,让网络空间成为培养文化自信的新阵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更富时代感的方式融入思政课实践教学。

(三)加强队伍建设:培育德才兼备的思政队伍

“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教师不仅是知识的传授者,更是学生价值观塑造的引路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思政课实践教学的深度融合,要打造一支德才兼备的双师型队伍,提升思政课实践教学质量,最终实现立德树人的根本目标。一是以高尚德行引领价值塑造,提高师资队伍“传道”能力。“传道”首在立德,教师队伍需以坚定的理想信念与高尚的道德情操为学生树立价值标杆,定期开展政治理论学习、职业伦理研讨等活动,帮助教师深刻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道德准则与精神追求,增强文化传承使命感。同时,思政课教师所传之道,不仅仅是科学文化知识,更包括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时代化的科学理论,是经实践证明的正确科学的理论,发挥着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新人的重要作用。思政课教师队伍作为传道者,情感上要厚植家国情怀,培养担当人民教育事业重任的精神主动与文化自觉;专业能力上既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加强对中华文明的深入研究,也要培养看世界的开拓眼光。二是以扎实素养夯实教学根基,提高师资队伍“授业”能力。“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扎实的知识功底、过硬的教学能力、科学的教学方法是思政队伍的基本素质。在知识功底建设上,高校建立常态化的培训机制,通过邀请专家学者开展经典研读、学术交流、跨学科研讨等理论学习及组织教师参与文化遗址实地考察等方式,助力思政队伍形成兼具理论厚度与学术锐度的知识储备。在教学能力提升上,遵循“教研相长”,将教学和科研相结合,鼓励教师将研究成果转化为实践资源,锤炼教师的教学设计、学情分析、价值引导及实践转化能力,形成“以研促教、以教带研”的良性循环。在教学方法创新上,鼓励教师运用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新技术,融合线上资源平台,采用体验式、互动式教学模式,增强学生主动性,确保教学兼具时代特征又富实际效能。三是以双师助力成长指引,提高师资队伍“解惑”能力。邀请文化传承人、行业专家担任兼职教师,定期到校园开展传统文化技艺传授、行业实践经验分享等课程,与校内思政教师组成教学团队,共同设计实践教学方案、指导学生项目,发挥各自优势,实现互补,强化思政课培根铸魂、启智润心的作用。

##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对学校思政课建设作出重要指示强调:不断开创新时代思政教育新局面 努力培养更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N]. 人民日报, 2024-5-12(1).
- [2] 习近平. 习近平向世界青年发展论坛致贺信[Z]. 新华社, 2022-7-21/2025-3-25.
- [3] 贾鹏飞. 论思政课“讲道理”的文化逻辑[J]. 思想理论教育, 2024(10): 65-70.
- [4] 赵义良. 以三种文化夯实思政课的力量根基[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24(6): 116-123.
- [5]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0.
- [6]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8.
- [7] 赵军, 张林.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课程思政的融合新路径——以设计类课程为例[J]. 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 2025, 38(10): 93-95.
- [8] 李丽斯.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高校思政课中的现代诠释与实践[J]. 教育科学文献, 2025, 2(7): 171-175.
- [9] 宋思语. 河南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路径探究[J]. 理论研究学刊, 2025, 1(2): 7-10.
- [10] 冯刚, 陈梦霖. 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的内涵、价值及其实现[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21(18): 4-9.
- [11] 唐明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及其实现[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24(8): 142-150.
- [12] 彭长华. “两个结合”赋能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路构建[J]. 思想战线, 2024, 50(3): 152-161.
- [13] 沈壮海, 刘水静. 深刻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守正创新的精神特质[N]. 光明日报, 2023-12-14(6).
- [14] 习近平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 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朝着建成教育强国战略目标扎实迈进[N]. 人民日报, 2024-9-11(1).
- [15] 张丽, 张建越. “大思政课”善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路径探析[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25(3): 71-74.
- [16] 仲帅, 李佳. 思政课教师厚植家国情怀的生成逻辑、核心要义与实践进路[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25(1): 104-111.

###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Integrating China's Outstanding Traditional Culture into the Practical Teaching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YANG Zi-yin

(School of Marxism, Southwest Petroleum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00, China)

**Abstract:** China's outstanding traditional culture represents its most profound cultural soft power and serves as a rich nourishment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advance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ourses.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continuous innovation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during the new era, integrating China's outstanding traditional culture into the practical teaching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plays a vital role in enhancing the value guidance of these courses, elevating teaching innovation, and strengthening students' cultural confidence. Throughout this integration process, three core principles must be consistently upheld: unifying theoretical depth with practical application, balancing innovation with foundational principles, and harmonizing systematic approaches with contextual specificity. Concurrently, efforts should focus on refining educational content, consolidating pedagogical platforms, and strengthening faculty development to fully leverage the educational value of China's outstanding traditional culture.

**Key words:** China's outstanding traditional culture; practical teaching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cultural confidence

# 产教融合视域下高职学生创新能力评价体系构建研究

张 豪

(武汉交通职业学院,湖北武汉 430065)

**[摘 要]**本文基于产教融合背景,聚焦高职学生创新能力评价问题,通过构建包含创新知识基础、创新学习能力、创新思维能力和创新实践能力4个准则层及12项指标的评价体系,综合运用层次分析法(AHP)确立指标结构,结合熵权法客观赋权,并借助TOPSIS模型对湖北省9所高职院校868名学生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创新实践能力权重最高(28.68%),实操能力、发现问题能力和创新成果为主要影响因子。学生整体创新能力平均值为0.4908,差异显著。建议高职院校加强实践教学、问题导向训练与成果认证,以提升学生创新能力。该研究为高职院校创新能力评价提供了科学依据与实践路径。

**[关键词]**产教融合;高职学生;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熵权TOPSIS法

**[作者简介]**张豪(1991—),男,湖北武汉人,武汉交通职业学院讲师,理学硕士,研究方向:创新创业教育、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4年湖北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研究课题“产教融合视域下高职院校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的协同机制及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4Z249)。

**[DOI]**<https://doi.org/10.62662/kxwzx0210006>

**[中图分类号]**G711

**[本刊网址]**[www.oacj.net](http://www.oacj.net)

**[投稿邮箱]**[jkw1966@163.com](mailto:jkw1966@163.com)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要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改进人才培养模式,加强拔尖人才培养,着力加强创新能力培养。要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完善青年创新人才发现、选拔、培养机制。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2025—2029年)的通知》指出坚持产教融合,提升高职学校服务产业转型升级的能力;加强学生认知能力、合作能力、创新能力和职业能力培养。《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指出完善拔尖创新人才发现和培养机制。着力加强创新能力培养;深化高校人才评价改革,突出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科学认定标志性成果。因此,深化产教融合背景下,高校如何客观评价学生创新能力显得尤为重要。

## 一、文献综述

关于创新能力定义,国内外已有较多研究。美国心理学家吉尔福德(J. P. Guilford)认为创新能力是一种智力素质,其核心是分歧思维。斯坦伯格(1996)从创新能力的产出结果的角度,认为创新能力需要具备新颖性和适切性。科克(Cox, 2015)从实践的角度,认为创新能力由认知能力、知识和人格构成,它是一种综合能力。就国内研究而言,张

宝臣(2002)认为大学生创新能力包括创新意识、思维和技能,其中创新思维占据主导地位。安江英等人(2006)认为大学生的创新能力一方面是对旧知识的创新、重组和新的运用;另一方面是将学习的新思想、新技术、产品进行创造性的改变。宋彬等人(2015)把大学生创新能力分为专业性知识、理论性知识、具体操作中的知识和综合运用的相关知识四类。

关于大学生创新能力评价研究,目前主要针对不同类型对象进行研究,如卜宪锋(2024)从增值评价视域出发研究了高职类学生的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刘文彬等人(2023)对本科生创新能力评价体系的构建展开了研究,构建涵盖创新意识、创新思维能力、创新实践能力的评价体系;徐晓明等人(2023)从师生共建角度探讨了研究生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并开展了实证检验;孙静宇等人(2025)指出目前高职学生创新能力评价体系的研究尚未进入纵深化阶段,创新能力评价体系作为一个动态发展的体系,需要根据实际调整相关评价指标。

随着产教融合对高职院校的教学和学生创新能力的不断提高,在进行创新教育深化改革的同时亟需建立一套科学、全面、客观、合理的高职学生创

新能力评价体系。

## 二、基于 AHP 的高职学生创新能力评价体系构建

层次分析法(AHP)是由美国运筹学家萨蒂提出的一种多目标决策分析方法,其核心思想是通过构建层次化结构模型,将复杂问题分解为目标层、准则层和因素层等不同层次,结合定性与定量分析,确定各层次要素的权重,最终通过加权综合实现决策优化。本文采用 AHP 法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的层次结构,将创新能力指标体系分成三级结构,并将与评价目标有关的因素分解成目标层(Z)、准则层(Y)、指标层(X)等层次。

高职院校学生创新能力指标体系是一个由多种评价要素构成的复杂系统,评价内容广泛,涉及因素多,因此需要因校制宜,采取多维度设计。因此,组建高职院校学生创新能力评价指标确定小组,其中双创课程专职教师 2 人,职业规划课程专职教师 2 人,高职院校毕业的创业者 2 人,在校学生 2 人,因考虑以企业需求为导向,小组中有 4 人来自用人单位。小组成员通过对李京和白钰莹等人的研究成果进行研究分析,遵循评价指标设计的科学性原则、全面性原则和可操作性原则的基础上,提出 4 个高职院校学生创新能力主要指标。一是创新知识基础,是指学生在快速变化的时代下,广泛而深厚的知识基础有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 and 吸收新知识,促进知识的融合与跨界创新,是提升创新能力,应对复杂挑战的关键。创新知识包括素质课程知识、专业课程知识和创新知识。二是创新学习能力,是指学生在追求新知、解决问题和推动变革过程中展现出的关键能力。它不仅仅是对现有知识的吸收和掌握,更侧重于通过新颖的方式整合、应用和发展知识,以创造出新的价值或解决方案,是评价高职院校学生创新能力的指标之一。创新学习能力获取信息能力、发现问题的能力 and 更新知识的能力。三是创新思维能力,是指学生突破既有的经验局限,打破常规,在前人理论和实践基础上实现超越的一种思维能力。这种能力体现在人们能够善于因时制宜、知难而进、开拓出新等多个方面。其特征是创造性、灵活性以及多向性;其内容包括逻辑思维、求异思维和创新想象。四是创新实践能力,是指学生将创新思维成果付诸实施并取得预想结果的能力,它是创新思维能力与实践操作的有机结合,高职院校学生所掌握的技能是创新能力的基本保障。主要包括实践操作能力、创新成果、实践成绩等。

根据层次分析法,建立目标层、准则层、指标层和指标要素四层级模型。目标层为大学生创新能

力,准则层包括创新知识基础( $Y_1$ )、创新学习能力( $Y_2$ )、创新思维能力( $Y_3$ )和创新实践能力( $Y_4$ )四个部分。创新知识基础包括的指标层为素质课程水平( $X_{11}$ ):第二课堂学分;专业课程水平( $X_{12}$ ):专业课程成绩;创新知识水平( $X_{13}$ ):创新课程成绩。创新学习能力包括的指标层为获取信息能力( $X_{21}$ ):信息收集、分析、判断和应用;发现问题能力( $X_{22}$ ):主动学习、捕捉新信息和发现问题;知识更新能力( $X_{23}$ ):专注各领域知识更新和最新成果。创新思维能力包括的指标层为逻辑思维能力( $X_{31}$ ):运用定理、公式等进行归纳、演绎;求异思维能力( $X_{32}$ ):突破思维定式、能从多维度思考问题;创新想象能力( $X_{33}$ ):利用表格、图形、符号进行想象。创新实践能力包括的指标层为实际操作能力( $X_{41}$ ):善于将理论转换为实践,动手能力强;创新实践成果( $X_{42}$ ):参加技能大赛获奖情况;技能证书获取( $X_{43}$ ):获取职业资格和技能证书情况。

## 三、研究设计

本文基于熵权 TOPSIS 模型,即逼近理想解的排序方法测量高职学生创新能力,熵权法是依照各指标间的偏差程度,利用信息熵计算出指标的熵权,再通过熵权进一步确定指标权重。指标熵越小,熵权越大,该指标越重要。通过计算目标靠近(或偏离)最优解、最劣解的程度来评价创新能力,可以客观地反映学生创新能力,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步骤。

第 1 步:构建初始评价矩阵  $X = (x_{ij})_{m \times n}$ ,其中  $i$  表示待评价对象, $j$  表示评价指标。

第 2 步:标准化矩阵  $R$ ,采用极差法对矩阵  $X$  进行归一标准化得到矩阵  $R$ 。

$$R_{ij} = \begin{cases} r_{ij} = \frac{x_{ij} - \min(x_{ij})}{\max(x_{ij}) - \min(x_{ij})}, x_{ij} \text{ 为正向指标,越大越好} \\ r_{ij} = \frac{\max(x_{ij}) - x_{ij}}{\max(x_{ij}) - \min(x_{ij})}, x_{ij} \text{ 为负向指标,越小越好} \end{cases}$$

第 3 步:计算评价指标  $R_{ij}$  的信息熵,确定指标权重  $w_i$ 。

$$H_i = -\frac{1}{\ln m} \sum_{i=1}^m \left[ \left( R_{ij} / \sum_{i=1}^m R_{ij} \right) \ln \left( R_{ij} / \sum_{i=1}^m R_{ij} \right) \right]$$

第 4 步:计算评价指标  $W_j$ 。

$$W_j = (1 - H_j) / \sum_{j=1}^n (1 - E_j)$$

第 5 步:构建指标加权矩阵  $C = (c_{ij})_{m \times n} = W_j \times R_{ij}$ 。

第 6 步:计算正、负理想解。分别是最优解和最劣解。

$$X_j^+ = \max_i C_{ij}, X_j^- = \min_i C_{ij}, j = 1, 2, \dots, m$$

第 7 步:计算评价对象到正、负理想解的距离,

$d_i^+$  为各参评对象到正理想解的距离,  $d_i^-$  为各参评对象到负理想解的距离。其中:

$$d_i^+ = \sqrt{\sum_{j=1}^m (d_{ij}^+)^2}; d_i^- = \sqrt{\sum_{j=1}^m (d_{ij}^-)^2},$$

$$\text{而 } d_i^+ = X_j^+ - C_{ij}, d_i^- = X_j^- - C_{ij}$$

第 8 步:计算评价对象与理想解的贴近度  $d_i = \frac{d_i^-}{d_i^+}, 1 \leq i \leq n$ , 其取值在 0 ~ 1 之间, 贴近度越大, 表明创新能力越高。

四、实证分析

设计的调查问卷包括 4 道基本信息:学校、性别、所在年级;以及针对上述 12 个指标的 12 道创新能力表现题,均按李克特量表法设置 5 个等级,非常符合 5 分,符合 4 分,较为符合 3 分,不符合 2 分,非常不符合 1 分,其中“创新知识基础”指标部分按实际分数分段设置 5 个等级,并面向湖北省 9 所高职院校,各发放 100 份问卷,累计 900 份,回收有效问卷 868 份,回收率 96.44%。先对调查问卷的信度和效度进行检测。

本文采用 Cronbach's Alpha 系数分析测量项之间的相关性。团队采用 Python 软件对问卷进行检测,表 1 检测结果显示,指标各维度的检测系数都在 0.7 以上,问卷的总体系数为 0.923,说明问卷具有较高的信度。

表 1 Cronbach's Alpha 检测

| 评价指标   | 指标个数 | Cronbach's Alpha 系数 |
|--------|------|---------------------|
| 创新知识基础 | 3    | 0.715               |
| 创新学习能力 | 3    | 0.802               |
| 创新思维能力 | 3    | 0.736               |
| 创新实践能力 | 3    | 0.753               |
| 汇总     | 12   | 0.923               |

本文采用 KMO 检测和 Bartlett 的球形检测来检验问卷效度。经检验所得表 2 的结果发现,评价指标的 KMO 值大于 0.8,说明指标相关性合理;Bartlett 的球状度检验显著性为 0.0125,小于 0.05,适合作为指标分析。

表 2 KMO 和 Bartlett 的球形检验

|                |                  |          |
|----------------|------------------|----------|
| KMO 取样适切量数     |                  | 0.941    |
| Bartlett 的球形检验 | 近似卡方( $\chi^2$ ) | 94524.21 |
|                | 自由度(df)          | 66       |
|                | 显著性(sig)         | 0.0125   |

通过前期面对 868 名学生的问卷调查所获创新

能力评价数据,采用熵权法得到各指标权重,如表 3 所示。

表 3 熵权法计算权重结果汇总

| 指标项    | 权重系数   |
|--------|--------|
| 第二课堂水平 | 0.0737 |
| 专业课程水平 | 0.0771 |
| 创新知识水平 | 0.0870 |
| 获取信息能力 | 0.0749 |
| 发现问题能力 | 0.0962 |
| 知识更新能力 | 0.0687 |
| 逻辑思维能力 | 0.0774 |
| 求异思维能力 | 0.0875 |
| 创新想象能力 | 0.0705 |
| 实际操作能力 | 0.1051 |
| 创新实践成果 | 0.0922 |
| 技能证书获取 | 0.0895 |

从评价结果发现,指标创新知识基础占比 23.78%,创新学习能力占比 23.98%,创新思维能力占比 23.54%,创新实践能力占比 28.68%,表明实际能力是评价学生创新能力的重要指标。由此可以发现,影响力最大的因子是创新实践能力,而且相比其他三个准则指标高出近 5 个百分点,说明在大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中,创新实践能力的培养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TOPSIS 模型求解创新能力,通过 TOPSIS 模型结合上述指标权重求解学生与理想解的相对接近度  $d$ ,即衡量学生创新能力的指标。经计算,调查的 868 名学生的创新能力平均值( $M$ )为 0.4908,标准差(SD)为 0.1692,整体创新能力不高,而且差异性较大。

五、结论

本研究基于 AHP 分析法对调研访谈获得的数据进行主观分析构建大学生创新能力评价体系,利用熵权法对 868 位大学生的调研数据进行客观权重分析,确定 12 项指标权重,最后运用 TOPSIS 模型求解调研对象的创新能力。研究发现,影响权重最大的为创新实践能力,其次为创新学习能力、创新知识基础和创新思维能力。在 12 项指标中,实际操作能力、发现问题能力和创新实践成果指标权重位列前三,在大学生创新能力评价中有着重要影响。基于以上结果,本研究提出加强学生实践实训,提升学生实践操作能力,有意识地培养学生发现问题的能力,同时加强创新实践成果的认证和引导。

##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N]. 人民日报, 2024-7-22(1).
- [2] 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2025—2029 年)的通知[EB/OL]. [https://www.eol.cn/zhengce/wenjian/202502/t20250219\\_2655130.shtml](https://www.eol.cn/zhengce/wenjian/202502/t20250219_2655130.shtml), 2025-2-19.
- [3]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 年)》[N]. 人民日报, 2025-1-20(6).
- [4] 张立. 新形势下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问卷调查及对策研究[D]. 福州: 福建师范大学, 2020.
- [5] 张宝臣. 现代教育理论与实践[M].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 [6] 安江英, 田慧云. 我国高校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和实践[J]. 中国电力教育, 2006(1): 10-15.
- [7] 宋彬, 庄寿强, 彭宗祥. 基于产学研结合的高职创新创业人才培养体系研究[J]. 时代教育, 2015(16): 115-117.
- [8] 卜宪锋. 增值评价视阈下的高职学生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研究[J]. 现代职业教育, 2024(1): 117-120.
- [9] 刘文彬, 王月琴. 医学院校公共事业管理专业本科生创新能力评价体系构建研究[J]. 福建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24(3): 28-32.
- [10] 史晓青, 刘涛, 黄海燕. 高职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现状与对策研究[J]. 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 2024, 37(24): 19-21.
- [11] 徐晓明, 周海. 师生“双主体”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与实证检验[J]. 创新创业理论与实践, 2023, 6(23): 11-17.
- [12] 孙静宇, 陈丹. 基于 AHP-熵权法的大学生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研究[J]. 齐鲁工业大学学报, 2025, 39(4): 53-60.
- [13] 崔峰, 曹洁. 产教融合视角下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素养评价研究[J]. 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5, 45(2): 73-79.
- [14] 宋兵, 陈金波, 刘文. 高职院校学生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研究[J].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3(6): 51-53.
- [15] 李京. 高职院校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研究[D]. 石家庄: 河北师范大学, 2019.
- [16] 白钰莹. 数学建模竞赛参与对大学生创新能力影响的研究[D]. 哈尔滨: 东北农业大学, 2021.
- [17] 王学颖, 刘馨泽. 基于熵权 TOPSIS 模型的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质量评价[J]. 沈阳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8, 36(1): 47-51.
- [18] 徐金诚. 基于熵权 TOPSIS 模型的高职学生创新创业能力评价研究[J]. 创新创业理论与实践, 2024, 7(24): 186-188.
- [19] 李璠. 基于 OBE 理念的大规模在线教学课程评价指标体系设计——以《计算机程序设计基础》为例[J]. 南昌工程学院学报, 2021, 40(5): 103-108.
- [20] 赵嘉, 谭德坤, 陈娟, 等. 产教融合视域下应用型高校专业学位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的影响因素与路径探索[J]. 南昌工程学院学报, 2025, 44(2): 77-83.

##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of an Innovation Capability Evaluation System for Higher Vocational Stud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ZHANG Hao

(Wuhan Technical College of Communications, Wuhan Hubei 430065,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context of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evaluation of innovation capability among higher vocational students. By constructing an evaluation system comprising four criterion layers—innovative knowledge base, innovative learning ability, innovative thinking ability, and innovative practical ability—along with 12 specific indicators, the study employs 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 to establish the indicator structure. The entropy weight method is applied for objective weighting, and the TOPSIS model is used for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868 students from nine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n Hubei Province.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novative practical ability carries the highest weight (28.68%), with practical skills, problem-identification ability, and innovative achievements being the primary influencing factors. The average innovation capability score of the students is 0.4908, indicating significant variations. It is recommended that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strengthen practical teaching, problem-oriented training, and achievement certification to enhance students'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This study provides a scientific basis and practical pathway for evaluating innovation capability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Key words:**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higher vocational students; innovation capability; evaluation indicator system; entropy weight-TOPSIS method

# DeepSeek 在轨道交通教育数字化转型中的创新与应用

刘林凡<sup>1</sup>, 周丽芸<sup>2</sup>

(1. 华东交通大学电气与自动化工程学院, 江西南昌 330000;

2. 江西工业贸易职业技术学院信息工程系, 江西南昌 330000)

**[摘要]**轨道交通专业的数字化转型是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然而, 现阶段专业却面临着理论与实践脱节、教学内容更新滞后、优质资源分配不均及个性化学习不足等多方面问题。近年来, 以 DeepSeek 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 具有人机交互模式, 为解决上述难题提供了有效途径。DeepSeek 充当智能增强工具、教学辅导员、个性化学习顾问、学习效果评价员和校企合作桥梁等多重角色, 能够充分融入学校的教学过程。本文从轨道交通专业数字化转型的实际困难出发, 详细描述 DeepSeek 在其中扮演的多种角色, 并探索其赋能教育教学的实践路线, 为实现轨道交通领域教育的高质量、智能化发展提供实践指导。

**[关键词]**生成式人工智能; 轨道交通专业; 数字化转型; 教学改革

**[作者简介]**刘林凡(1989—), 男, 湖北黄冈人, 华东交通大学电气与自动化工程学院讲师, 博士, 研究方向: 交通安全管理。周丽芸(1992—), 女, 江西南昌人, 江西工业贸易职业技术学院信息工程系助教, 研究方向: 数据分析与安全管理。

**[DOI]** <https://doi.org/10.62662/kxwxz0210007>

**[中图分类号]** G434

**[本刊网址]** [www.oacj.net](http://www.oacj.net)

**[投稿邮箱]** [jkw1966@163.com](mailto:jkw1966@163.com)

数字化是未来发展的重要趋势和推动教育变革的重要力量,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进教育数字化, 建设全民终身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在国家战略的指引下, 轨道交通教育数字化转型正在加速进行。当前, 轨道交通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仍显滞后, 出现人才供给与产业需求之间不匹配的现象。全国高校广泛开展教育数字化应用实践, 推动数字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常态应用和深度融合, 利用人工智能等技术实现教育教学场景创新。本文在分析轨道交通领域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下, 探讨了 DeepSeek 在其中发挥的多重作用, 并结合实际案例提出了数字化转型的实践路径。

## 一、行业背景和人才培养需求

### (一) 轨道交通行业数字化转型背景

目前, 轨道交通行业数字化发展对轨道交通专业的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 轨道交通专业的教育体系也需提升, 通过教学改革培养符合社会要求的专业人才。

轨道交通行业数字化转型涉及物联网、6G 通信、数字孪生和大数据等多项关键技术。这些技术的应用不仅提高了轨道交通行业的安全性、可靠性

和快速性, 也对高等学校培养的学生提出了更高的专业技术要求。因此, 轨道交通专业的人才培养必须紧跟行业发展趋势。

### (二) 轨道交通行业数字化人才培养需求

我国城市轨道交通发展迅速, 网络规模不断扩大, 技术装备水平持续提高。与此同时, 各种数字化技术在城市轨道交通行业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因此, 轨道交通专业学生不仅要具备扎实的基础知识, 还必须具备数字技术能力和交叉创新能力。

1. 数字技术能力。高等院校培养的学生要求掌握自动驾驶、智能调度、智能运维、大数据分析等专业知识, 熟练操作新型电气设备, 具备大数据分析能力。

2. 交叉创新能力。要求轨道交通专业的毕业生能够将轨道交通专业知识与人工智能、机械工程、电气工程等其他专业知识交叉融合。除了专业技术知识, 学生还应学习经济学、管理学、法律等课程, 以培养其全面的视角和思维能力, 为未来的职业生涯打下坚实的基础。

## 二、现有轨道交通教育体系的不足

### (一) 教育理论与实践脱节

当前, 轨道交通专业的教育模式存在过于注重

传统的理论知识教学,忽视与实践结合的问题。专业和学科之间的壁垒导致跨学科培养受限。忽视新兴技术对轨道交通教育的促进作用,存在国际化视野不足、工程伦理教育缺位等问题。

### (二)区域教育资源分布不均

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区域差异显著。从地域分布上看,我国东部发达地区及京沪深等大城市汇集了密集的优质本科教育资源。这些高等院校师资力量强,教学设施完备和科研投入巨大。然而,中西部地区和偏远地区的本科院校,资源配置匮乏,科研经费紧张。这不仅导致不同地区学生接受教育的机会和质量存在差异,也加剧了人才的不合理流动,拉大了区域间的发展差距。

### (三)不满足学生个性化学习需求

传统的课堂讲授教育模式,采用“统一进度、统一要求”的方式。这种方式忽视了学生的个性化需求。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个性化学习,学习过程中更加凸显个体学习者的“高自主性”,即学习者和内容资源具有“高生成性”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之间,通过提问与追问等高频互动,形成不同的学习路径,满足个性化需求。

## 三、DeepSeek 在轨道交通领域数字化人才培养中的多重角色

### (一)课程内容生成工具

DeepSeek 作为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代表,通过深度强化学习、神经网络模型等技术,动态生成轨道交通专业学习内容、优化学习路径。可以实现 DeepSeek 在校内部署,自动生成与更新课程内容。DeepSeek 可以记录和理解学生的对话,并分析学生的认知水平与知识盲区。从中挖掘出学生的学习习惯,动态生成学生需要的学习内容。学生与 DeepSeek 交互过程中,实现每位学生知识与思维水平的启发式学习。

### (二)教学辅导员

在目前的教学过程中,教师不仅要承担课堂教学,还要投入大量精力进行科学研究,难以为每位学生提供课后个性化辅导。因此,DeepSeek 能够充当教学辅导员的角色。教师还可以通过 DeepSeek 分析教学大纲,自动生成教案、课件和习题。此外,DeepSeek 还能够实时为学生答疑解惑,并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提供学习报告,帮助教师提供个性化指导。

### (三)个性化学习顾问

DeepSeek 通过对学生学习内容的不断记录、分析等,详细了解学生的学习基础、课程进度、习题轨

迹和学习成效等显性特征,掌握学生学习内容偏好和学习动机等内在特征。进而,根据学生特征及时提供必要的学习资源和学习干预支持;DeepSeek 还可以充当学伴的角色,为学生进行学习内容规划与时间管理,实现学生学习路径的优化。

### (四)学习效果评价员

高等学校在教学评价过程中应该形成“人机共评、功能互补”的协同机制。将教师评价、学生自评、同伴互评和智能体评价结合,对教师的教学效果形成思维评价体系。在评价过程中,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提高数据分析的透明度。教师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对掌握评价结果进行溯源。学校需要联合企业设计大模型的生成机制,并且增加伦理约束,确保生成式人工智能接近人类的价值观,使其生成的内容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

### (五)校企合作桥梁

轨道交通教育的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学校需要加强与企业之间的合作。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作为校企合作的桥梁,促进学校与企业之间的资源共享。根据企业的技术需求,教师可以借助 DeepSeek 调整课程内容,确保学生所学知识满足企业需求。同时,学校和企业可合力突破行业难题,打造生成式轨道交通行业大模型,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按下加速键。

## 四、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应用争议

乌托邦的构想包含理想与隐忧的对立,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引发了教育工作者的担忧,包含:生成内容的准确性问题、生成式人工智能对教师角色的替代、学生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依赖及生成内容的伦理问题。因此,高等院校必须通过风险评估、数据治理和教学定位等措施,完善伦理框架,引导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健康。

### (一)生成内容的准确性不足

错误内容误导学生知识理解。数据质量、算法缺陷等问题会导致生成的学科知识准确性不够,影响学生对基本概念的正确理解,降低课堂教学质量。人工智能模型一般会优先保证输出内容的语义连贯性和语法正确性,往往难以完全校验信息的准确性。生成式人工智能普遍面临算法透明度不足的问题,其决策过程难以被全面解析和验证。比如,大模型在构建过程中可能嵌入了开发者的主观偏见,或受到含有偏见的训练数据污染,导致其可能会生成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悖的意识形态和内容。

## (二)生成式人工智能替代教师角色

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广泛应用,引发了人们关于教师会被替代的焦虑。专家认为,以 DeepSeek 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会逐渐替代教师的角色,导致教师出现职业倦怠。然而,轨道交通专业注重的是专业技能培养和实际操作。在实验课中,教师需要在课堂上进行实际设备操作演示,帮助学生掌握受电弓、变压器等电气设备的维护和保养技能。目前,DeepSeek 只能提供与人们的文字、语音和视频交互,不能在实验课程中对学生进行现场手把手指导。因此,根据教育部《生成式人工智能教育应用规范》可知,人类教师决策权不可替代。

## (三)学生对生成式人工智能产生依赖性

频繁使用 DeepSeek 会导致学生形成依赖,缺乏批判性思维。研究发现,适度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提升学生的创新能力,但是使用过度也可能导致学生产生“工具依赖”的负面影响。合理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一方面能够提供丰富的信息和资源,帮助学生拓宽专业视野;另一方面能够提供即时反馈和建议,帮助学生优化其学习路径。然而,过度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也会产生负面影响。主要的原因有:依赖工具进行过多的自动化任务,可能会降低学生的独立思考和创新能力;频繁使用工具可能导致学生忽视基础知识和技能的习得,从而影响其专业素养;工具生成的内容可能存在错误,学生若过度依赖,会影响其学习知识的准确性。

## (四)生成内容的伦理问题

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技术理性深度演进,但不意味着内容生产的真实与客观,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真实与否,取决于背后设置学习模型和算法的人,这种机制提高了信息生产的效率,也导致内容验证变得极为复杂,内容生产背后的意图更加隐蔽,难以识别和判断。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其中涉及的隐私安全和伦理问题逐渐成为了争议的焦点。学生学习专业知识时,向 DeepSeek 提问时,该模型会记录学生的提问和个人偏好。若没有妥善保护这类数据,将会导致学生隐私泄露。

## 五、生成式人工智能助力专业数字化转型的实践路径

生成式人工智能是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工具,为轨道交通专业教育塑造了理想的“乌托邦”,但也因其争议性而被视为“乌托邦的冲动”。虽然以 DeepSeek 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展现出巨大的潜力,

但是在使用过程中师生应该在伦理规范的范围内进行。合理利用 DeepSeek 促进教师教学效果提升,推动轨道交通专业数字化发展。DeepSeek 应用于轨道交通专业的主要路径有:

### (一)提升数据的准确性

在轨道交通专业数字化转型进程中,学校、教师和学生均需提升数字化能力以应对 DeepSeek 应用带来的数据挑战。可从三方面推进:一是强化企业支撑,企业应提供完备的数字化软硬件设施,开放接口、数据和计算能力,让学校能依实际需求二次开发、调整数据;二是推动院校合作,联系有相同需求的高校,整合资源共同研发契合轨道交通专业特征的 DeepSeek 产品,满足差异化需求;三是提升师生素养,学校要注重培养师生信息素养,使其能及时发现数据问题,构建持续改进闭环,推动 DeepSeek 在教学中的不断优化升级,为专业数字化转型提供支撑。

### (二)提升教师的专业素养

虽然短期内 DeepSeek 无法取代轨道交通专业中教师的角色,但教师仍需着力提升自身的技术素养。教师应紧跟人机协同的教学发展趋势,探索“双师型”教学模式,提升教学效果。教师要保持学习热情,主动参与各类培训、研讨活动以及同行间的交流,及时了解最新的技术发展。教育管理者也应高度重视教师的技术成长,为其提供丰富的数字化培训机会,推动教学能力提升。

### (三)构建创新性环境

为避免学生对生成式人工智能产生过度依赖,教师需采取有效策略,充分发挥其协作性作用。教师要积极鼓励学生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引导学生将 DeepSeek 作为辅助学习工具,而非直接获取答案的依赖对象。同时,指导学生合理运用技术,把生成式人工智能当作激发创意的途径。并根据学生使用 DeepSeek 的实际情况灵活调整教学策略,引导学生自主学习。此外,轨道交通院校应加强家校、校企合作,吸引家长和企业共同参与,携手营造积极创新的学习环境。

### (四)从伦理性困境到伦理性防范

在推进轨道交通教育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人们必须重视生成式人工智能引发的伦理问题,需要学校和企业一起制定符合实际需求的伦理规范。学校对师生进行培训,加强师生的伦理防范意识,杜绝师生的数据泄露风险。教师需要引导学生在在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的时候,自觉遵守道德规

范。可以由学校牵头,与企业一起构建伦理风险防范机制,并设立专门的监督机构,及时处理使用 DeepSeek 过程中的伦理问题。

## 六、结语

本文分析了当前生成式人工智能在轨道交通教育数字化转型中存在的问题,如生成内容的准确性不足、生成式人工智能替代教师角色、学生对生成式人工智能产生依赖性等,提出了生成式人工智能助力专业数字化转型的实践路径,以期为轨道交通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参考。在未来的应用进程中,应始终坚守以人为本的原则,确保科技发展朝着有利于人类的方向推进,推动轨道交通教育的数字化转型。

## 参考文献:

- [1] 吴陈兵,朱红林,王小雨. 欧盟终身教育数字化转型:驱动因素、理论框架与实践路径[J]. 教育与职业,2024(24): 70-76.
- [2] 张又伟. 新时代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成效、方向与策略[J]. 中国电化教育,2024(12):130-134.
- [3] 崔智涛. 智慧教育引领高职院校数字化转型的基本思路与推进策略[J]. 教育与职业,2024(21):54-60.
- [4] 闫广芬,任雪园. 教育数字化转型赋能教育强国建设的空间逻辑[J].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24(10):13-24.
- [5] 周洪宇,李宇阳.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 DeepSeek 与教育治理现代化——兼论数字化时代的教育治理转型[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3,41(7):36-46.
- [6] 赵爽. 教育数字化背景下地方应用型高校教师数字素养提升路径研究[J]. 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2025,38(2):139-141.
- [7] 徐光木,熊旭辉,张屹,等. DeepSeek 助推教育考试数字化转型:机遇、应用及挑战[J]. 中国考试,2023(5):19-28.
- [8] 刘雨航,方淑敏. 教育数字化转型中的注意力治理:机制、风险及其应对[J]. 中国电化教育,2024(12):31-38,47.
- [9] 潘建红,韩竺蔓.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创新人才成长内驱力提升的路径[J]. 科学管理研究,2024,42(4):135-141.
- [10] 刘衍峰.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质、现实挑战与实践培育[J]. 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24(3):168-176.
- [11] 吴雪萍,张靖洁. 瑞士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背景、政策与实践[J]. 比较教育研究,2024,46(2):21-32.

## Innov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DeepSeek in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Rail Transit Education

LIU Lin-fan<sup>1</sup>, ZHOU Li-yun<sup>2</sup>

(1. School of Electrical and Automation Engineering, East China Jiaotong University, Nanchang Jiangxi 330000;

2.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Jiangxi Vocational Technical College of Industry & Trade,

Nanchang Jiangxi 330000, China)

**Abstract:**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rail transit education is an intrinsic requirement for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However, this field currently faces multiple challenges, including a disconnect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outdated teaching content, uneven distribution of high-quality resources, and a lack of personalized learning. In recent years,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ies, represented by DeepSeek, have offered a human-computer interactive model that provides an effective pathway to address these issues. DeepSeek can be fully integrated into the educational process by serving multiple roles, such as an intelligent augmentation tool, a teaching assistant, a personalized learning advisor, a learning outcome evaluator, and a bridge for university-enterprise cooperation. This paper begins by addressing the practical difficulties in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rail transit education, then elaborates on the multifaceted roles DeepSeek can play, and explores practical pathways for its application in empowering education and teaching. The aim is to provide practical guidance for achieving high-quality, intelligent development in rail transit education.

**Key words:** generative AI; rail transit major;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eaching reform

# “五同”工作法在定向培养军士管理教育中的作用机制与实施策略

付 娇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江苏南京 211170)

**[摘 要]**本文以定向培养军士的管理教育为研究对象,系统探讨“五同”工作法(即同生活、同学习、同娱乐、同劳动、同锻炼)在其过程中的作用机制。通过分析定向培养军士群体特点及其教育管理中的现实需求,阐释了“五同”工作法在强化定向培养军士身份认同、综合能力素质、增强集体凝聚力方面的重要意义,并结合实际案例提出了若干实施策略,以期为提高定向培养军士管理教育工作的科学性和实效性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借鉴。深入探究该工作法在定向培养军士管理教育中的功能与实现机制,对优化培养模式、强化教育成效、提升综合适应能力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关键词]**“五同”工作法;定向培养军士;管理教育;作用机制

**[作者简介]**付娇(1982—),女,满族,辽宁开原人,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定向培养军士日常教育管理。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3年度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基于‘五同’工作法的定向培养军士管理教育科学化研究”(项目编号:2023SJSZ0367)。

**[DOI]** <https://doi.org/10.62662/kxwxz0210008>

**[中图分类号]** E251.3

**[本刊网址]** [www.oacj.net](http://www.oacj.net)

**[投稿邮箱]** [jkw1966@163.com](mailto:jkw1966@163.com)

定向培养军士自2012年试点以来,创新了军事人才生成渠道,提高了军士人才培养质量效益,成效明显,成绩突出,成为近年高职教育的一大亮点和特色。在培养过程中,定向培养军士面临的挑战是多方面的。他们大多对军事职业认知尚浅,从高中相对宽松的校园环境突然进入纪律严明的军事化管理体系,在心理和行为上都需要一个适应过程。培养过程的多阶段性,使得他们不仅要完成专业课程学习,还要接受系统军事训练并适应部队纪律要求,这对他们的身心素质和综合能力都是极大的考验。这些特点对管理教育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如何加速其角色转型、增强军人身份认同、全面提升岗位适应能力与团队协作能力等现实问题亟待解决。

“五同”工作法起源于建国初期,1959年《关于干部当兵问题的补充指示》以文件的形式正式提出,自1958年9月总政治部发布指示以来,将军到各级干部都作为列兵进入连队,与战士们共同生活、一起工作、共同训练和娱乐,遵循班长的指挥。

自此“五同”工作法在军队的管理教育、优良风气的营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人民军队所特有的管理教育模式,为构建新型人民军队内部关系,

增强部队凝聚力、战斗力开创了新的载体,为军队的发展壮大做出了重要贡献。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是由原总参、教育部确定的首批定向培养军士试点院校。学校在继承部队“五同”工作法的同时,结合学校水上专业半军事化管理的特点,在负责培养定向军士的军士与国防教育学院辅导员、班主任和学生中,实行新的“五同”工作法(同生活、同学习、同娱乐、同劳动、同锻炼),作为管理教育的理念和方法。“五同”工作法强调学生管理者与定向培养军士在多场域下的共同参与和深度互动,为应对上述挑战提供了系统化的方法路径。

## 一、“五同”工作法在定向培养军士管理教育中的理论基础

### (一)人本管理理论

人本管理理论主张管理应立足于人的发展,注

重个体差异与内在动机的激发。在定向培养军士管理过程中,贯彻“五同”工作法具有显著优势。管理者通过与军士生共同生活与学习,能够深入体察他们的个性特征、心理状态与发展需求。在平时的共同生活中,管理者能观察到军士生生活自理能力的强弱,有的可能善于整理内务,有的则在时间管理上捉襟见肘;他们在学业压力下的不同表现,在学习过程中能够及时发现,有些是积极应对的,有些则是容易焦虑的。基于这些观察,管理者可以提供个性化指导,对于生活自理能力弱的军士生,给予更多的生活技能培训;对于学业压力大且焦虑的军士生,进行心理疏导和学习方法指导。“五同”工作法营造的信任、包容、支持的教育氛围,能有效激发军士生的主观能动性。当军士生感受到管理者的关心与尊重,在一个宽松和谐的环境中成长时,他们会更愿意主动参与各项活动,积极探索自身潜力,促进全面成长。在一个充满信任的集体中,军士生们会更勇于尝试新的军事技能训练,不怕犯错,从而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 (二)群体动力学理论

群体动力学强调群体内部互动对个体行为与整体绩效的影响。定向培养军士作为一个正在形成的集体,其内部的协作机制与凝聚力对整体战斗力生成至关重要。“五同”工作法通过共同活动为军士生提供了高频互动的平台。以集体训练为例,在训练过程中,军士生们需要相互配合、相互支持,共同完成训练任务。在跑步训练中,体能较好的军士生可以鼓励和带动体能较弱的军士生,大家相互激励,形成良好的团队氛围。文体竞赛也是增强彼此认同与团队意识的重要活动,在篮球比赛中,队员们为了共同的目标,在场上密切配合,通过一次次的传球、投篮,不仅提升了球技,更增进了彼此之间的信任和默契。管理者在参与和引导这些共同活动的过程中,能够塑造积极健康的群体氛围。管理者在集体活动中始终保持严谨的作风和强烈的责任感,军士生们会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逐渐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和团队意识。

### (三)体验式学习理论

体验式学习理论重视通过实践参与促进知识内化和能力生成。军事教育不仅要求理论传授,更强调实战素养与意志品质的锤炼。“五同”工作法借助共同劳动、共同锻炼等实践环节,为军士生提供了在真实情境中体验军事生活的机会。在进行

设施维护工作时,军士生们必须运用所掌握知识和技能来应对实际问题。他们在对装备进行检修的过程中,既加深了对装备原理的理解,又锻炼了实际操作能力,同时也锻炼了解决问题的本领。体能训练等共同锻炼活动则是锤炼军事技能和意志品质的重要途径。在五公里长跑训练中,军士生们需要突破自己的体能极限,克服疲劳和困难。在这个过程中,管理者的激励和同伴的互助起到了关键作用。通过这些实践环节,军士生们得以深化对军事职业的认知,巩固专业技能,培养坚韧不拔的意志和协作精神。

## 二、“五同”工作法在定向培养军士管理教育中的作用机制

### (一)强化定向培养军士身份认同与职业归属

#### 1. 加速角色转型

定向培养军士从青年学生到合格军人的转变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需要经历心理与行为调适。“五同”工作法通过管理者与军士生共同生活、共同训练,发挥了重要的示范与熏陶作用。在共同生活中,管理者严格遵守军队的作息时间和内务标准,军士生们在潜移默化中受到影响,逐渐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管理者每天按时起床、整理内务,军士生也会跟着效仿,久而久之,就会形成规律的作息和整洁的内务习惯。

#### 2. 增强使命责任感

在共同学习与专题教育中,管理者可结合军队实际与自身经历,深入阐释军士角色的职能价值与使命担当。通过案例教学,讲述优秀军士在执行任务中的英勇事迹,让定向培养军士了解到军士在军队中的重要作用。例如,讲述某军士在抗震救灾中不顾个人安危,抢救群众生命财产的故事,使军士生深刻认识到自己的职业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紧密相连,从而激发他们的职业荣誉感与投身军队建设的信念。

### (二)提升定向培养军士综合素质能力

#### 1. 推动知行合一

在共同学习环节,管理者可依托实操课程、现场教学等方式,将理论知识与军事实践紧密结合。在包扎救护课程中,管理者先在课堂上讲解其原理和操作方法,带领军士生进行操作练习。在练习过程中,管理者可以即时反馈军士生的操作情况,指出存在的问题,并给予精准指导。例如,当军士生在头部包扎时出现错误动作,管理者可以及时纠

正,并详细讲解正确的操作方法和注意事项,帮助军士生更好地掌握技能,实现知识向能力的有效转化。

### 2. 锤炼意志品质

共同锻炼与劳动是磨砺军士生身体和心理素质的重要途径。在集体训练中,军士生需要面对各种挑战,突破体能极限。在进行高强度的体能训练时,军士生会感到身体疲惫不堪,但通过管理者的激励和同伴的互助,他们能够克服困难,坚持下去。在野外拉练训练中,部分军士生在跑到中途时已经体力不支,想要放弃。这时,管理者在一旁的鼓励和同伴们互相的加油打气,能够促使他们携手继续前进。他们的意志品质通过这次体验得到了很大的锻炼,斗志更加顽强,敢打敢拼。

### 3. 提高团队协作能力

共同娱乐和集体劳动等活动为军士生提供了在明确分工基础上密切配合的机会。在组织文艺演出活动时,军士生需要分工合作,有的负责策划节目,有的负责排练舞蹈,有的负责制作道具等。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需要不断地沟通和协调,解决遇到的问题。在红歌比赛中,军士生需要相互配合,调整动作的节奏和力度,以达到最佳的整体效果。通过这些活动,军士生在实践中提升了沟通、协调与集体行动能力,形成了基于信任的团队合作机制。

### (三)提升管理教育整体效能

#### 1. 建立良性管理关系

“五同”工作法通过高频互动与平等交流,缩小了管理者与军士生之间的心理距离。在共同生活、共同学习的过程中,管理者不再是高高在上的领导者,而成为朋友,成为与军士生们平起平坐的领导者。他们一起吃饭、一起训练、一起学习,军士生更愿意在这种轻松和谐的氛围中,与管理者交流自己的所思所想、所困所惑,而管理者也更能体会军士生的所需所动。在饭后闲聊中,军士生可以向管理者倾诉自己在学习上遇到的困难,管理者及时给予帮助和指导,解决军士生的学习问题。这种良性管理关系的建立,增强了彼此信任,构建了和谐融洽、相互尊重的教育管理氛围。

#### 2. 实现问题早期干预

在日常共同活动中,管理者能够及时察觉军士生思想、学习和生活方面的困难与异常。在共同学习时,管理者发现某军士生最近学习积极性不高,

成绩有所下降,通过与他交流,了解到是因为家庭原因导致他情绪低落。管理者及时对他进行心理疏导,并联系家长共同解决问题,避免了问题的进一步恶化。在共同生活中,管理者也能观察到军士生的生活习惯和健康状况,对于生活不规律或身体不适的军士生,及时给予关心和帮助,采取有针对性的帮扶与疏导,防范潜在风险,保障教育进程顺利推进。

### 3. 营造积极育人环境

通过系统化的共同活动设计,可形成正向激励、团结进取的集体氛围。通过定期组织优秀军士生评选活动,对在学习、训练、生活等方面表现突出的军士生进行表彰和奖励,激发其他军士生的竞争意识和进取精神。同时开展户外拓展训练等团建活动,培养团队协作精神,培养军士生的集体荣誉感。在这种积极育人环境中,军士生们受到激励和感染,激发自我教育、自我管理的主动性,从而实现管理教育工作的全员、全程、全方位覆盖。

## 三、“五同”工作法在定向培养军士管理教育中的实施策略

### (一)同生活:规范日常管理与人文关怀并重

#### 1. 实行标准化生活制度

严格执行军队作息与内务标准是培养定向军士良好纪律习惯和正规化生活作风的关键。管理者要以身作则,每天按时起床、出操、就寝,严格按照内务标准整理个人物品和宿舍环境。同时,加强日常督导,定期对军士生的作息和内务情况进行检查和评比。对于表现优秀的军士生给予表扬和奖励,对于不达标的军士生进行批评教育和指导,帮助他们尽快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通过设立内务流动红旗,每周评选出内务整理最好的宿舍,颁发流动红旗并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激发军士生的积极性。

#### 2. 建立互助机制

推行结对帮扶、骨干帮带等制度,在生活细节中融入关怀与支持。根据军士生的不同特点和需求,将他们分成若干小组,让能力较强的军士生与能力较弱的军士生结成对子,进行一对一的帮扶。在学习上,帮助对方解决遇到的难题;在生活上,关心对方的身心健康。同时,选拔一些优秀的军士生担任骨干,发挥他们的模范带头作用,带领其他军士生共同进步。新生入学时,安排老生与新学员结对子,帮助新生熟悉校园环境和部队生活,使新生

感受到集体的温暖,增强集体凝聚力的归属感。

## (二)同学学习:构建融合型学习共同体

### 1. 推行互动教学模式

在课堂教学中增设研讨、案例分析与情景模拟环节,倡导启发式、参与式教学。在军事理论课上,教师能提出引导军士生讨论分析的启发性问题。例如,在讲解军事战略时,提出“如果遇到某种特定的战争形势,我们应该采取怎样的战略战术?”让军士生分组讨论,每组派代表发言,分享自己的观点和想法。这样就激发了军士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使军士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本领得到了很好的提高。情景模拟教学也是一种有效的方式,教师可以模拟一些实际的军事场景,让军士生们在模拟环境中进行操作和演练。比如,模拟战场救护场景,让军士生扮演不同的角色,进行伤员救治和转运等操作,提高他们的实际操作能力和应急处理能力。

### 2. 加强课外学习指导

组织学习小组、兴趣小组与技能竞赛,为军士生提供个性化辅导与资源支持。根据军士生的兴趣和专业方向,将他们分成不同的学习小组和兴趣小组,如兵棋推演小组、军事历史兴趣小组等。在小组活动中,军士生们可以相互交流学习心得和经验,共同探讨问题,拓宽知识面。同时,定期组织技能竞赛,如军事技能比武、专业知识竞赛等,激发军士生们的学习动力和竞争意识。对于在学习和竞赛中表现优秀的军士生,给予表彰和奖励,并提供更多的学习资源和发展机会,满足军士生多样化和差异化发展需求。

## (三)同娱乐:组织集体性文体活动

### 1. 开展主题文体活动

结合重大节日、纪念日组织文艺演出、体育竞赛等集体活动,增强凝聚力和集体荣誉感。在国庆节期间,组织文艺晚会,让军士生们自编自演节目,表达对祖国的热爱和祝福。军士生在晚会的筹备过程中,节目策划、排练、舞台布置等各个环节都需要大家分工合作,互相增进感情,通过这些活动增强集体凝聚力。体育竞赛也是激发军士生集体荣誉感的重要活动,定期举办运动会,设置多个比赛项目,如田径、篮球、足球等。军士生以班级或小组为单位参加比赛,在比赛中,他们为了集体的荣誉而奋力拼搏,展现出了团结协作、勇往直前的精神风貌。

### 2. 设计团队竞技项目

通过篮球、拔河、军事体育等竞赛类活动,锤炼团队配合与竞争意识。篮球比赛是一项需要团队密切配合的运动,在比赛中,队员们需要相互传球、配合进攻和防守,通过不断的磨合和训练,提高团队的配合能力。拔河比赛则更能体现团队的力量,当队员们齐心协力,喊着统一的口号,共同用力时,能够感受到团队的力量是无穷的。军事体育竞赛,如障碍赛跑、战术接力等,不仅考验军士生的体能和技能,更考验他们的团队协作能力。军士生在这些比赛活动中,学会了互相信任、互相支持,培养了浓厚的团队意识,也培养了很强的比赛意识。

## (四)同劳动:实施实践育人项目

### 1. 建设劳动教育实践基地

依托宿舍区、劳动教育实践基地等场合开展生产劳动,强化军士生的劳动观念和艰苦奋斗精神。在学校内建设“梁园”劳动教育实践基地,让军士生参与农作物的种植、管理和收获过程。在种植过程中,他们需要学习土壤改良知识、播种知识、施肥知识、浇水知识、除草知识,亲身体会劳动的艰辛,收获的快乐。军士生在培养责任心和吃苦耐劳精神的同时,还能通过参加宿舍维修、实训设备维修等设施维护劳动,了解设施设备的原理、结构,掌握一定的维修技能。

### 2. 组织校园环境建设

开展经常性劳动,如美化校园,维护公共设施等,培养定向培养军士的责任感和事业心。组织军士生参与校园绿化活动,种植花草树木,为校园增添绿色和生机。在维护公共设施方面,安排军士生定期检查和维修宿舍内的桌椅、门窗等设施,确保宿舍环境的整洁和安全。通过这些劳动活动,军士生能够深刻认识到自己是校园的主人,增强对校园的责任感和归属感,同时培养他们的奉献精神和社会责任感。

## (五)同锻炼:系统开展军事体能训练

### 1. 制定科学训练方案

依据个体差异制定差异化体能训练计划,确保训练合理安全、逐步提高。军士生体能状况在制订训练计划前进行综合评定,包括力量,速度,耐力,灵敏度。根据评估结果,将军士生分为不同的训练层次,为每个层次制定相应的训练目标和计划。对于体能较弱的军士生,训练计划侧重于基础体能训练,如慢跑、俯卧撑、仰卧起坐等,逐步

提高他们的体能水平;对于体能较强的军士生,则增加训练强度和难度,如进行长跑、负重训练、障碍训练等,进一步提升他们的体能素质。同时,在培训过程中,根据军士生的培训进度和体能反应情况,对培训计划及时进行调整,确保培训的科学性和实效性。

## 2. 丰富训练内容形式

在常规训练中融入军事障碍、野外拉练、拓展训练等课目,提升训练趣味性和实效性。军事障碍训练可以锻炼军士生的身体协调性和柔韧性,设置壕沟、矮墙、云梯等各种障碍,使军士生在规定时间内通过障碍,提高应变能力和战胜困难的本领。野外拉练是模拟实战环境的训练方式,组织军士生进行长途行军,在行军过程中,他们需要应对各种复杂的地形和天气条件,这锻炼了他们的体能和意志品质。而拓展训练通过开展一些信任背摔、盲人方阵等团队协作项目,注重培养军士生的团队合作精神和创新能力,使军士生学会相互信任,在活动中互相支持,团队凝聚力、战斗力得到提高。

## 四、结论

“五同”工作法作为契合定向培养军士成长规律的教育管理方法,通过管理者与军士生在多维场域中的共同实践,建立起深度融合、互信互动的教育关系。该方法有助于增强军士的身份认同,促进其军事社会化进程,使军士能够更快适应军队生活,明确自身的军人身份和职责使命。系统通过共同学习、锻炼和劳动等活动,提升军士生的专业能力、身体素质和团队合作水平,使他们在知识、技能、意志品质以及团队协作等方面都实现了全面进步。这不仅有助于建立和谐高效的管理教育生态,还能实现早期预警与精准育人。管理者能够及时识别军士生所面临的问题,并提供必要的帮助和指导,从而提升管理教育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 参考文献:

- [1]蔡海鹏,闵雅婷.我国定向培养士官的现状、问题与高职教育对策研究[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0(34):22-28,66.

# The Action Mechanism and Implementation Strategies of the “Five Togethers” Work Approach in the Management and Education of Directionally Trained Military Sergeants

FU Jiao

(Jiangsu Maritime Institute, Nanjing Jiangsu 211170,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the management and education of directionally trained military sergeant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systematically explores the mechanism of action of the “Five Togethers” work approach (namely, living together, studying together, enjoying entertainment together, working together, and exercising together) in this process. By analyz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irectionally trained military sergeant group and the practical needs in their education and management, the paper elucidate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Five Togethers” work approach in strengthening the identity recognition, comprehensive ability and quality of directionally trained military sergeants, as well as enhancing collective cohesion. Furthermore, it proposes several implementation strategies with real-world cases, aiming to provide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and practical references for improving the scientific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management and education of directionally trained military sergeants. Delving into the functions and realization mechanisms of this work approach in the management and education of directionally trained military sergeants holds significant theoretical value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for optimizing training models, enhancing educational outcomes, and improving comprehensive adaptability.

**Key words:** “Five Togethers” work approach; directionally trained military sergeants; management and education; mechanism of action

# 基于微课的混合式教学促进大学生高阶学习的实证研究

——以《楚文化概论》为例

向会斌

(长江大学历史系,湖北荆州 434023)

**[摘要]**微课是一种新型的教学资源和教育模式,具有交互性、结构化、泛在化、可视化、非线性、共享性的特征,以“互联网+”作为赋能的手段,延展到教育服务领域,探索研究成效显著,但是未能回应学生主体本位高阶学习的需求,以《楚文化概论》课程为样本,反思传统的教学模式,在此基础上,探讨了重构微课内涵、微课设计适应性应对策略、微课在促进新生代大学生高阶学习上的问题与挑战。

**[关键词]**微课;混合式教学;高阶学习

**[作者简介]**向会斌(1985—),男,湖北恩施人,长江大学历史系讲师,研究方向:荆楚文化。

**[基金项目]**本文系湖北省高等学校省级教学研究项目“新文科背景下基于学科交叉融合的《楚文化概论》课程改革与创新研究”(项目编号:2022267)。

**[DOI]** <https://doi.org/10.62662/kxwxz0210009>

**[中图分类号]** G434

**[本刊网址]** [www.oacj.net](http://www.oacj.net)

**[投稿邮箱]** [jkw1966@163.com](mailto:jkw1966@163.com)

新时代以来,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历届全国教育大会精神,深化高等学校本科教育教学改革,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实施方案(2018—2022 年)》,教育部刊布了《关于深入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若干意见》(教研[2022]1 号)、《关于一流本科课程建设的实施意见》(教高[2019]8 号)、《关于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意见》(教高[2019]6 号)、《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教高[2018]2 号)、《关于中央部门所属高校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的指导意见》(教高[2016]2 号)、《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教技[2018]6 号)等文件,多次提及要积极发展“互联网+教育”,探索智能教育新形态,推动课堂教学革命,着力打造具有高阶性、创新性和挑战度的线下、线上、线上线下混合、虚拟仿真和社会实践“金课”,推进建设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人才培养体系。

国内外对高等教育混合式教学的系统性研究,

也随着国际教育组织、各国教育主管部门、高等学校等对教育教学的改革而取得重要进展,尤以对慕课、微课在线教学平台构建、教学设计的逻辑框架、实践应用和教学成果、驱动模式等多个层面的探讨成果显著,并进而分析国家层面新质生产力战略下的混合式教学在 OCW 实践中的价值评估和可持续维持机制,成为近年来微课和混合式教学研究的前沿课题。慕课的应用研究和推广虽然涉及面很广,但有效利用的最终落脚地是坚持立德树人,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围绕“深度学习”“高阶学习”改进教学,融合信息技术的新型教与学模式,引领学生主动学习,这也是本课题将研究范围选定为以《楚文化概论》课程为样本,基于慕课的混合式教学促进深度学习的原因。

通过对各有代表性的观点进行盘点与检视发现,基于微课、慕课、翻转课堂等议题的研究多杂糅混合,更多体现在教学方式多元化的选择和本土化的策略上。随着混合式教学的研究与应用的深入,以及融媒体“互联网+教育”发展趋势的进一步增强,高等教育生态环境也发生深刻变革,教育理念、

教学模式和学习方式需要重组,微课、慕课、翻转课堂、混合式教学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趋势大潮中需要重新定位,推动专业知识体系和能力要求的更新、人才培养与教学研究范式的创新,促进学生的高阶学习,以新文科重点建设的哲学、历史学等基础学科的改革适应性研究为切入口,这是本文需要突破的实质性问题。

### 一、微课与混合式教学的发展进路与适应性反思

2008年,美国新墨西哥州圣胡安学院的高级教学设计师、“学院在线服务”经理戴维·彭罗斯(David Penrose)在首创“微课”(Micro Learning Resource)的概念时,称之为“知识脉冲”(Knowledge Burst),“微课是运用建构主义方法、以在线学习或移动学习为目的的实际教学内容”。自此,世界各地开启了探索和研究微课、慕课、混合式教学的热潮,2013年,教育部全国高校教师网络培训中心举办首届高校微课大赛,标志着我国对高等教育微课的大力推进。同时,运用于在线课程,融通在线学习(E-learning)与课堂学习(C-learning)的二元一体的改革,催生了课程视频应用模式的更新和商业运作效益的提高,但在发展进路中,存在对微课的认知误区和浅层次的运用策略,“为微课而微课”,教师的主导地位和学生的主体地位的角色未能充分体现,教师之间各自为政,系统性建设缺乏,致使微课未能更好地融入促进受教育者高阶学习与深度学习的最终落脚点。

#### (一)微课并非“微视频”的可视化

大学生是“网络原住民”的主体,通过新媒体天然地接触到和利用各种资源。在新时代视觉文化转向的大背景下,微视频已然成为学生学习的“第六感官”。在利用初期,微视频作为教学资源成效显著,用视频化的方式激发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而一旦新鲜热度退去,就难以继续和学生催生情感共鸣。事实上,微课绝非对微视频的简单套用和“形式”装换,要应该从素材甄别、知识扩展、问题分析、重难点解读,背离教学目标设置的初衷和学生的实际需求。

微课具有可视化的特征,但也不是以视频为唯一形式,手机媒体、微博客、播客、论坛、在线办公软件和知识管理工具、知识书签亦是微课的其他形态。交互性是微课的重要特征,微课中的学习过程既是个性化的活动,也是社会化的活动,需要学者

与教师、学习者之间,或者通过其他技术手段实现教学活动,要打破线性非结构化生硬的形式。

#### (二)微课并非“微课程”的微缩版

课程属性虽然是微课的第一属性,但是,微课不能等同于微课程。微课的形式确是课程微缩版,但是其内核不是课程的全结构,一门规范标准的课程有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活动方式、教学设计,是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学素材等诸多方面的综合,而微课只是支持课程完整性的资源和方式之一,是课程的一部分。

微课不仅仅是微手段的课程,还具有课程属性同时兼而有之的技术属性,是计算机、互联网、多元终端等的共享性、可移动性和微课精微性的结合。微课虽是资源超市,但资源更应该具有精致的资源的供给特性,是全课程中内容之外的新知,应聚焦于深度思考,促进有效学习的发生。

#### (三)微课并非“泛知识”的片段化

碎片化也是微课的一大特征,这种非系统性的知识呈现与当下“泛知识”短视频如出一辙,迎合碎片化阅读和接受的受众取向。但微课不仅仅呈现离散化和内在非逻辑性的知识片段,而是将零散知识以结构化形式整合进学生的认知结构中。这种从零散走向聚合才符合微课发展的目的,最终的旨归为扩展和深化大学生的认识能力与认识水平。

微课的设计原则应是提纲挈领、点睛之笔及枢纽作用的语句段落和知识单元,知识元的组合应该是半开放的特征,即设计内容要允许学生、教师多元化参与二次编辑和观点渗入,诸如讨论社区的布局与设置,参与者可以发表观点以丰富匹配并完善知识链条。

#### (四)混合式教学并非“融合式教学”

混合式教学是教育信息化的重要途径,基于微课、MOOC、专属在线课程(SPOC)等应用基础,突破时间与空间限制,通过线上和线下项目探究、合作学习、问题指引、师生全面互动的模式,旨在增强传统理论课“文本课程”的活力,促进大学生原型知识建构的“再生长”。

微课作为一种赋能性、多模态技术手段的教学资源,也是混合式教学的重要方式。在实施过程中,由于缺乏顶层设计和微课嵌入恰度不够,在多教学手段大熔炉里,教学各要素之间关联协同不足,目标导向应该是学生的能力和学习兴趣提高,

知识导向是基础性环节,微课实施过程中一味追求“融合”技术手段,显得花里胡哨,杂乱无章,内容和形式之间多貌合神离,微课的混合式教学更要使学生认知参与、行为参与和情感参与等多个维度的融入,才能提升课堂高阶学习的可能性。

## 二、基于微课的混合式教学的高阶学习目标在《楚文化概论》课程中的探索与实践

在高等教育研究领域,对基于微课的混合式教学的现状进行反思,发现实践中微课设计与开发存在诸多问题,导致当前微课形式大于内涵的问题十分突出,因此要进一步厘清微课的本质问题。这种多维度教学方式改革的最终目的是提高本科教育质量,如单纯地追求学习方式的多样化,而忽视了深度学习和思考,就不能达到高阶学习的目的。只有进一步改进课程设计理念,根据不同高等学校学生的实际,积极探索适合本土化教学的应用模式,促进泛在与移动互联、自主性与个性化学习方式的形成。从微课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反思,以《楚文化概论》课程为样本,进一步重构微课的概念和本质特征,从目标观测指标设计、学习活动过程递进把控、重难点数据库创建、知识图谱和主题分析、个性化和书院制拔尖培养等多个维度构建该课程完整的学习过程,是一种可行的教学模式,且整体效果较好。

### (一)微课设计的高阶学习观测指标和新文科建设融合的探索

微课既是教学新资源,也是教学的新模式。微课在教学活动中是角色,也是介质和载体,与之相对应的结构应包括教学观测目标、微型学习资源、学习活动过程、课程评价、认证服务等要素完整呈现知识逻辑,属于课程资源和教学模式范畴。在《楚文化概论》课程观测指标中,以整体性学习思维、学科关键能力培养,自我效能感、反思性学习为重要对象,以探索发挥新文科教育知识性与价值性相统一的特点。

《楚文化概论》是对先秦时期楚国的历史文化的概要论述,也包括学习和研究先秦时期地域文化的知识和技能,旨在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弘扬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课程包含楚国的青铜冶铸、丝织刺绣、竹木漆器、玉器与料器、音乐与美术、文学与哲学、制度与礼仪“八大支柱”的学习内容。课程学习方法涉及考古学、古文字学、史科学、民族学等

多种学科知识,根据新文科建设的要求,以历史学学科核心素养、问题解决、高阶思维、创新利用、协作技能等深层学习能力培养为目标。

荆楚文化切近教学所在地域高校学生的生活,为楚文化腹地和发展中心地,是学校所在地的母体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个性,学生更利于产生文化认同和共情传播,辅之对荆楚文化遗址和遗迹的实际考察,让深度学习真实发生,激活学生高阶思维的内在动力。

本门课程在开设初期,由于内容较多且零散,授课中多以知识点切割为主,学科认知结构凌乱。通过微课的引入和对混合式教学的反思,选择关键性、典型性史实和文化现象,明晰设置观测指标,通过基础模型(见图1),进行“知识记忆—理解与应用—分析与评价—创新与创造”,融合新文科对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核心素养政治认同、家国情怀、道德修养、法治意识、文化修养等要素,促进学生达到从浅层学习到深度学习的螺旋上升的学习效果。

微课观测目标在实施高阶学习过程中,首先,通过“八大支柱”基本知识结构的梳理,吸引学生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兴趣;其次,对先秦诸侯国的礼仪和制度进行深入反思,形成正确历史思维和历史思想方法的培养,激发学生综合分析问题的意识,促进学生养成高阶学习的系统性的思维模式;最后,结合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文旅产业的需求,帮助学生更好地将专业知识与社会服务、专业态度与实践应用相结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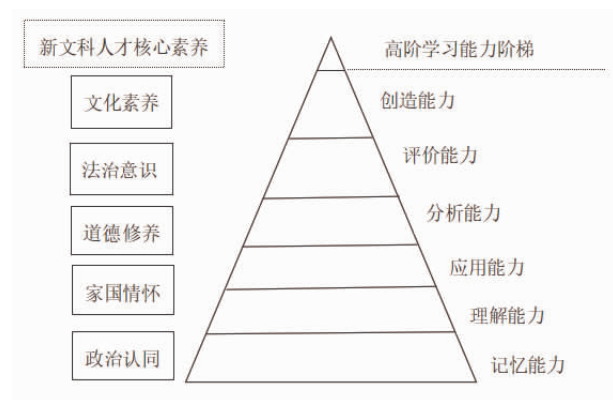


图1 基于微课设计的高阶学习观测指标和新文科建设融合

### (二)基于TED—Ed 微课的混合式教学过程性维度设计

微课是一种微型教学活动,教学过程和内容设

计是微课的核心。当然,微课的呈现不仅仅是编码化的知识,更需要有促进高阶学习发生的有创意、激发性强的过程设计。习惯标准化考试的大多数中国本科生更需问题导向和理解性教学的融合,激发学习者从浅层学习转向深度学习,《楚文化概论》在微课整体设计中遵循观测目标的总要求,借鉴TED—Ed 微课界面创建模块并加以创新设计,以符合本课程的课程特征。

检索国内外的微课建设平台资源,如佛山微课、中国微课网等,以及Khan Academy、Coursera和TED。对比来看,TED—Ed具有明显促进高阶学习的优势和特点,TED—Ed设计了“观看视频(Watch)”“思考题(Think)”“深入学习(Big Deeper)”三大板块及辅助功能区,内容更注重学习方法和过程的传递,且提供的视频资源可以供师生自由编辑。学生可以追踪个人学习记录,教师端可有针对性地设置练习、问题。根据学生学习记录推送个性化的学习资源,挑战高阶思维值得我们借鉴学习。

在《楚文化概论》微课界面设计中,基于微课教学应用的本体价值,从“内容取向”“技术取向”“用户取向”三个面向,充分考虑到学生端的自主学习的用户体验,设置了学习导航、学习指南或概念地图等菜单,借助TED—Ed的教学视频及编辑功能,尝试构建了TED—Ed的微课的混合式教学模式。

自建《楚文化概论》微课平台为混合式教学活动的开展提供了指导。第一步,学生在平台注册登录,学习教师前期发布的学习任务,主要是课程导入和重难点解析。第二步,在辅助板块参与讨论,注意议题是学生对学习内容的疑惑或者观点,而后教师针对讨论的问题推送资料,并监测整个学习过程,及时提供意见建议和帮助。第三步,通过开放式的练习题模块进行训练,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命题分层次设置立意、思维、情景、作答等内容和形式均可选择的开放式类型,“列举事例”“撰写评论”。第四步,学生通过学习的内容的反思与应用,基于微课为导向的混合式扩展学习,体悟传统文化,通过对遗迹和遗物资料的调查,进行文字学、史料学、社会学方面的深入研究。

(三)微课重难点数据库和知识图谱的主题化建构

优秀、多样的课程教学资源是网络环境下开展基于微课的混合式教学的重要基础。知识点和教

学环节固然是微课设计的重要内容,不是所有教学内容都做微课,主要以重难点、易错点、易混点等学习网络系统中的节点和堵点问题为主,根据高阶学习的观测目标为必须掌握的知识、较为复杂难以掌握的知识,《楚文化概论》数据库主要为高阶学习建立起了较为丰富、多元化的教学资源库,辞目以楚人、楚事、楚史、楚物等基本类型,主要有楚国历史文化重难点知识数据库、文献资料数据库、学术音频视频数据库、常见问题库、试题库、案例库、素材库等等。其中涉及重难点数据库有1300余条学术定义,经过系统汇集、整理、编排,并进行数字化处理,如“一鸣惊人”“一钟双音”“二八接舞”“人物御龙帛画”“土伯”“大武辟兵戈”“五仞台”“公子围篡立”“长沙仰天湖25号楚墓竹简”“江平”“客寄择日”“泗上十二诸侯”“宥坐之器”等等。同时根据最新考古发现和出土文献不断更新,在自主编辑模块,也鼓励学生自主开发创作学术条目,并增加评论、注释等附加资料,并附加学生创作者的署名。

为适应新时代新兴的知识表达方式,微课也开设了楚文化知识图谱,绘制知识图谱,确立知识点谱系,全面呈现由点到面,由面到体,由线串珠,形成完整的知识回路,对《楚文化概论》中核心知识结构、学术研究的前沿领域、整体的知识逻辑框架,把复杂的知识通过可视化知识域呈现,在设计楚文化知识图谱和链条时,运用了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产婆术”寻求普遍知识方法,通过一问一答的形式,反复诘难,不断揭示知识点谈话中自相矛盾之处,从而逐步从个别的感性认识,上升到普遍的理性认识、定义、知识,引导学生深度思考,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

(四)“兰台”书院模式拔尖培养与个性化教学改革

在《楚文化概论》基于微课的混合式教学改革中,探索了书院制的培养模式,选拔学生以历史学系为主,兼收其他专业的学生,每学期选拔30人次,通过“社区化”学习单元力求推动学科交叉创新人才的培养,以期在学习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融合通识教育和专业知识学习,由首席教授、主讲教师组织学生定期开展楚文化专题讲座和研讨,对学生科创竞赛进行帮扶和指导。将书院命名为“兰台书院”,“兰台”是楚国的宫苑名,宋玉在《风赋》记“楚襄王游于兰台之宫,宋玉、景差侍。”汉代后多指以兰台

为宫廷藏书处,后世也称史官为兰台。宋玉、景差皆以辞赋见称于世,相传楚怀王、顷襄王时做过文学侍从。《楚文化概论》团队巧借了具有浓郁楚文化的台名作为“兰台书院”的命名,“兰台书院”现建有专门的学习场所。自2016年12月起,学校筹建了集研究、展示、宣教于一体的“兰台书院”并将其投入使用,撷取“书院”学习平台的设计主题,彰显楚文化浑厚历史底蕴和现代特色,为学生提供交流、实践、活动的平台,发挥平台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的功能。

同时,混合式教学过程中以“共性培养+个性发展”为基本原则,以慕课观测指标为主线,以问题意识引导为中心,以能力培养为主导方向,具体实施过程即按照在线学业投入前测评估得分,根据学术水平、思辨能力、创新能力、个性特征、性别等方面因素进行异质和同质不同类型分组,每组5~6人,在合作学习的前半学期采取异质型分组,后半学期采取同质型分组,根据不同组的学生推送难易程度不同的差异化微课资源,以兰台书院为基地,建立学习工作坊,开展项目化学习、研究性学习,培养高阶思维意识教学与研究活动。

### 三、基于微课的混合式教学在课程教学中促进高阶学习的挑战与应对

目前,我国高校教育改革中,微课和混合式教学方兴未艾,承载着新文科建设的新使命。据慕课理念发展和实践探索和国际国内高校或机构实际应用情况来看,优势与局限日益凸显、机遇与挑战并存,要进一步突破技术层面的掣肘,更应该整合教学样态,聚焦教学设计,突出学生的教学中心地位,突出高阶学习能力的培育,调节学生人格的塑造和专业认同,实现由“知本”到“人本”的转变,去除华丽包装商业化运作模式,专注于教学设计和学习内容创意本身,只有这样才能彰显微课与混合式教学的持久生命力。

#### (一)微课的混合式教学的本质特征认知与高阶学习融合体系重塑

微课作为一种新型的教学资源,促使高校课堂教学范式发生了重大转变。微课具有交互性、结构化、泛在化、可视化、非线性、共享性的特征,但是微课之“微”,并不单是形式上“短”而“小”的“微度”。在微课和混合式教学研究和应用的热潮下,重新定位思考微课的内涵和外延,构建适应本土化的微课

体系,才能更好地利用新技术赋能新时代教育的发展。

微课本应是浓缩教学精华,助力高效学习的新形式,要立足国际比较与经验观察的视角,重新认识和理解微课教育方式在本科专业的教育内涵,它究竟适应通才还是专才教育,抑或推动通识教育基础上的专业教育。微课的功用主要是满足学生个性化的学习和高阶性的学习,要坚持问题导向,做到微课的知识碎而不散,构建知识导向图,了解学生关注度高的问题,精准回应学生的需求,做到教师的差异化教学,进一步优化课程资源,做到微课资源的青年化阐释。例如,史学类课程应充分挖掘核心素养中的唯物史观、时空观念、史料实证、历史解释和国家情怀等思政元素。

#### (二)微课数字教育资源共建与“政产学研用”协同育人机制重构

微课是数字化的学习资源包,挖掘新时代微课的新特征,2022年教育部推出“智慧高教”平台,进一步推动以微课或慕课为基础的数字教育资源建设,但是,目前,高校的优质微课教育资源建设与共享问题、微课标准实施问题、基础建设研究开发的资金问题、后备人才培养问题等等仍未能突破,多呈现单打独斗,各自为政的“自建”状态,应利用大数据汇聚优质资源,开展由教育主管部门监管统筹、高校积极推动的校企合作,同时加强微课的学科建设,培育新的学科增长点,同时还要在教学的“用”字上下功夫,对教师信息素养能力培训与更新。

与此同时,微课作为数字教育重要平台要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要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应用,畅通教育、科技、人才三要素的良性循环,规避技术盲从和技术崇拜,数字教育技术的革新是服务教学的,不能替代教学,过度依赖技术层级的便捷只会变成懒惰的机器,达不到高阶学习的目标。

另外,微课是轻量级慕课,教学中同样要注重承担数字社会责任,一味采取信息技术合成可能使史实本来面貌失真。以规范化资源利用为旨归,要加强风险治理,对历史虚无主义、全盘复古、全盘西化、歪曲历史、将严肃的历史事件庸俗化等错误思潮要坚决抵制,正本清源、固本培元,为史学类思政资源利用划清红线。

(三)智能时代微课的混合式教学融通高阶学习模式的路径走向

数字教育对我国高等教育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微课也冲击着传统教育的师生关系、管理模式、人才培养模式,人工智能等关键技术是变革中的重要驱动手段,微课平台可根据学生数据档案提供有深度、个性化的反馈内容和问题解决方案,教师设计和制作微课是教育信息化时代背景下的受迫性创新,可强化教师信息技术操作能力。

梳理美国高等教育信息化协会(Educause)《2022—2024 地平线报告(教与学版)》,从社会、经济、技术、环境、政治等多个维度总结了世界高等教育信息化、新兴技术与实践、生成式人工智能等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尽管我国是高等教育大国,但也要向世界高等教育强国迈进,其中培养学生高阶学习能力是重要一环,创建优质教育资源,在国际化

的过程中注重数字安全、数字鸿沟等方面是未来高等教育混合式教学重点关注的内容。

#### 参考文献:

- [1] 孙子文,纪志成. 开放教育资源运动与高等教育信息化资源建设模式透视——开放教育资源运动:从 OCW 到 MOOCs[J]. 学术论坛,2017,40(1):155-161.
- [2] 陈明选,胡月霞,张红英. 理解取向的微课设计分析[J]. 中国电化教育,2017(5):54-61.
- [3] 马志雄,张银银. 数字化背景下的混合式教学效果及改进策略[J]. 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2025,38(1):145-147.
- [4] 吴玲娟. 基于 TED-Ed 的通用学术英语听说翻转课堂研究[J]. 电化教育研究,2015,36(11):81-87.
- [5] EDUCAUSE. 2024 EDUCAUSE Horizon Report (Teaching and Learning Edition) [EB/OL]. <https://library.educause.edu/resources/2024/5/2024-educause-horizon-report-teaching-and-learning-edition>,2024-5-14/2024-5-19.

### An Empirical Study on Mixed Teaching Based on Micro-course to Promote Higher-level Learning of College Students—Taking “Introduction to Chu Culture” as an Example

XIANG Hui-bin

(Department of History, Yangtze University, Jingzhou Hubei 434023, China)

**Abstract:** Micro-course is a new type of teaching resources and educational model, which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activity, structure, ubiquity, visualization, nonlinearity and sharing. With “Internet Plus” as an enabling means, it has been extended to the field of educational services, and the exploration and research have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 but it has failed to respond to the needs of students’ subjective high-level learning. Taking the course “Introduction to Chu Culture” as a sample, this paper reflects on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l, and on this basis, discusses the reconstruction of micro-course connotation, adaptive coping strategies for micro-course design, and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faced by micro-course in promoting the high-level learning of new-generation college students.

**Key words:** micro-course; mixed teaching; higher-order learning

# 数智时代多模态学习场域下职场英语行动能力培育路径

李 辉

(台州科技职业学院经贸管理学院,浙江台州 318020)

**[摘要]**数智时代对技术技能人才的英语应用能力提出了新要求。为破解英语教学“学用脱节”的困境,本研究探索以数智技术构建多模态学习场域,培育学生的英语职业行动能力。研究基于多模态学习等理论,提出“物理—数字—社会”三元融合的场域模型,通过智慧教室、VR/AR实训、在线平台等创设沉浸式学习环境,并以跨境电商专业为例,设计“典型工作任务”驱动的教学实践。结果表明,该路径能有效促进学生将英语技能与职业素养相融合,实现从知识学习向行动能力的转化。

**[关键词]**数智时代;多模态学习场域;职业英语行动能力;教学路径

**[作者简介]**李辉(1971—),女,安徽阜阳人,台州科技职业学院经贸管理学院教授,文学硕士,研究方向:英语应用语言学、英语教学。

**[基金项目]**本文系台州科技职业学院“行动能力导向下数智赋能高职公共英语教学改革探究”(项目编号:2024Zxjg01)。

**[DOI]**<https://doi.org/10.62662/kxwxz0210010>

**[中图分类号]**H319

**[本刊网址]**[www.oacj.net](http://www.oacj.net)

**[投稿邮箱]**[jkw1966@163.com](mailto:jkw1966@163.com)

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虚拟现实等数智技术的广泛应用与深度融合,社会生产方式发生深刻变革,对技术技能人才的英语应用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职业院校作为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主阵地,其英语教学模式亟待创新。职业英语教学的核心目标是培养学生在其未来职业场景中的语言综合应用能力,即“行动能力”。然而,当前教学仍普遍存在“重知识轻能力”“重输入轻输出”、教学内容与真实职业情境脱节等问题,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实战潜能。数智技术的成熟为职业英语教学改革提供了重要支撑。通过构建融合语言、图像、声音、动作等多维符号资源的“多模态学习场域”,能够有效模拟真实职业情境,推动行动导向的教学实施,为学生英语行动能力的培养创造有利条件。

## 一、核心概念与理论基础

本研究围绕“数智时代”“多模态学习场域”与“职业院校英语行动能力”三个核心概念展开,三者构成一个内在递进的逻辑体系。数智时代是研究的宏观背景,其特征是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的深度融合,驱动教育生态向数字化、智能化与个性化方向演进。在此背景下,多模态学习场域应运而生,它超越了传统教室的物理边界,是一个整合了线上与线下、虚拟与现实,并融合语言、图

像、声音、动作等多种符号资源的综合性、交互性学习生态系统。其核心在于利用数智技术为学生创设一个能够调动多重感官、进行社会性交互和意义协商的“沉浸式”环境。“职业院校英语行动能力”则是本研究的最终目标,它源于德国职业教育“行动导向”理念,特指学生在真实的或模拟的职业情境中,以英语为工具,独立或协作地完成信息获取、沟通交流、问题解决等一系列任务所需的综合能力。它本质上是“语言技能”“职业知识”“数字素养”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复合体,强调“做中学”和“学以致用”。这三个概念紧密关联,有机融合。数智技术是构建场域的支撑,多模态场域为培育行动能力提供情境与手段,而行动能力则是适应数智时代人才培养的终极目标。

坚实的理论为本研究提供了学理依据。首先,多模态学习理论(Multimodal Learning Theory)认为意义建构并非仅通过语言,而是由图像、声音、手势等多种模态协同完成。这为在教学中有意识地设计、整合多种符号资源以促进更高效的意义理解和知识内化提供了直接指导。其次,情境学习理论(Situated Learning Theory)认为学习本质上是社会性、实践性的,发生在真实的活动、情境和文化中。它论证了在高度仿真的职业“场域”中学习英语的

必要性,知识必须在特定的实践共同体中才能被真正理解和灵活应用。最后,行动导向教学理论作为职业教育的核心理念,主张教学应以职业情境中的关键行动任务为中心来组织,让学生在“做”中学习。这为将“行动能力”作为目标,并设计以学生为中心、任务为主线的教学流程提供了方法论框架。综上所述,三大理论层层递进,多模态理论解决了“如何教”的媒介问题,情境理论解决了“在哪教”的环境问题,行动导向理论则解决了“为何教”和“教什么”的目标与内容问题,共同为本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撑。

## 二、数智时代多模态学习场域的建构策略

### (一)从“知识场”到“行动场”的范式转变

构建数智时代多模态学习场域的核心在于推动教学范式从静态、封闭、以语言知识传授为核心的“知识场”,向动态、开放、以职业能力生成为核心的“行动场”进行转变,具体体现在教学目标、教师角色与学生角色的重构与转型上。

1. 教学目标的重构。教学目标的焦点从掌握孤立的语言知识,转向培养“能用英语完成特定职业任务”的行动能力。其核心在于使目标具体化、可衡量,并与职业能力标准直接对接。例如,目标应清晰表述为“学生能够用英文向海外客户介绍新设备(智能制造专业)”或“能撰写符合国际规范的英文商务邮件(跨境电商专业)”。教学成效的评估不再仅凭试卷,而是通过观察学生在完成一项完整任务过程中的语言运用、流程规范及沟通效果等综合表现。因此,教学目标设计必须以最终成果为出发点,深入分析专业对应的职业岗位群,系统提炼典型英语交际任务,为教学提供明确的“行动能力产出”导向,并基于成果持续改进教学。

2. 教师角色的转型。教师的角色从“知识的传授者”转变为“学习情境的设计者、资源的组织者、行动过程的引导者与教练”。在传统“知识场”中,教师是“讲台上的圣人”;而在数智化的“行动场”中,教师则成为“身边的向导”。其职责发生根本转变:从单向灌输知识,转向精心设计蕴含职业挑战的学习情境与任务;从单纯讲解教材,转向筛选、整合乃至开发VR仿真、企业案例视频等多模态资源,为学生自主学习提供“工具箱”与“脚手架”。在学生实践时,教师退居幕后,通过观察、记录和关键提问,在学生遇到瓶颈时给予适时引导与反馈,旨在激发学生潜能,培养其自主探究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3. 学生角色的重塑。学生从“被动的知识接收

者”转变为“积极的行动者、意义的主动建构者和高效的协作伙伴”。在多模态“行动场”中,学生不再是等待填充的“容器”,而是学习的“主角”。他们需带着明确任务目标,主动探索、调用各种资源(文本、视频、软件、人际网络),通过实践、体验、反思建构属于自己的知识与技能体系。课堂因而转变为充满交互与协作的“工作坊”:学生与同伴讨论方案、与AI模拟对话、在虚拟场景中反复演练,最终产出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案或作品。此过程不仅能让学生会学语言,更深刻理解其在职业语境中的真实运用,还能锤炼沟通、协作、创新与批判性思维等核心职业素养,使其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翁和未来职场合格的“行动者”。

### (二)“物理—数字—社会”三元融合的立体场域搭建

1. 物理场域的智能化升级。其核心是将传统教室改造为支持深度交互与情境感知的智慧学习空间。包括建设配备多屏互动、高清录播等设备的智慧教室,以实现研讨过程的即时共享与复盘。更重要的是,需依托专业特色构建VR/AR仿真实训室,如为跨境电商专业打造虚拟国际展会,为智能制造专业模拟智能工厂界面。这些沉浸式环境使学生在高度仿真的职业场景中进行“具身化”的语言实践,极大拓展了物理教学空间的边界与表现力。

2. 数字场域的平台化构建。数字场域旨在实现线上与线下学习的深度融合,形成混合学习新常态。这依赖于一个协同的软件生态系统:利用在线教学平台,如超星学习通,作为任务发布、资源推送与学情分析的平台;借助远程会议工具(如腾讯会议)不仅支持在线协作,更能便捷引入企业专家或连接海外真实项目,将涉外工作场景“接入”课堂;同时,通过AI口语应用提供个性化语音训练与即时反馈,充当学生的“私人AI教练”,夯实语言基础。

3. 社会场域的协同化设计。职业行动能力的关键——社会协作能力,必须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中培养。因此,需要有意识地利用技术构建一个协作学习共同体。通过线上平台与线下分组结合,模拟公司团队运作;定期邀请企业导师在线指导,将职业标准带入课堂;在任务设计中融入职场中的分工、协商与评估等环节。这样,整个场域就升华为一个微型的“职业社会”,学生在此扮演角色、承担责任,通过实践习得沟通、协商与协作能力,完成从“学生”到“职业人”的社会化过渡。

### (三)整合资源建设“多模态语料库”

资源建设要以职业行动能力为导向,围绕各专业

的典型工作任务,系统性地建设一个高度结构化、标签化、易于检索和智能推送的“多模态语料库”。

1. 语料库的内容源于真实业务,模态多元。通过广泛采集并自主开发与核心工作任务相关的原生性资源。例如,对于跨境电商专业,语料库包含真实的产品英文发布会视频、海外客户询盘与回复的邮件模板与案例分析、热门产品的英文直播带货片段、海外仓实景 VR 游览、平台数据报表与图表,以及 AI 模拟的带有不同口音的客户音频等。

2. 语料库要实现智能化的标签与检索。每一份资源都依据“工作任务”“职业能力点”“语言难点”“模态类型”等多个维度进行精细化的标签标注。例如,一段“产品发布会视频”可被打上“产品描述”“职业口语”“技术词汇”“视听模态”等标签。借助学习平台的后台算法,系统能根据学生当前的任务情境(如“需要撰写一份产品描述”)或能力短板(如“技术词汇不足”),进行推送和个性化匹配,实现“资源找人”,提升效率。

3. 语料库是动态生长、持续优化的。一方面,要建立与合作企业的资源共建共享机制,定期导入最新的案例与素材,保持与行业发展同步。另一方面,学生的优秀任务成果(如一份获得高赞的英文直播脚本、一个成功解决客户投诉的视频录屏)经过脱敏和优化后,亦可反哺纳入语料库,成为新的学习资源。这种“引入—产出—再入库”的循环,使得多模态语料库成为动态的、不断优化的“知识生态系统”,长效服务于职业行动能力的培养。

(四)“贯通过程、聚焦表现、多元主体”的评价体系

构建一个与多模态学习场域相匹配的综合性评价体系,需跳出对碎片化知识的考查,转向对完整行动过程和综合能力表现的评估。

1. 过程性评价是基础。利用数智化学习平台的后台数据追踪功能,自动、客观地记录学习轨迹,如视频观看的完成度与反复观看的片段、在讨论区的发言质量与频率、资源下载与查阅情况、作业提交的及时性等。这些数据构成了学生学习投入度的“数字画像”,便于教师洞察学生学习习惯、发现困难、进行及时干预。

2. 表现性评价是核心。它要求学生通过实际完成一项任务来展示其知识、技能和态度。教师针对每一项典型工作任务,开发详尽、公开的评价量规(Rubric)。量规的指标应直接对应能力目标,例如在“跨境电商客服模拟”任务中,Rubric 需细化到语

言运用的適切性、沟通的有效性、问题解决的可行性等多个维度,并设定不同等级的达成标准。

3. 多元主体评价是保障。职业能力的评判标准应模拟真实职场的评价生态。因此,需引入教师评价(把握标准与核心能力)、小组互评(考察协作与贡献度)、学生自评(促进元认知与反思),并在可能的情况下,邀请企业专家或导师对项目成果进行点评。

### 三、教学改革实践——以跨境电商专业为例

在数智时代多模态学习场域的理论框架指导下,我们以职业行动能力培育为核心,以跨境电商专业为实践对象,开展了系统化的教学改革与实践。本部分将详细阐述如何将前述建构策略应用于跨境电商专业的英语教学,形成可操作、可复制的实践路径。

#### (一)解构跨境电商职业英语行动能力

通过企业调研、毕业生访谈和岗位分析,解构出跨境电商从业者所需的核心英语行动能力,并将其凝练为四大核心能力维度,如下图 1 所示:



图 1 跨境电商职业英语行动能力

#### (二)搭建三元融合的智慧学习场域

依托现有的智慧教室和实训室,整合数字技术,搭建了服务于上述能力的多模态学习场域:

1. 物理场域的智能化升级。将传统机房升级为“跨境电商综合实训室”。配备多屏显示系统,可同时展示产品后台、客户沟通界面和市场数据分析工具;设置直播角,配备绿幕、灯光、提词器等专业设备,支持学生制作多模态推广内容;部署 VR 头盔,用于模拟沉浸式的海外展会场景。

2. 数字场域的平台化构建。使用超星学习通平台作为教学中枢,发布任务、共享资源、进行过程性管理与评价;引入沙盒环境(Sandbox)的亚马逊、阿里巴巴国际站等平台后台作为实战工具,供学生进行无风险实操;使用豆包、DeepSeek 等 AI 工具辅助文案创作与优化,利用 FiF 口语训练系统进行客服口语专项训练;使用 Zoom、Skype 等工具定期连线海外合作企业的专家或真实客户,开展线上问答与交流。

3. 社会场域的协同化构建。在班级内模拟公司

架构,组建“创业团队”,每个团队负责一个虚拟(或真实)店铺的运营。团队成员分别担任运营、客服、推广等角色,分工协作,共同完成从选品、上架、推广到售后的完整任务链,再现职场协作关系。

(三)“典型工作任务”驱动的行动导向教学实践

我们以“运营一家跨境电商店铺”为总项目,围绕跨境电商核心岗位——运营、客服、营销——所必需的通用英语交际能力,设计了从产品上架、客户服务、商务谈判到订单管理的真实工作流程,最终形成一个“推广—服务—谈判—履约”的完整业务闭环。如表 1 所示,以“智能水杯”为模拟产品,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在两周内完成一系列仿真工作任务。每个任务聚焦一项核心能力,并提供相应的多模态资源支持与信息化工具辅助。

表 1 四大工作任务模块教学实施要素

| 任务模块         | 行动能力      | 情境创设                              | 多模态资源支持                               | 产出成果                   |
|--------------|-----------|-----------------------------------|---------------------------------------|------------------------|
| 一、新品上架与推广    | 产品数字化推广能力 | 团队选定一款产品(智能水杯),两周内完成新品上架与前期推广。    | 语料库提供产品描述范文、热门推广视频、SEO 关键词列表、AI 文案助手。 | 英文产品文案、1 分钟英文推广视频      |
| 二、处理客户投诉     | 跨境客户服务能力  | 团队收到一封海外客户投诉邮件,称收到的水杯有瑕疵并要求退款。    | 话术模板、应对投诉策略、客户情绪识别微课、AI 客服对话模拟器。      | 英文沟通记录、问题解决方案报告        |
| 三、参与虚拟海外展会   | 商务沟通与谈判能力 | 利用 VR 技术,学生在虚拟展会中与师生扮演的“海外采购商”交流。 | VR 展会场景、公司及产品英文介绍资料、谈判常用句型库、往届展会实录视频。 | VR 录制的谈判过程、获取的“客户”联系方式 |
| 四、订单管理与供应链协同 | 平台操作与沟通能力 | 处理不同国家的售后订单,并有一名客户因物流延迟而发起查询。     | 平台操作指南视频、物流比价表、发货通知模板、货代沟通话术、AI 翻译工具。 | 平台后台记录的操作过程、给客户的英文解释邮件 |

(四)贯穿全程、多元聚焦的表现性评估

我们建立了以“表现性评价”为核心、过程性与多元性评价相结合的评估体系。

1. 过程性评价(占比 30%)。学习通平台自动追踪记录学生在每个任务中的源学习时长、讨论参与度、任务节点完成情况,形成学习投入度报告,为教师提供过程干预依据。

2. 表现性评价(占比 50%)。每个任务模块均有对应的精细化评价量规(Rubric)。例如,对“产品视频”从“内容逻辑性”“英语流畅度”“视觉表现力”“营销效果”四个维度进行分级评价;对“客服邮件”则考查“问题解决有效性”“语言得体性”与“客户满意度”。

3. 多元主体评价(占比 20%)。引入教师评价、小组互评、学生自评。在关键任务(如虚拟展会)中,邀请企业专家通过观看录像或在线连线的方式进行点评与打分,其反馈成为衡量学生职业化程度的重要标尺。

(五)实践成效与反思

通过一学期的教学实践,学生英语学习的主动性和应用能力显著增强。其成果不再是抽象的分数,而是具象的“产品视频”“客服邮件”“谈判录像”等作品集。更重要的是,学生在“做中学”的过程中,不仅提升了语言技能,更系统地培养了跨文化沟通、团队协作、数字化工具运用等职业核心素养,实现了从“学英语”到“用英语工作”的转变。这一实践证明了数智时代多模态学习场域在培育职业院校学生英语行动能力方面的有效性与优越性,为相关专业教学改革提供了有益范式。

四、结语

数智时代正推动职业院校英语教学从“知识传授”向“行动能力培养”深刻转型。改革的核心是构建以行动导向为理念、数智技术为支撑、多模态融合为特征的新教学生态。本研究提出“物理—数字—社会”三元融合场域模型及跨境电商专业的实践案例,为这一变革提供了具体路径。未来,职业院校需应对基础设施、教师能力、激励机制等挑战,通过校企合作深化开发更贴近生产实际的仿真教学资源,才能真正让多模态学习场域“转”起来,让学生的英语行动能力“活”起来,最终培养出能胜任数智时代全球化工作的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

参考文献:

[1] Kress, G., van Leeuwen, T. Multimodal Discourse: The Modes and Media of Contemporary Communication [M].

London: Arnold, 2001.

[2] Lave, J., Wenger, E. *Situated Learning: Legitimate Peripheral Participation*[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3] 杨顺娥. 数智时代的英语教学模式转变与应对策略[J]. 外语研究, 2025, 42(3): 18-22.

[4] 张于琳. 大学英语多模态教学中跨文化思辨能力培养研究[J]. 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 2024, 37(20): 193-195.

[5] 罗媛媛. 基于行动导向教学的高职文秘专业学生职业英语能力培养研究与实践——以《文秘职业英语》课程教学为例[D].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 2021.

[6] 罗英, 王欣欣. 行动导向教学模式在高职英语口语教学中的应用[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17(28): 93-96.

[7] 郑海燕. 基于职业能力培养的高职英语教学研究[J].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3): 185-188.

## Cultivation Path for Workplace English Skills under Multi-modal Learning Field in the Digital-intelligent Era

LI Hui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Trade Management, Taizhou Vocational College of Science & Technology,  
Taizhou Zhejiang 318020, China)

**Abstract:** New demands on English skills have been imposed on technical and vocational talents in the digital-intelligent era. To address the disconnection between English learning and practical use,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construction of a multi-modal learning field through digital-intelligent technologies to cultivate students' vocational English competence. Grounded in theories such as multi-modal learning, it's proposed an integrated field model of "physical-digital-social" dimensions. This model leverages smart classrooms, VR/AR training, online platforms, and other tools to create immersive learning environments. Taking cross-border e-commerce as an example, teaching practice driven by typical work tasks was designed.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is approach effectively promotes the integration of students' English skills with vocational literacy, facilitating the transition from knowledge acquisition to workplace English skills.

**Key words:** digital-intelligent era; multi-modal learning field; workplace English skills; teaching path

# “一核两翼三化六环”模式在思政课堂中的实践运用研究

胡瑞民

(曲阜市第一中学,山东曲阜 273100)

**[摘要]**一堂思政课不仅要让学生收获理论知识,更重要的是要提升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基于“一核两翼三化六环”的模式,在思政课教学中,创设高效课堂,以议题为引领,通过情景材料,设置情景问题,既注重学生思考能力,也注重学生动手能力,让学生通过掌握理论知识去指导实践活动。并且,通过具体活动让学生切身感受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落实,来引领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培养自己的政治认同、科学精神、法治意识以及公共参与。

**[关键词]**一核两翼三化六环;高效思政课堂;学生主体;教师素养

**[作者简介]**胡瑞民(1989—),男,山东临沂人,法学硕士。

**[DOI]** <https://doi.org/10.62662/kxwxz0210011>

**[中图分类号]** G41

**[本刊网址]** [www.oacj.net](http://www.oacj.net)

**[投稿邮箱]** [jkw1966@163.com](mailto:jkw1966@163.com)

高效课堂以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合作探究,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为目的,通过思政课课堂教学改革,实施“一核两翼三化六环”的高效课堂教学模式,对思政课教师的数字化转型提出时代要求,教师的专业素养能得到很大提升,广大学生的综合素质也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能更好地锻炼学生创新思维能力。

## 一、“一核两翼三化六环”高效课堂教学模式的内涵要义

“一核两翼三化六环”高效课堂教学模式,其具体内涵为:“一核”是指教学设计与实施紧紧围绕“学科核心素养与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衔接”进行;“两翼”是指在培养学生核心素养上传统教学方式与现代教学手段并用互补,相融共存;“三化”是指课前、课中、课后三个阶段全过程贯穿和凸显“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智慧教育因子;“六环”是指课堂教学中遵循“自主、互助、探究”原则依次展开“导、思、议、展、评、检”六个环节。思政课堂要紧紧围绕核心素养政治认同、科学精神、法治意识、公共参与进行,与学生的综合素质紧密结合,要求课前集体备课,课后及时跟进。教学过程中利用信息化平台,引导学生思考、解答、分享问题。

## 二、“一核两翼三化六环”高效课堂教学模式的建构

高效思政课堂要坚持学生的主体性与教师的

主导性相结合,依靠“一核两翼三化六环”模式,构建高效课堂。

### (一)学生深入参与课堂活动

学生主体的参与要重视课前、课中和课后。课前对教材的预习以及对相关拓展知识的搜集能够更好地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增强学生的责任感、学习过程中的体验感,培养学生自信的学习品格,珍惜自己学习的成果。学生通过预习教材首先明确本课内容的设置,有一个基本知识的掌握,针对存在的疑问或者困惑的地方做好标记,反馈给老师。学生可以利用网络登录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去了解国家在反腐败方面的措施,感悟我党在从严治党方面的决心。

在教学活动中,教师要为学生提供明确具体的教学目标以及实现的路径。教学目标是一节课的导向,目标的设定不能太宽泛,要具体,能够让学生通过某一具体方法来解决设定的问题,引导学生独立思考、合作探究,激发学生能动性意识。同时,思政课教师要转变教学理念、创设思辩课堂。思政课堂不仅让学生掌握教材知识,更要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通过情景的设定,提升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思政课本身具有时代性、热点性,课堂情景的设置,站位要高,情景的设置要与问题相匹配,学生通过情景触发自己的思考,并在合作探究中分享不

同观点,从而共享不同观点。我们设置两个议题活动,例如:

1. 议题一:从《零容忍》谈全面从严治党。

议学情景:材料1:[解说词]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惩治腐败,是民心所向。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反腐败斗争摆在关系党生死存亡的高度,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老虎”“苍蝇”一起打、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坚决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使党永葆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材料2:《零容忍》专题片中的23位涉案人员,既有省部级领导,也有普通公职人员;既有已经退休多年的老干部,也有刚入职不久的“90后”。腐败案件涉及金融、政法、医疗、教育、粮食等多个领域。

议学问题:以上材料是如何推进党全面从严治党的?

2. 议题二:从“十四五”规划的出台透视党执政方式。

议学情景:“十四五”规划制定过程的主要环节:环节1:党中央发出研究“十四五”征求意见的通知,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环节2: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环节3:国务院“十四五”规划《纲要草案》编制工作领导小组在前期大量工作的基础上,全面对标对表中央建议精神,起草形成纲要草案。环节4: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纲要草案。环节5:国务院全体会议讨论纲要草案,决定将纲要草案发往各方面征求意见,听取各领域、各界别人士意见建议。环节6: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国务院拟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查纲要草案。环节7: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对纲要草案作进一步审查。环节8:全国人大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

议学问题:“十四五”规划是如何体现党执政方式的?学生通过分析材料,把握重要信息,在这些信息之间建立起了必要联系,通过具体内容的讨论,深化了对党执政方式的理解。

(二)提升思政课教师专业素养

高效的课堂离不开教师扎实的专业素养。思

政课教师要深耕教材,挖掘教材,利用思想政治教师教学用书统筹把握,分单元、分章节精准熟知知识,做好备课,做好教研,集体讨论,形成扎实的理论基础。同时,可以通过报刊、新闻联播或者学习强国App等,把握最前沿的理论知识,以理论去指导学生实践,让学生真实地体会到理论是如何指导实践的。比如针对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在反腐败过程中打“虎”拍“蝇”,教师可以通过《零容忍》反腐专题片让学生直观地感受到我们党在巩固党执政地位方面的具体措施,从而起到一个价值引领的作用。

基于“一核两翼三化六环”下的教学模式,教师要掌握必要的信息化设备的使用,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传统教学方式与现代教学手段互相补充。思政课教师要有主动接受新事物的意识,科技在发展,教育在进步,思政课教师要在思想上主动适应科技发展带来的变化,交互式的电脑如何应用,最新开发的教学软件如何为我们服务,思政课教师要主动出击,主动接受。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学生接触的先进设备更加频繁,而思政课教师不得不提升自己的信息化水平,比如DeepSeek技术的运用,通过先进教学设备做辅助,学生的兴趣认可度高、学生听课的关注度更集中,从而能更好地拉近思政课教师与高中生的距离。在课程的设置中,我们可以设置学生与AI对话,收集我们党在从严治党中的具体措施、具体案例,使学生更广泛、更真实地感受从严治党的过程与结果。同时,思政课教师要提升自己的专业知识素养水平,可以结合教学软件去培养自己的知识素养,提升自身知识水平,利用科技设备软件,搜集时政热点问题,从而与教材知识更好地结合,让学生既有知识的掌握也有知识的拓展。

(三)立足实践,与学生实际相融合

思政课要把理论与实践深度融合,与学生的实际相融合。在学习从严治党的理论中,学生在明白党的从严治党理论后,让学生深入到实践中去,去了解、去感悟。在教学过程中要注重学生的情感体验,调动学生的表达意愿,通过“展示”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比如,我们在讲到从严治党教学中,让学生展示课下搜集到的党从严治党的具体措施,通过展示与学生分享自己的学习成果,既能让学生展现了学习成果,又能把学生的学习情感充分展现。有

条件的地方可以联系当地法院,让学生现场旁听关于党员干部违法犯罪的审判,让学生的法制观念更深入人心。

#### (四)做好评价

对学生的评价伴随一堂完整课堂,通过评价可以让学生及时了解自己的学习情况,同时,又能引导教学活动的过程。评价设置三个方面:自我评价、同学间评价、教师评价。针对教师评价,借助表格通过维度划分等级,在维度方面的设置,比如是否通过例证来准确表达自己观点、与同学配合的主动性等方面来划分等级,以量化表的形式鼓励学生多参与,敢于表达自己的观点。在教学过程中,学生根据设置的问题,依据情景材料表达自己的观点,其他同学针对该生的回答来进行评析,如果有错误,可以提醒回答问题的学生及时完善答案,在这个过程中,学生间通过分享不同观点来深化对问题的认识。在自我评价方面,学生通过分享情景问题,通过自己思考的过程,通过对自己搜集材料的过程,针对自己的参与度做一个心里的评价,一堂

课有什么收获,不仅是知识的获取,更重要的是分析问题能力的提升以及价值观方面的升华。

#### 参考文献:

- [1]王真.思政课教师发展的数字化转型[J].思想政治课教学,2023(8).
- [2]王慧,黄万强.追寻议题式教学的和谐之美——以“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例[J].中学政治教学参考,2023(9).
- [3]董红干.善用大思政课提升核心素养[J].中学政治教学参考,2023(9).
- [4]叶本乾,林荣.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国式民主实践过程的思考与展望——基于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起草过程透视中国式政治现代化[J].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5).
- [5]胡雅雯,赵美岚.数智技术赋能“大思政课”的价值意蕴、现实困境与实践路径[J].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3).
- [6]刘志峰,王苏畅.新时代思政课实践教学有效提升的过程机理和实践对策[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综合版),2025(9).

### Research on the Application Practice of the “One Core, Two Wings, Three Transformations, and Six Steps” Model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lassrooms

HU Rui-min

(Qufu No. 1 Middle School, Qufu Shandong 273100, China)

**Abstract:** A political ideology course should not only enable students to acquire theoretical knowledge, but more importantly, enhance their ability to analyze and solve problems. Based on the “One Core, Two Wings, Three Transformations, and Six Steps” model, in the teaching of political ideology courses, an efficient classroom should be created. With topics as the guide, through situational materials, situational questions are set up, which not only focus on students’ thinking ability but also on their practical ability. This allows students to guide practical activities by mastering theoretical knowledge. Moreover, through specific activities, students can personally experie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arty and the country’s policies and guidelines, guiding them to establish correct values and cultivate their political identity, scientific spirit, legal awareness, and public participation.

**Key words:** One Core, Two Wings, Three Transformations, and Six Steps; efficien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lassroom; students’ subjectivity; teachers’ literacy

# 宁波高等教育与产业发展适配性提升研究

丁六申

(浙大宁波理工学院,浙江宁波 315000)

**[摘要]**本文基于“层次—学科—布局”高教结构与“效益—效率—升级”产业结构指标体系,运用平方熵权-TOPSIS 测得 2020—2024 年宁波高教有序度由 0.412 升至 0.643,产业有序度由 0.523 升至 0.689,协调度由 0.678 升至 0.816,呈现出持续向好态势,但仍落后于标杆地区。短板表现为:高等教育规模质量需强化、学科专业整体布局待优化、产教融合和科教融汇深度不足、教育对外开放程度不够高。为此,提出打造高水平多元办学体系、构建高能级产学研创平台、培育复合型拔尖创新人才、拓宽多层次国际交流格局等举措,以推动教育链与产业链深度耦合,为区域高等教育与产业协同发展提供“宁波实证”。

**[关键词]**宁波高等教育;产业发展;适配性提升

**[作者简介]**丁六申(1995—),男,浙大宁波理工学院助理研究员,浙江师范大学教育领导与管理专业博士在读,研究方向:高等教育、教育管理。

**[基金项目]**本文系宁波市哲社规划课题“宁波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适配性提升研究”研究成果(项目编号:G2025-3-40);浙江省教育厅 2025 年一般科研项目“适应人口变化趋势的区域高等教育协同发展策略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Y202557805)。

**[DOI]**<https://doi.org/10.62662/kxwxz0210012>

**[中图分类号]**G649.2

**[本刊网址]**[www.oacj.net](http://www.oacj.net)

**[投稿邮箱]**[jkw1966@163.com](mailto:jkw1966@163.com)

高等教育是科技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人才储备的关键资源以及创新能力的根本源泉,在其所处地区的经济、社会及文化环境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区域高等教育体系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愈发凸显,宁波共有高校 16 所,近年来整体稳步发展。本研究通过测度 2020—2024 年宁波高等教育与区域产业结构的协调度,系统分析高等教育与产业协同发展的薄弱环节,进而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 一、宁波高等教育与产业结构协调度评价

本文依据高等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的理论界定,参考既有研究文献,遵循数据科学性、可信性与代表性等原则,构建“层次—学科—布局”三维高等教育结构与“效益—效率—升级”三维产业结构两大子系统,各含 10 个三级指标。高等教育结构方面,层次维度包含研究生、本科和专科招生占比,学科维度包含第一、二、三产业对应学科毕业生人数占比、具备硕士点高校数,布局维度包含普通高校

数、高校专任教师数和生均教育事业费;产业结构方面,效益维度包含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人均 GDP,效率维度包含第一、二、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升级维度包含产业结构合理化、偏离度、高级化。数据来源于《宁波统计年鉴》、宁波教育局和各高校官方网站等。

其次,采用平方熵权-TOPSIS 框架测算各年有序度:对正向与负向指标分别标准化后,利用滑动 3 年窗口的动态熵权计算差异系数并赋权,进而以贴近度得高等教育结构有序度  $U_1$  与产业结构有序度  $U_2$ 。随后,引入修正的耦合协调模型,以

$$C_t = \left[ \frac{U_{1t} U_{2t}}{\left( \frac{U_{1t} + U_{2t}}{2} \right)^2} \right]^2, C_t \in (0, 1].$$

公式计算耦合度,并以

$$D_t = \sqrt{C_t T_t}, T_t = 0.5 U_{1t} + 0.5 U_{2t}.$$

求得协调度。

如表 1 所示,经测算,2020—2024 年,宁波市高等教育结构有序度  $U_1$  由 0.412 持续提升至 0.643,

产业结构有序度  $U_2$  由 0.523 升至 0.689;耦合度  $C$  从 0.984 趋近于 1.000,协调度  $D$  由 0.678(中级协调)跃升至 0.816(优质协调),表明宁波市教育链与产业链的协同发展呈现出持续向好趋势。然而,相较于徐健腾(2025)针对山东省高等教育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度的研究数据:该省 2020 年高等教育结构有序度已突破 0.6、2022 年产业结构有序度已超 0.8,且 2022 年耦合协调度  $D$  值为 0.87。宁波市在上述指标层面存在明显差距,表明区域教育链与产业链的协同发展机制亟待深入剖析与优化。

表 1 近五年宁波市高等教育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度

| 年份   | C 值   | D 值   | 协调等级 |
|------|-------|-------|------|
| 2020 | 0.984 | 0.678 | 中级协调 |
| 2021 | 0.997 | 0.723 | 高级协调 |
| 2022 | 0.999 | 0.752 | 高级协调 |
| 2023 | 1.000 | 0.783 | 高级协调 |
| 2024 | 1.000 | 0.816 | 优质协调 |

二、宁波高等教育与产业发展协同困境分析

(一)高等教育规模质量需强化

一是高教层级与城市定位仍有落差。宁波作为计划单列市、长三角南翼中心城市,拥有世界第一大港——宁波舟山港,2024 年 GDP 位居全国城市第 11。高等教育方面,宁波大学入选首批国家“双一流”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为唯一在甬高校,其突破路径呈现“单点突围”特征;在新一轮“双一流 196”工程的遴选中,其余高校暂无竞争力。依据 2025 年软科中国大学排名,除宁波大学、宁波诺丁汉大学稳居前 200 名外,浙大宁波理工学院、宁波工程学院、浙江万里学院排名徘徊于第 300 位,年度波动幅度极小。当前,宁波市对部分在甬高校的“一校一策”超常规支持举措仍停留在资源再分配层面,对高等教育发展的驱动作用尚未充分显现。二是办学规模与人才密度缺口明显。宁波市每 10 万人口中本专科生 1418.64 人、研究生 187.17 人,也都显著低于全国均值(1481.18 人、290.81 人)与全省均值(1158.05 人、263.91 人)。2024 年宁波市在校研究生仅 1.83 万人,其占在校生总量的比重显著低于全国及浙江省平均水平,折射出高层次人才培养与区域创新生态系统之间的“耦合度”不足。

(二)学科专业整体布局待优化

一是学科能级亟待突破。第五轮学科评估中,全市仅宁波大学水产学科获评 A-等次,且无 B+学科;截至 2025 年 5 月,宁波共有 3 所高校的 23 个学科进入 ESI 全球前 1%,总量不足杭州市的 20%,且无一进入前 1‰,落后于青岛、厦门等同类计划单列城市。二是学科设置与产业需求匹配不足。在对接宁波“361”万亿级产业集群的一级学科中,约三分之一未布点,面向集成电路、智能科学与技术等高端产业的交叉学科尤为短缺,高等教育服务支撑科技创新能力还不够强。三是同质化倾向削弱特色优势。如表 3 所示,材料科学、化学、工程学同时出现在 3 所高校的 ESI 前 1% 学科中。浙大宁波理工学院获批的硕士学位点,在宁波大学已实现 100% 覆盖,在宁波工程学院亦达到三分之二的覆盖率;宁波工程学院与浙大宁波理工学院开设的本科专业 60% 相同或相近,浙江万里学院与宁波财经学院的 2025 年本科招生专业 60% 相同或相近,资源重复配置现象较为突出。

(三)产教融合和科教融汇深度不足

一是校企协同深度不足。在 2025 年省级重点支持现代产业学院建设点名单中,杭州市获批 10 个、绍兴市 4 个、温州市 3 个,而宁波市仅占 2 个。在甬高校共拥有省级以上现代产业学院 13 个,约占全省总量的 14.6%,其中国家级现代产业学院 1 个。相较于宁波市 104 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的产业规模,以及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态势,高校产教融合深度仍显不足,反映出校企对接机制不够畅通,供需结构存在错位问题。二是成果转化链条存在短板。宁波大学建有省部级以上科研平台 43 个、宁波职业技术大学 17 个、宁波工程学院 11 个,其余高校平台数量均不足 10 个,高能级平台数量偏少导致科技成果转化存在瓶颈。2021 年高校科技成果(含专利)转化率低于 20%,近年虽略有提升,但调研显示:多所高校评价考核机制仍呈现“重研发轻转化”“重论文轻应用”倾向,缺乏针对成果转化的激励制度及专业化人才培养的实质性支持举措。

(四)教育对外开放程度不够高

一是统筹治理效能偏低。宁波发挥港口优势,驱动产业升级,推进城市国际化转型,加快建设现

代化滨海大都市,但在高等教育领域,尚未建立起与之相匹配的对外开放体系。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缺乏顶层战略设计与横向协同机制,导致中外合作办学、外籍师资引进及境外办学推广等工作呈现碎片化、短期化及被动性特征。二是国际资源供需错位。2024年宁波市外籍教师总量为919人,其中宁波诺丁汉大学占比近60%,多数高校存在外籍师资数量不足且专业分布失衡的现象,难以满足数字经济、新能源汽车等重点产业对国际化课程体系与前沿技术的迫切需求。同时,IB、AP、A-Level等国际课程引进及认证机制不完善,双语教学资源与跨文化教学能力培训投入不足,制约教育服务出口竞争力,致使人才培养规格与产业全球化运营需求产生脱节。三是全球影响力不足削弱产业引力。在甬高校在QS、USNEWS、THE等国际权威排名中的整体表现欠佳,多数院校缺乏系统化的国际认证与对外传播机制。城市层面缺乏有影响力的国际教育品牌战略与海外推广平台,对高端国际生源、顶尖师资及跨国教育资本的吸引力有限,制约了“教育—产业”协同升级的外部资源供给。

### 三、推动宁波高等教育与产业协同发展的对策建议

#### (一)打造高水平多元办学体系

一是优化高等教育空间布局。围绕国家区域重大发展战略,立足宁波甬江科创大走廊和翠屏山中央公园发展实际,整合建设宁波新南北高教园区,发展宁波五大高教园区,以“乘法”拔高北高教园区大楼和大师、“加法”提升南高教园区办学水平、“做加法”扩大奉化医学城新南高教园区、“腾挪法”在翠屏山中央公园周边打造集“校园、公园、科技园”于一体的余慈新北高教园区、“攀登法”做好北仑中本一体化现代滨海职教园区,构建高等教育集群与城市群、都市圈的联动发展格局。二是升级一批本专科学校。突出需求导向、一流多元,强化区域统筹和政策引导,分类支持宁波大学巩固扩大一流学科建设优势,成为宁波高等教育的“金名片”;宁波东方理工大学发挥新型研究型大学优势,在高层次人才、国家级重大奖项等方面取得突破,取得跨越式发展;宁波工程学院、浙江万里学院、宁波财经学院等应用型高校建好优势学科,提升与地方产业的匹配度,形成错位发展、各具特色的良好

局面;浙江药科职业技术大学、宁波职业技术大学利用好职业技术大学序列里的先发优势,在产学研结合方面先试先行;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等高职院校进一步整合资源,实现高质量发展。三是深化名城名校战略合作。唱好杭州、宁波“双城记”,与浙江大学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合作,支持浙江大学宁波科创中心(宁波校区)提升发展能级,统筹浙江大学在甬优质资源,充分发挥浙大宁波理工学院作为双方资源“载体”的关键作用,全面提升办学治校水平。

#### (二)构建高能级产学研创平台

一是夯实基础研究与应用平台。依托行业龙头、创新型领军企业,建设一批以应用基础研究为主的省级重点实验室,同步推进省工程研究中心培育建设。围绕地方主导产业需求,开展以应用为导向的产学研合作,形成“企业出题—平台答题—成果落地”的闭环,加速创新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二是构建企业主导的协同创新联合体。支持由企业牵头、高校院所深度参与的产教融合、科教融汇创新联合体;改革项目组织方式,提高产学研联合创新团队在重大科研项目中的参与度,力争让制造业项目占比达到80%以上,企业牵头产学研协同攻关项目占比不少于65%。完善“企业出题—联合攻关—市场验证”机制,推动更多科研任务直接源自企业需求。三是健全“大学+”全链条发展体系。支持高校在数字化领域打造高能级平台,完善平台运行、收益分配和人才流动机制,建立“科学研究—产业发展—人才培养”全链条体系,实现科研成果就地转化、产业急需人才就地培养。以甬江科创区为主平台,聚焦智能汽车、前沿新材料等重点产业,积极推进甬江实验室建设,不断提升科创平台能级,集中攻关关键核心技术,逐步抢占科技变革制高点。

#### (三)培育复合型拔尖创新人才

一是调整学科专业布局。坚持需求导向,对学科布局和专业设置进行前瞻布局和动态调整,主动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扩大理工类专业招生比例,鼓励高校增设制造领域数字化相关专业。二是革新人才培养模式。以新工科建设为重点,全面落实“学生中心、成果导向、持续改进”的国际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理念,加强“金课”顶层设

计,持续推进制造领域数字化课程改革,完善数字化人才教育体系,加快培养适应和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数字化人才。三是落实校企协同育人。做好顶层设计和统筹谋划,实施现代产业学院提质工程,支持应用型高校申报国家级现代产业学院,紧密对接“361”万千亿级产业集群,不断提高人才培养适应性,促进人才供给和产业需求有效协同,完善产教融合协同育人机制。

#### (四)拓宽多层次国际交流格局

一是完善教育对外开放工作机制。设立教育对外开放工作领导小组,制定《宁波教育对外开放促进条例》,明确开放边界、管理权限、保障机制,打造教育对外开放试验区。推动成立宁波教育对外开放产教融合联盟,由高校、企业、开发区共同参与,定期发布国际教育合作清单和人才供需信息。二是大力引进优质国际化资源。支持中外合作办学、国际课程体系建设,以宁波诺丁汉大学、宁波东方理工大学为龙头,鼓励高校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鼓励企业与高校合作设立海外实习基地、留学生实践中心。设立宁波国际教育特聘计划,重点引进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外籍专家学者,尤其聚焦STEM、人工智能、人文艺术等国际紧缺专业。三是打造“教育海丝”国际平台。依托中东欧合作、中非合作、海上丝绸之路等国家战略平台,鼓励高校在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立海外校区、中文语言中心、国际研究院。举办“宁波—中东欧教育合作论坛”“海丝青年研学营”等高端交流品牌活动,强化宁波教育输出功能。构建“Study in Ningbo”城市教育国际品牌体系,全面提升教育开放形象。

#### 参考文献:

- [1]耿化敏,吴娇.中国共产党创办新型高等教育的红色基因:历史之脉、科学内涵与传承路径[J].江西社会科学,2023,43(10):104-112.
- [2]徐健腾,裴勤瑶,李福宇.高等教育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及空间效应研究——基于山东省面板数据分析[J].山东工商学院学报,2025,39(3):107-120.
- [3]杜育红,赵冉,赵相尧.高等教育对创新型经济的贡献——基于企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24,22(1):18-40.
- [4]李涛,王燕,井长勤.产业学院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及经济发展的路径探索[J].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2025,38(10):31-33.
- [5]刘丽华,沈红.高校研发投入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J].黑龙江高教研究,2024,42(4):57-64.
- [6]黄雯怡.新时代大学生全球胜任力素养框架构建和培养路径研究[J].江苏高教,2023(12):94-100.
- [7]吴志强,张瑞,刘辉,等.地方高校卓越工程师人才培养的育人体系构建研究[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2(18):87-89.

## Ningbo High Education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daptability Enhancement Research

DING Liu-shen

(Ningbo Tech University, Ningbo Zhejiang 315000, China)

**Abstract:** The text is based on the “level-discipline-layout” higher education structure and the “benefit-efficiency-upgrade” industrial structure index system. Using the square entropy weight-TOPSIS method, it is measured that the orderliness of Ningbo higher education during 2020—2024 increased from 0.412 to 0.643, the industrial orderliness increased from 0.523 to 0.689, and the coordination increased from 0.678 to 0.816, showing a sustained and improving trend, but still lagging behind the benchmark area. The shortcomings are manifested in the need to strengthen the scale and quality of higher education, the need to optimize the overall layout of disciplines and specialties, insufficient depth of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and science-education integration, and insufficient degree of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To this end, measures such as creating a high-level diverse school system, building a high-energy production-study-research-innovation platform, training composite top innovative talents, and expanding a multi-level international exchange pattern are proposed to promote the deep coupling of the education chain with the industrial chain and provide “Ningbo proof” for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higher education and industry.

**Key words:** Ningbo higher educatio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daptability enhancement

# 构建新时代“五彩五育”高职院校劳动教育新格局

杨宇虹

(包头职业技术学院,内蒙古包头 014035)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教育评价具有导向作用,是教育教学活动的‘指挥棒’,是教育质量提升的‘助推器’”。新形势下,高校劳动教育的价值日益凸显。在阐述劳动教育课程评价内涵的基础上,本文分析了实施劳动教育课程评价的意义,并以包头职业技术学院为研究对象,针对目前高职院校劳动教育课程评价所处状态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剖析。同时,基于课程目标和评价体系的构建原则,着手创建一套由11项一级指标、17项二级指标共同构成的评价量化体系,并对二级指标的具体评级标准进行定性分析。

**[关键词]**劳动教育;课程评价;高职院校

**[作者简介]**杨宇虹(1989—),女,内蒙古乌兰察布人,包头职业技术学院讲师,劳动教育“双师”型教师,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高校思政教育。

**[基金项目]**本文系包头职业技术学院2025年第一批次科学研究项目“构建包职‘五彩五育’劳动教育新格局”(项目编号:2025137)。

**[DOI]** <https://doi.org/10.62662/kxwxz0210013>

**[中图分类号]** G711

**[本刊网址]** [www.oacj.net](http://www.oacj.net)

**[投稿邮箱]** [jkw1966@163.com](mailto:jkw1966@163.com)

在当今社会,劳动教育深度融入高职教育,是培养学生职业技能、赋能综合修为全域提升的核心方法,蕴含深远影响。职业院校要按照要求开设劳动教育必修课,主要从“三大精神”以及劳动安全、法规等角度进行规划。2020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指出抓好劳动教育的关键是课程,特别强调要整体优化学校课程设置,贯通大中小学各学段,贯穿家庭、学校、社会各方面,形成具有综合性、实践性、开放性、针对性的劳动教育课程体系,加强劳动教育评价。现阶段,我国高校劳动教育评价体系存在诸多不完善之处,高职院校尤为突出。针对现状,需要再次优化并构建起科学有效的评价体系,以此驱动高职院校劳动教育课程的深度推进。

## 一、开展课程评价的内涵及意义

### (一)课程评价的内涵

中国学者黄尧则从广义和狭义两个角度作出了阐释,认为广义的课程评价即教育评价,而狭义的课程评价则是对课程的计划、活动及结果的价值作出判断的过程。综上所述,课程评价对课程的育人质量与发展方向都起着引导、诊断、监测、调节等重要作用。

高校劳动教育课程评价体系是指高校教师从

劳动教育课程的需求出发,通过科学有效的评价方式,对学生应具备的劳动素养和劳动技能等进行多元、系统且具有针对性的评价。

### (二)劳动教育课程评价的意义

劳动教育课程评价体系在高校劳动教育课程建设中具有引导、监督和约束功能,是课程改进的重要参考,也是检测劳动教育质量的基础和重要标准,评价不到位,教育效果就无法保证。通过对学生的知识掌握、技能运用和素养发展等方面进行评价,当完成对评价结果的分析并进行有效反馈后,学校和教师便能更精准地把握学生的学习动态与具体表现,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调整课程的实施方向,确保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与学生的学习需求相匹配,这有助于提升学生的劳动素养和职业能力,培养适应社会需求的高素质劳动者。

## 二、劳动教育课程评价的现状和问题

高职院校劳动教育课程评价是实施劳动教育的关键环节,虽然劳动教育不以传统考试作为衡量标准,但“考核”与“评价”环节仍至关重要。然而,众多高职院校尚未建立起针对劳动教育的有效评价标准和体系,或未将其纳入教育评价制度之中,存在评价不全面、不完整、不成体系的问题,以单纯的理论课程代替劳动教育,仅以理论课的平时成绩作为学生劳动教育的评判结果。劳动教育评价呈

现出主体固化、内容浅表化、方式片面化的特点,评价主体较为固定,内容流于表面,且以结果评定为主。统一而多维的劳动教育课程评价指标体系尚未成型,缺乏科学、独立的教育评价体系,劳动教育课程没有可复制、可推广的一套科学合理的评价指标,这直接影响到劳动教育的育人实效。因此,完善劳动教育课程的评价体系和监督机制,成为当前高职院校亟待解决的问题。

### (一)劳动教育课程“边缘化”

当前,高职院校中劳动教育专职教师配备不足,大部分院校由班主任、辅导员承担劳动教育教学工作成为常态,授课教师的专业水平和授课效果参差不齐;劳动教育课程在人才培养方案总课程中占比较小,课时量和师资投入不足,且缺乏系统化的教学设计和考核标准,导致劳动教育“边缘化”严重。

### (二)评价不够全面

劳动教育课程内容评价应针对日常生活劳动、专业和生产劳动、服务性劳动三个方面进行全面考量,但目前的劳动教育课程在实施时无法对每一个学生进行跟踪考查,评价结论主要依据出勤和实践结果,相比之下,隐性成果体现在劳动态度、劳动品质、劳动习惯等劳动素养的提升方面,很容易受到评价者的忽视,导致评价体系不够全面。

### (三)个案分析

自2020年《意见》《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以下简称《纲要》)颁布以来,包头职业技术学院严格按照相关要求,在全体大一新生中开设了16学时的劳动教育必修课,开课时间已长达5年,累计了一定的教学经验,由于该研究对象具备典型性和普适性,因此研究结论在同类情境中具备较高的参考意义与应用价值。为了更加真实地了解劳动教育课程的现状,本文以作者所在的包头职业技术学院为例,主要从整体看法、劳动素养、教学方法、课程设计、课程考核和学习收获等6个方面,共设计了16个问题,有侧重、有层次地将180名2024级大一新生对劳动教育课程的意见和看法进行了专项调研,共计回收有效问卷172份。

从问卷分析的结果来看,同学们整体上对在高职院校开展劳动教育课程的必要性认识较为充分,但也有不到30%的学生对此认识不足。此外,调查问卷也反映出个别学生自认为缺乏良好的劳动素养、对劳动常识缺乏了解、不愿意主动进行劳动活动、参加学校组织的劳动实践活动的积极性不高、缺乏共同维护寝室卫生的集体意识、在劳动实践活动中缺乏团队协作能力等问题。可见,迫切需要加

强劳动教育这一重要环节在高职院校人才培养全过程中的地位和重要性,增强学生的劳动素养;在教学方法上,同学们更倾向于校外实践形式,普遍认为实践活动是对他们学习劳动教育课程最有帮助的教学方法;12%的学生对现阶段劳动课程的设计并不满意,希望丰富劳动教育的形式和内容;在课程考核方面,平时表现(出勤、课堂参与度、劳动态度等)、劳动实践考核(打扫教室、宿舍等)、考查(撰写劳动实践报告、心得体会等)和考试(理论知识笔试)等形式的喜爱程度依次递减,学生对目前劳动教育课程的考核方式满意度为56%,其余同学给出了中立或否定的态度,认为当前的考核方式存在局限性,希望能够重新设计考核方式;此外,32%的学生认为劳动教育课程的学习收获一般甚至是低效,21%的学生认为劳动教育课程对其今后的职业发展帮助不大。

总之,调查对象当前的劳动教育在教学方法、课程设计和考核方式等方面存在着亟需解决的突出问题,建立科学有效的劳动教育课程评价体系已迫在眉睫。

## 三、劳动教育课程评价体系的构建准则

教育部颁发的《纲要》指出,应结合平时表现评价、综合评价、质量检测等几方面,对劳动教育进行评价;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中也明确指出,要加强劳动教育评价,改进结果评价,强化过程评价,探索增值评价。

### (一)过程性评价为主

由于高校劳动教育评价工作涉及价值判断、过程评估与效果分析等多个层面,单纯依赖量化的指标考核或主观性的质性判断,都无法精准衡量劳动教育的整体质量,必须探索量化与质性相结合的综合评价模式。

### (二)加大劳动实践的比重

高职院校要结合人才培养方案和办学特色,加大劳动实践部分的比重,注重学生日常生活劳动育人的连续性和动态性,并结合“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开展劳动主题的活动周等形式多样的劳动实践活动,采取社会实践报告等形式,让第二课堂成为深化实践育人的重要阵地,促进理论教学与实践活动的双向赋能。

### (三)考查劳动综合能力

根据新时代高校劳动教育的内容要求,按照学生在劳动教育理论课程及实践课程中体现的劳动素养、劳动技能和劳动品质等设计劳动教育课程评价指标体系。劳动素养是劳动教育培养学生的精神层面内容,也是劳动教育课程评价体系的首要内

容;劳动技能是劳动教育的关键过程和重要环节;劳动品质则主要考查学生在劳动过程中的表现以及在此过程中所养成的劳动习惯。此外,评价指标体系还应包括学生的知识掌握、实践技能、团队协作、创新意识等多个方面,以全面反映学生在劳动教育中的综合能力。

(四)评价主体多元化

为优化劳动教育评价体系,学校应突破“教师单向评分”的固有框架,借助教学质量评价活动,建立师生共同参与的双向评价模式,赋予学生对劳动教育课程设计发表意见、参与评价的权利,推动评价模式从单一化向多元化“反转式”评价转变,更加全面、客观地掌握劳动教育课程的育人效果,从而有针对性地进行完善和改进。

四、劳动教育课程体系构建

(一)劳动教育课程目标

高职院校劳动教育课程围绕学生成长需求,以激发创新意识为抓手,以塑造良好劳动习惯与品质为路径,全方位为学生职业发展筑牢根基。

1. 知识目标:学生应了解劳动的基本概念、劳动法律法规和劳动安全等劳动常识,掌握基本的劳动原理和方法。

2. 能力目标:学生应具备基本的劳动技能和实

践能力,能够独立完成一定的专业生产任务。

3. 素质目标:学生应当秉持尊重劳动、热爱劳动的态度,进而形成优秀的劳动品质与高尚的职业道德素养,具备团队协作、创新创造等基本素质。

4. 情感目标:学生应形成正确的价值取向,认识到劳动的崇高和伟大,培养积极向上的劳动情感。

5. 态度目标:学生应养成良好的劳动态度和习惯,认真严谨、勤劳刻苦、脚踏实地,对学习和未来的工作充满热爱和激情。

(二)劳动教育课程评价体系

按照高职院校劳动教育课程目标要求以及评价体系的构建原则,本文尝试构建包头职业技术学院劳动教育课程评价指标体系,设计了评价量化表。需要强调的是,劳动教育课程评价不仅要要对课程本身进行评价,同时也要制定科学、量化的劳动教育课程考核标准。为此,本文结合作者所在的包头职业技术学院劳动教育课程调查问卷的实证研究结果,从学生评价和教学质量评价两个部分进行劳动教育课程评价指标体系构建,满分各 100 分,并按照各部分内容所占学时和重要程度折算了相应的权重(保留小数点后两位),由 4 个考核项目、11 个一级指标和 17 个二级指标组成,并且为一级指标进行权重的分配设定,评价量化表如表 1 所示。

表 1 包头职业技术学院劳动教育课程评价量化表

|        | 考核项目    | 一级指标    | 学时 | 权重        | 评分 | 二级指标           | 评分 |
|--------|---------|---------|----|-----------|----|----------------|----|
| 学生评价   | 理论课程    | 劳动素养    | 6  | 0.38      | 38 | 劳动观念和态度        | 8  |
|        |         |         |    |           |    | 劳动技能           | 6  |
|        |         |         |    |           |    | 劳动习惯和品质        | 6  |
|        |         | 日常表现    |    |           |    | 上课纪律和表现        | 6  |
|        |         |         |    |           |    | 出勤率            | 6  |
|        |         |         |    |           |    | 平时作业完成度        | 6  |
|        | 实践课程    | 综合能力    | 10 | 0.62      | 62 | 积极性、团队协作、创新精神等 | 12 |
|        |         | 日常生活劳动  |    |           |    | 责任心            | 10 |
|        |         | 生产和专业劳动 |    |           |    | 劳动精神等          | 10 |
|        |         | 服务性劳动   |    |           |    | 公共意识和志愿者精神     | 10 |
|        |         | 学段表现    |    |           |    | 劳动成果技能展示       | 20 |
| 教学质量评价 | 开发和实施阶段 | 内容评价    | /  | 0.28      | 28 | 课程定位与目标        | 15 |
|        |         | 硬件条件    |    | 0.1       | 10 | 课程设计和实施        | 13 |
|        |         | 师资评价    |    | 0.12      | 12 | 教学资源和实践条件      | 10 |
|        |         |         |    | 专兼职教师团队组建 | 12 |                |    |
|        | 成果检验阶段  | 终结性评价   |    | 0.5       | 50 | 理论课程教学和学习效果    | 19 |
|        |         |         |    |           |    | 实践课程组织和学习效果    | 31 |

### (三) 指标体系的定性分析

以包头职业技术学院人才培养目标为导向,对劳动教育课程评价量表中的二级指标评级标准展开系统性的质性研究,深入解读各标准的内涵与实施要求。

1. 劳动教育课程兼具理论性和实践性,因此,劳动教育课程评价应从理论课程和实践课程两个维度开展学生评价,其中理论课程的考核还要结合学生出勤率、上课纪律、与教师的配合度、课堂氛围以及平时作业的完成度等日常表现进行过程性评价。

2. 劳动实践教育要遵循校内外相结合的原则,并以劳动成果技能展示作为学段表现的主要参考。日常生活劳动作为最基础的劳动,多以家务劳动为主,或由劳动教育课程老师指导学生于每节课前、后常态化打扫教室卫生,每周集中检查一次宿舍卫生,重点考查劳动态度,并结合校园生活实际开展校园环境清洁卫生清洁等,进一步培养学生的责任心;专业和生产劳动旨在提升学生的专业技术水平;服务性劳动则主要包括专业服务和志愿公益服务,总学时不少于10学时,锻炼学生运用自身所学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服务他人和社会,以“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为依托,不仅组织敬老帮扶、社区服务及社会实践等常规活动,还鼓励学生参与学院及系部的赛会服务、公共设施维护、志愿公益等工作,同时,积极动员学生投身市级大型赛会志愿公益服务,如马拉松赛事保障、职业技能大赛志愿服务等,拓宽实践育人的广度与深度,旨在培养服务社会的公共意识和志愿者精神。在此过程中反映出的主观能动性、团队协作、创新精神等综合能力也是课程评价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3. 教学质量评价主要从课程开发和实施阶段、成果检验阶段两个维度展开。在内容评价方面,课程定位与目标主要考查课程与职业教育要求的结合程度;课程设计与实施是高职院校开展劳动教育课程的指南,需紧扣劳动思想、知识、技能、实践四大板块,主要考查课程设计是否涵盖了上级要求的必修内容、理论课与实践课的学时分配是否合理、与专业课程的融合情况、对未来职业发展有无切实帮助,重点考量教师能否精准把握课程特性与理论内核。

4. 在硬件条件方面,教学资源和实践条件主要考查劳动教育教材、教学资料和课程资源库等建设情况,以及学校能否提供丰富多样的校内外劳动实

践基地和活动平台,评估是否充分利用专业实习实训基地、大学生创新创业孵化园等校内资源,有序开展劳动实践活动并提供校园服务岗位;同时,考查是否为学生打造真实的校外劳动实践场景,提升实践能力。

5. 教师是课程设计和实施的重要组织者,师资评价主要考查专兼职教师团队组建情况,除了要注重专任教师的专业背景、职称和年龄结构、课堂组织和教学表达能力、教学科研成果以及专业培训情况等,还应聘请专业课教师作为劳动教育兼课教师,以充实劳动教育内涵、增强其专业性与科学性。

6. 成果检验阶段则是劳动教育课程评价的终结性评价阶段,重点聚焦于理论教学与实践课程的成效。鉴于学生是课程实施的核心参与者与直接体验者,课程质量的优劣首要体现为学生是否通过学习掌握了必要的劳动本领,以及所培育的劳动精神能否契合未来就业创业的实际需求。另一方面,从人才培养和社会认可的角度来看,是否符合学校、社会对未来劳动人才的需求,是否得到了家长、用人单位等的普遍认可。

### 五、下一步研究方向

劳动教育是一个综合体系,应由家庭、学校和社会共同组成。为了使研究更具针对性,且篇幅有限,本文只讨论了学校劳动教育课程的评价体系。而劳动教育课程在劳动教育全系统中的比重则是下一步要研究的内容。

### 参考文献:

- [1] 胡莹,黄滢. 以习近平劳动教育重要论述为引领推进劳动教育研究[J]. 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24(4): 42-47.
- [2] 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EB/OL]. [https://www.gov.cn/zhengce/2020-03/26/content\\_5495977.htm](https://www.gov.cn/zhengce/2020-03/26/content_5495977.htm), 2020-3-26/2025-5-6.
- [3] 教育部. 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试行)[EB/OL]. [https://www.gov.cn/xinwen/2020-07/15/content\\_5526951.htm](https://www.gov.cn/xinwen/2020-07/15/content_5526951.htm), 2020-7-15.
- [4] 汤小燕,魏宁,韩阳. 农业高职院校劳动教育课程评价指标体系研究[J]. 新疆职业教育研究, 2021, 12(4): 24-28.
- [5] 张家军,吕寒雪. 人工智能时代劳动教育的价值意蕴、可能困境与突破路径[J].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57(2): 61-71.

## Developing a New Labor Education Model for Vocational Colleges Through the “Five Colors and Five Educations” Initiative in the Contemporary Era

YANG Yu-hong

(Baotou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Baotou Inner Mongolia 014035, China)

**Abstract:**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pointed out that “educational assessment serves as a guiding force; it acts as the ‘baton’ for educational and teaching practices, while also functioning as the ‘catalyst’ to enhance educational quality”. In the current context, the significance of labor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prominent. Starting from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notation of labor education curriculum evaluation,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significance of carrying out labor education curriculum evaluation, and selects Baotou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as the research sample to analyze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status and existing issues of labor education curriculum evaluation in vocational colleges. Meanwhile, drawing on the principles of curriculum objective setting and evaluation system development, we will initia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framework composed of 11 first-level indicators and 17 second-level indicators, and carry out qualitative analysis on the specific rating standards for the second-level indicators.

**Key words:** labor education; course evaluation;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s

# PBL 教学法与移动教学 App 组合的教学实践与反思

秦 莉,张 烨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1620)

**[摘 要]**将 PBL 教学法与移动教学 App 结合应用于当今高校教学改革是一种比较常见的做法。这种新模式在建立教师与学生的联结、培育新型育人环境、强化解决问题的能力、团队合作等方面有很大优势。以实践教学探索与反馈来看,该模式将会是开启高等教育课堂教学数字化趋势,教师和学生均需通过适当时间的适应、较好的课程设计以及积极的参与,来获得较之前更好的教学效果。

**[关键词]**PBL 教学法;移动教学 App;以学生为中心;课程互动

**[作者简介]**秦莉(1977—),女,山西大同人,上海工程技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党史党建。张烨(1983—),女,山东泰安人,上海工程技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教育心理学。

**[基金项目]**本文系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2024 年校教学建设项目“数字化课堂的形态变革与实践创新——以《概论》课为例”(项目编号:y202422005mz)的研究成果。

**[DOI]** <https://doi.org/10.62662/kxwxz0210014>

**[中图分类号]**G434

**[本刊网址]**www.oacj.net

**[投稿邮箱]**jkw1966@163.com

近年来,我校作为工科类院校从国家教育发展战略出发尝试探索全新的教学模式以适应高等教育数字化发展需要,其中将 PBL 教学法与移动教学 App 结合应用于教学是一种相对普遍的教学模式,其目标在于充分利用现代化、数字化的教学手段建立教师与学生的联结,强化人才创新力的培养。本文想以此来讨论该教学模式的实践探索与教学反思,并提出该模式标准化实践的建议和意见。

## 一、研究背景

### (一)PBL 教学法的兴起

PBL 教学法是 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教育学家马丁·特罗(Martin Trow)提出了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后,美国高等教育衍生出的一种新型教学模式,PBL 是 problem-based learning 的简称,意思是以问题为基础的学习。这种教学模式是对以“教师为中心”的传统学习模式的反思,认为学习的过程应是以解决复杂问题或任务而展开,应以学生作为中心,鼓励学生在教学中自主学习,与教师和同学合作学习。在这种教学模式中,教师与学生也突破了传统的角色,教师更多地充当引导者与教练的角

色,而学生获得更多自主性,是自觉的学习者和思考者。因教师和学生角色的变化,传统的课堂教学环境也随之发生了较大变化,原本的以教师为核心的教师在讲台宣讲,学生记笔记的环境被打破,教师更多地走下讲台,融入到以学生为中心的课堂讨论小组中。这种教学环境的改变不仅意味着师生关系的变化,也意味着学生在教学中地位的提升,整个教学不是根据教学计划按部就班完成的任务,而变化成为根据学生的关注不断转移变化,根据讨论而形成相关联的、网络化的知识体系。这种教学模式给了学生以更多的主动性和话语权,让他们成为和教师一样平等的学习主体。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PBL 教学法在医学教学、工程教学、管理学中依次得到应用,并在整个高等教育中得到推广,成为发展到当前都比较流行的教学模式。

### (二)PBL 教学法与移动教学 App 的结合

随着现代化技术手段的发展,PBL 教学法在实际应用中也拥有许多模式,特别是在移动教学 App 的开发下,PBL 教学法越来越多与移动教学 App 结合,组合成为以学生为中心、联合线上与线下、现实

与虚拟环境叠加的组合型学习社区。这种学习方式既是现代市场化教学手段在课堂内的渗透,也是现代社会强调学习的泛在性、虚拟集聚学习社群、提供新的合作方式、重视学习绩效评价的一种新方式。根据观察,在已有的移动教学 App 中,无论是雨课堂、智慧树,还是疫情时得以大面积开发的超星学习通以及腾讯课堂等,均是以便利教学管理、搭建后台数据平台、自动生成评价统计、建立网络课程为卖点获得了相关教育工作者的青睐。将 PBL 教学法与移动教学 App 结合,可以利用 App 平台将学生与教学任务整合,大幅提升课堂教学和教学讨论的组织效率,也可及时获得课堂教学绩效。应该可以看到,随着移动教学 App 应用的推广,PBL 教学法与移动教学 App 的结合将会是未来高等教育课堂教学的一种受欢迎且流行的教学方式。

## 二、移动教学 App 实践 PBL 教学法的实际探索

依托“5G+马院”“5G+德育大数据分析实验室”等技术平台,我校把数字化驱动的思政课程教学改革视为未来教改的总思路,推动思政课数字化教学改革的实际课改建设。我校在课程改革实践中有两大方向:一,从手机的学习功能出发,集中于移动教学 App 的应用与推广,使师生能够利用手机的学习功能获得最大效益;二,从教学需要出发,设计更符合当代大学生学习习惯的 PBL 教学法,使之在课堂中拥有更多的自主性,提高其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与此同时,在教学内容上,以研究设计、小组讨论、观点陈述以及互动讨论四个环节强化教学效果,以构建线下预习自学、课堂分享、线上讨论、答疑以及合作的新型学习环境。

在这种新型学习环境中,课堂的形态不仅在时间、空间上得到延展,还建构了师、生、技三者在课堂载体中的互动关系。教师是课堂整体设计的规划者,其工作围绕课程授课内容分课前、课中和课后三个教学阶段进行。课前阶段以移动教学 App 为工具将课程大纲、主讲内容纲要以及需要阅读的参考书、研究专题的研究设计以及讨论要求发布于在线课程,明确学生课前个人需要完成的任务以及小组专题任务;课中阶段集中于课程内容概述与小组专题的陈述与讨论,由于强化了课前学习,教师无需花费太多时间陈述具体内容,而是以学生小组中共同关注的问题为中心,展开陈述与讨论,形成

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交流和互动,为解决问题提供可供借鉴的方案;课后阶段,学生在线上小组中围绕该问题形成自己的结论,撰写相关的小论文、研究报告等,并将之传送至移动教学 App 的空间中。课程的考核以学生在课程过程中的参与度为评价依据,把其课堂发言、讨论参与以及上传的小论文与研究报告的数量与质量作为具体的评价指标实行量化管理,学生可以在课程的任意阶段看到自己的学习评价,并敦促自己为了学业而不断努力。经过这样流程的教学活动在技术载体的支持下完成了传统教学模式无法完成的任务,也让教师与学生在技术支持下获得了全新的交互关系。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在此过程中都增加了参与度和目的性,教师突破了单一灌输式教学任务,需要以学生为中心建构时空广度更高的课程设计,增加与学生的互动;与此同时,学生需要更多参与到学业中,增加主动性和创造性,提高课程学习的效率。

通过移动教学 App 即时与快捷的后台统计与教学反馈,这一教学模式还可以在课堂组织、课程管理、课程考核上实现教学评价的图像化直观呈现,师生可以第一时间获知该课程的评价反馈,从而修正自身教学或学习过程中的无效或低效情况。

## 三、新教学模式应用中的教学反馈与不足

在实现 PBL 教学法与移动教学 App 结合的教学应用中,我们发现,这种新型的教学模式在形式上获得了较大的接受度,也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教学效果,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PBL 教学方式深化了课堂教学的内容和理解

通过以问题为中心的课前、课中和课后的全阶段学习,学生可以围绕问题进行更加系统的思考和分享,有利于课堂的师生互动。PBL 教学法的实践也更符合当代大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接受规律,较为有效地刺激了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创造性。通过在课程中的发言,发言学生也获得更多的自信与收获,其表达能力与分析问题的能力均得到了锻炼。这种新教学模式相较于传统教学方式是一项重大的改变,实现了从“以教师为中心”到“以学生为中心”的转向。

(二)全过程、全方位的线上与线下课程呈现

在教学 App 的支持下,课堂内容和课程成果得

到全过程、全方位的线上和线下呈现。随着教学App的普遍使用,教学的线上课堂和线下课堂是相辅相成的存在,这极大地提高了课程的可及性,师生均能便捷地获取课程的相关资料和信息。同时,基于应用的支持,课程教学中的即时问答、课堂考勤以及互动讨论都有了多样化的表达,图像化、直观化以及交互性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学生和老师可以在其中充分发挥自己的主创性,实现线上与线下的实时融合,而不受原有物理时空的限制,这极大地扩展了课堂边界和师生关系,重构了课堂的形态。

### (三)课程满意度获得有效提升

根据教学App的统计情况来看,我所在学院的课程教学到课率、作业完成情况、考核等指标完成度比较理想。这一方面得益于数字化手段的沟通便捷性,但更重要的方面在于项目式的教学导向使得学生“被迫”改变角色,主动参与其中,这种转型倒逼学生课前自我学习,学会提问。这一主动学习的过程激发了学生的学习潜能,在教师优化教学设计、侧重教学成果产出的同时,学生在学期内课程中不仅完成了教学考核要求,还完成了社会实践、参赛、锻炼新技能等社会技能的培养,实现了多重任务的达成。于此,学生在给老师的教学反馈中曾多次表达过后者对其个人表达、思维以及团队合作能力提高的作用。

当然,由于受传统学习习惯的影响,PBL教学法与移动教学App组合的教学实践在教学中的效应也受限三个因素:第一,小组讨论的参与度决定了学习效果,部分课堂讨论未能达到预期效果。一般,学生在小组讨论中的参与越积极越有效,课堂讨论若出现学生参与积极性差、准备不充分,教学效果可能因其不作为而大打折扣。第二,PBL教学法与移动教学App的组合表面上利用了手机等设备的学习功能,实践中却也将师生束缚于线上平台,造成原本的学习时间被大量事务性、操作性工作占用。与此同时,学习成果的上传与下载还缺乏有效的管理,现行移动教学App还无法做到对学生个人知识产权的保护,这造成了一部分优秀学生的顾虑,也给某些学生以可乘之机。如何既得到信息资源的共享,又保护知识产权,是比较突出的问题。第三,PBL教学法增加了课程的不确定性,对任课

教师提出了较强的控班要求,如果教师专业水平弱,对选题不能够做到有控制力,就会造成被学生话语牵引的局面,这也意味着教学效果的弱化。因此,学生的课堂参与度、课堂讨论的组织效度以及教师的控制力是目前在该教学模式实践中较为突出的问题,该教学模式还需要较长的适应过程,无论教师还是学生均需突破传统思维,以适应新的教学环境与教学要求。

### 四、余论

自2022年推出ChatGPT之后,其发展的生成式AI技术(特别是2025年发布的DeepSeek)极大地刺激和改变了教育生态。数智化变得迫在眉睫。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在2024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就提出,将实施人工智能赋能教育行动,积极推动以智助学、以智助教、以智助管、以智助研,从国家教育发展层面对未来中国教育的发展前路点明了方向。

而从2023年开始,生成式AI对高等教育实践的冲击可谓是迅雷般的。一些重点大学已经开始数字化、数智化布局试点。浙江大学率先开始开发教学智能体的教学实践,上海交大发布“AI+HI”赋能教育教学三年行动方案,清华大学从2024年开始就为学生提供智能学伴,实现“师、生、机”融合协作。由上可见,生成式AI技术辅助教师优化了教学方法,丰富了师生学习体验,还有效推动智能技术赋能教育评价,提升了教育管理效率,并在科研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之,科大讯飞公司发布2024智能教育发展蓝皮书,详述生成式AI的教育应用,强调高等教育的传统理念借此得到技术性延伸,教育过程被细分为教学、学习、评价、管理和研究五大“场域”或“场景”,教育过程也被重构为基于人的实践而产生的关系结构和教育内容时空构型的混合体。

可以预测的是,数字化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数字教学资源的大量涌出极大拓展了高校教学过程的教学空间和教学形式,对数字化时代课程教学的教学形态,包括紧密围绕国家教育政策、技术革新、社会需求以及思政教育实践的挑战展开的,对课程教学的教育理念、教学方式、教学过程与结构、教学评价等进行与时俱进的变革和实践应是必然之举。

回到本文,虽然PBL教学法与移动教学App结合进行数字化教学改革的尝试只不过是这场巨大

教育变革中极微小的尝试,但其操作的可行性和可及性却十分强大。校园网络、手机等硬件设备是每所高校必备的资源,而于学生而言,熟练使用和利用已有的教学 App 也是目前学习中必备的技能。通过两者的技术结合,加之在课程中教师能够主动提升数字素养,围绕数字化驱动的课堂教学变革进行更多主动的创造与设计,课堂的主体、内容、评价、科研、实践等都将获得全新的内容和形态重构。而随着这种课堂创造的增多,在教学实践层面形成行之有效的、数字化驱动的新型数字化教学模式也将指日可待。

#### 参考文献:

- [1] 李晓蓓,冯旭霞. 以“PBL 教学”赋能高校思政课建设[J]. 昌吉学院学报,2023(2):60-64.
- [2] 熊国相,谭伟宁. 学生中心视角下 PBL 教学模式探索与实践——以“外科学”为例[J]. 科教导刊,2022(24):115-117.
- [3] 讯飞教育技术研究院,认知智能全国重点实验室智能教育研究中心. 2024 智能教育发展蓝皮书——生成式人工智能教育应用[R]. 2024.
- [4] 魏忠. 数字时代的教育转型[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
- [5] 蒋森,历晶. 数字素养标准下高校教师核心能力现状调查与提升路径[J]. 长春师范大学学报,2024,43(4):127-132.
- [6] 刘怡然.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引入 PBL 教学模式初探[J]. 长春师范大学学报,2011(6):198-199.
- [7] 约瑟夫·E·奥恩. 教育的未来: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变革(第二版)[M].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25.
- [8] 吴刚. 基于问题式学习模式(PBL)的述评[J]. 陕西教育(高教),2012(4):3-7.

### Teaching Exploration and Feedback of the Combination of PBL Teaching Method and Mobile Teaching App

QIN Li, ZHANG Ye

(School of Marxism, Shangha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Science, Shanghai 201620, China)

**Abstract:** Nowadays, it is a common practice to combine PBL teaching method and mobile teaching Apps in the educational reform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is new model, which encourages flexible and interactive teaching and learning, has great advantages in establishing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cultivating a new digital education environment, strengthening the ability to solve problems, and teamwork.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actical teaching exploration and feedback, this model will be the trend of higher education classroom teaching in the future. Both teachers and students need to adapt to it by taking time to acclimatize, better course design and active participation to achieve better learning outcomes than before.

**Key words:** PBL teaching method; mobile teaching App; students-centered; classroom interaction

# 讲好中国故事视域下中国特色治国理念英译本与高校外语教学的协同育人研究

高莉莉,刘宝强,王子绮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外国语学院,山东泰安 271016)

**[摘要]**在全球化背景下,“理解当代中国”与“讲好中国故事”成为我国对外传播与高等教育的重要使命。展现中国治国理念、发展道路与文化内涵的核心著作英译本,为高校外语教学提供了兼具政治高度与文化深度的教学资源。本文以协同育人理论为支撑,剖析中国特色治国理念英译本的育人价值,结合高校外语教学现状,从教学内容重构、教学方法创新、师资队伍建设和评价体系优化四个维度,探索二者协同育人的具体路径,旨在通过著作英译本与外语教学的深度融合,培养兼具扎实语言能力、坚定政治立场与国际传播素养的复合型外语人才,助力国家对外话语体系建设。

**[关键词]**理解当代中国;讲好中国故事;中国特色治国理念英译本;高校外语教学;协同育人

**[作者简介]**高莉莉(1980—),女,山东德州人,山东第一医科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英语语言文学硕士,研究方向:文化与翻译、外语教学。通信作者:刘宝强(1978—),男,山东枣庄人,山东第一医科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外国文学。王子绮,山东第一医科大学外国语学院2022级翻译本科学生。

**[基金项目]**本文系山东第一医科大学(山东省医学科学院)校级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理解当代中国,讲好中国故事——《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英译本与高校外语教学的协同育人研究”(项目编号:XM2024064)。

**[DOI]** <https://doi.org/10.62662/kxwxz0210015>

**[中图分类号]** H059

**[本刊网址]** [www.oacj.net](http://www.oacj.net)

**[投稿邮箱]** [jkw1966@163.com](mailto:jkw1966@163.com)

## 一、协同育人的理论基础与核心内涵

### (一)协同育人理论的内涵与价值

协同育人理论源于系统科学中的“协同论”,强调不同系统要素通过相互作用、相互配合,实现“1+1>2”的整体效能提升。在教育领域,协同育人特指教育过程中各类教育资源、教学环节、育人主体通过有机联动,形成目标一致、功能互补的育人合力,以达成人才培养的最优效果。

对于高校外语教学而言,协同育人的核心在于打破单一教学模式的局限,将语言教学与价值引领、文化传播、政治素养培养等目标相融合。中国特色治国理念英译本作为承载中国特色话语、政治理念与文化精神的重要文本,与高校外语教学在“培养国际传播人才”这一目标上高度契合。二者的协同不仅能提升学生的语言应用能力,更能帮助

学生深刻理解当代中国的发展逻辑,树立正确的国家立场与文化自信。

### (二)中国特色治国理念英译本与外语教学的协同逻辑

中国特色治国理念英译本与高校外语教学的协同,本质是“语言载体”与“育人目标”的深度耦合。从文本属性来看,该英译本既具备外语教学所需的语言规范性与专业性,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领域的专业词汇与复杂句式,是提升学生翻译能力、阅读能力与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优质素材;从思想内涵来看,著作系统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包含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中国的发展道路与全球治理观,为外语教学注入了丰富的思政元素与文化内涵。

二者的协同逻辑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知识层

面,通过英译本的语言分析,提升学生的外语专业知识与翻译技能;二是思想层面,借助著作内容的解读,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政治立场与价值观念;三是能力层面,通过文本的翻译实践与传播模拟,培养学生用外语讲好中国故事的国际传播能力。这种多维度的协同,恰好回应了新时代外语人才“语言能力+思政素养+传播能力”的培养需求。

## 二、中国特色治国理念英译本的育人价值与教学优势

### (一)政治引领价值:筑牢学生的政治立场

展现中国特色治国理念的著作,其内容贯穿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系统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深刻道理。其英译本在准确传递原文政治内涵的基础上,采用符合国际话语习惯的表达,为外语教学提供了“政治正确”与“表达精准”兼备的教学素材。

在教学过程中,通过对著作中“中国梦”“人类命运共同体”“全过程人民民主”等核心政治概念英译本的分析,学生不仅能掌握相关术语的规范译法,更能深入理解这些概念的内涵与时代背景。例如,在讲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英译“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时,可结合全球疫情防控、气候变化等国际议题,引导学生认识到中国提出这一理念的全球意义,进而增强对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认同,筑牢“四个自信”的政治根基。

### (二)文化传播价值: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

中国特色治国理念著作中大量引用中国古典文献、成语典故与名言警句,如“治大国若烹小鲜”“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等,其英译本在翻译过程中,既保留了中国文化的核心内涵,又采用了国际读者易于理解的表达方式,为学生提供了“文化转译”的典范。

这些文化负载词的翻译案例,成为外语教学中文化传播教育的绝佳素材。例如,对于“治大国若烹小鲜”的英译“governing a large country is like cooking a small fish”,教师可引导学生分析译者如何通过隐喻保留原文的文化意象,同时避免文化隔阂;再结合该名句引用的语境,让学生理解中国传统治国智慧与当代国家治理理念的传承与创新。通过这类教学,学生既能提升文化翻译能力,又能深刻感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增强文化自信与文化传播的主动性。

### (三)语言教学优势:提升学生的专业能力

从语言教学角度来看,中国特色治国理念英译本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首先,词汇丰富性:著作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多个领域的专业词汇,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新发展格局”(new development pattern)等,这些词汇是当前中国对外传播中的高频术语,掌握其译法对学生未来从事国际传播工作至关重要。其次,句式复杂性:著作中的句式既有严谨的理论阐述句,也有生动的实践总结句,如长难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其英译本通过合理的句式拆分与逻辑衔接,实现了原文含义的精准传递,为学生学习复杂句式翻译提供了范例。最后,语篇逻辑性:著作的篇章结构严谨,论点明确,论据充分,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到“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再到“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形成了完整的逻辑体系。通过对语篇结构的分析,学生能提升外语阅读与写作的逻辑思维能力,为今后的学术研究与实务工作奠定基础。

## 三、中国特色治国理念英译本与高校外语教学协同育人的现状与问题

### (一)协同育人的实践探索现状

近年来,随着课程思政建设的推进,部分高校已开始将中国特色治国理念英译本引入外语教学。在翻译专业教学中,教师将著作中的文本片段作为翻译案例,引导学生分析中国特色话语的翻译策略;在大学英语教学中,部分教师选取著作中与学生生活相关的内容,如“青年成长”“教育公平”等章节,作为阅读与讨论素材;在跨文化交际课程中,教师以著作英译本的传播效果为切入点,引导学生探讨中国话语的国际传播路径。

同时,一些高校还开展了相关的教学改革项目与学术研究,如基于中国特色治国理念英译本的翻译教学模式探索、课程思政案例库建设等。这些实践为二者的协同育人积累了初步经验,也证明了著作英译本在外语教学中的可行性与价值。

### (二)协同育人面临的主要问题

尽管已有一定的实践探索,但中国特色治国理念英译本与高校外语教学的协同育人仍处于起步阶段,面临诸多问题:

一是教学内容融合不深入:部分教师对著作英

译本的使用停留在“碎片化”层面,仅选取个别句子或词汇作为翻译例子,未能将著作的思想内涵、文化价值与语言教学进行系统融合。例如,在讲解翻译技巧时,只关注句式的转换,而忽略了句子背后的政治语境与文化内涵,导致“语言教学”与“思政教育”“文化教育”脱节,未能实现协同育人的整体目标。

二是教学方法单一:当前多数教学仍采用“教师讲解+学生被动接受”的传统模式,缺乏互动性与实践性。对于中国特色治国理念英译本这类理论性较强的文本,教师若仅进行逐句翻译与解读,容易使课堂氛围枯燥,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缺乏模拟国际传播场景的实践环节,如让学生以著作内容为基础进行英语演讲、撰写对外传播稿件等,导致学生难以将所学知识转化为实际的国际传播能力。

三是师资队伍能力不足:实现二者的协同育人,对教师的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教师不仅要具备扎实的外语专业能力,还要有深厚的政治理论素养与文化解读能力。但目前部分外语教师存在“政治理论储备不足”的问题,对中国特色治国理念的思想内涵理解不深入,难以在教学中准确传递著作的政治与文化价值;同时,一些教师缺乏“思政元素挖掘”的意识与能力,无法将著作内容与外语教学目标有机结合,导致协同育人效果大打折扣。

四是评价体系不完善:当前高校外语教学评价仍以“语言能力考核”为主,如词汇、语法、翻译技巧等,缺乏对学生政治素养、文化传播能力的评价指标。在涉及中国特色治国理念英译本的教学过程中,由于缺乏科学的评价体系,教师难以准确衡量教学效果,学生也缺乏提升自身思政素养与传播能力的动力,导致协同育人的目标难以落到实处。

#### 四、中国特色治国理念英译本与高校外语教学协同育人的路径探索

##### (一) 重构教学内容:实现“语言+思政+文化”三维融合

分专业设计教学内容:根据不同外语专业的培养目标,将中国特色治国理念英译本内容与教学大纲深度融合。对于翻译专业,可将著作中的政治术语、文化负载词、复杂句式作为核心教学内容,开设“中国特色话语翻译”专题课程,系统讲解“中国梦”“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核心概念的翻译策略,同时结合著作中的案例,引导学生分析译者如何平衡“政

治准确性”与“文化可接受性”;对于英语专业(非翻译方向),可在《高级英语》《英语写作》等课程中,选取著作中与“青年责任”“教育发展”“生态文明”等相关的章节,作为阅读与写作素材,让学生在提升语言能力的同时,理解中国的发展理念;对于大学英语教学,可选取著作中通俗易懂且具有现实意义的内容,如“脱贫攻坚”“疫情防控”等案例,设计成对话、短文阅读等教学模块,让非外语专业学生也能通过学习,了解当代中国的发展成就。

挖掘文本中的思政与文化元素:教师在备课时,需系统梳理中国特色治国理念英译本中的思政元素与文化元素,形成“教学元素清单”。例如,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章节中,可挖掘“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章节中,可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将这些元素与语言教学内容结合,如在讲解“人民至上”的英译“putting the people first”时,可引导学生结合中国的脱贫攻坚成就,讨论“人民至上”理念的实践意义;在讲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关内容时,可让学生对比著作中古典名句的原文与英译本,分析译者如何实现文化内涵的精准传递。

##### (二) 创新教学方法:打造“理论+实践+互动”多元课堂

采用案例教学法:以中国特色治国理念英译本中的翻译案例为核心,开展案例教学。例如,选取“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英译“whole-process people's democracy”,引导学生分析译者为何采用直译法,而非意译法;再对比国外媒体对“中国民主”的误读,让学生讨论如何通过准确翻译打破国际社会对中国民主的误解。通过案例分析,学生既能提升翻译能力,又能加深对中国政治制度的理解。

开展实践教学:设计以“讲好中国故事”为主题的实践教学,将中国特色治国理念英译本内容转化为实践项目。例如,组织“中国发展成就英语演讲比赛”,让学生以著作中“经济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等内容为基础,撰写演讲稿件并进行演讲;开展“模拟国际记者会”活动,让学生分别扮演中国发言人、外国记者,以著作中的政策表述为依据,进行英语问答与回应,模拟中国话语的国际传播场景;鼓励学生参与“中国特色治国理念英译本传播志愿者”项目,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向国际友人解读著作中的中国理念,将课堂所学转化为实际的传播行动。

运用翻转课堂与混合式教学:借助线上教学平台,构建翻转课堂教学模式。课前,教师将中国特色治国理念英译本中的文本片段、翻译案例、政治概念解读视频等资源上传至平台,让学生自主学习;课中,组织学生进行小组讨论,如“如何用英语向外国友人解释‘新发展理念’”“中国特色治国理念英译本在国际传播中的优势与不足”等,教师则进行引导与点评;课后,布置实践作业,如让学生撰写“我眼中的中国发展”英语短文,或制作“中国特色治国理念经典语句翻译解析”短视频,通过线上平台提交并进行互评。这种教学模式既能提升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又能增强课堂互动性,提高协同育人效果。

(三)强化师资队伍:构建“专业+思政+文化”能力提升体系

开展专题培训与研修:高校应定期组织外语教师参加中国特色治国理念专题培训,邀请政治理论专家、翻译学者进行授课,帮助教师深入理解著作的思想内涵、翻译策略与育人价值;同时,组织教师参加“课程思政与外语教学融合”研修班,学习如何挖掘文本中的思政元素,如何设计“语言+思政”的教学案例。例如,可开展“中国特色治国理念英译本翻译技巧与思政元素挖掘”工作坊,让教师通过案例分析、分组研讨等方式,提升自身的专业能力与思政育人能力。

建立跨学科教研团队:组建由外语教师、思政课教师、翻译学者组成的跨学科教研团队,开展协同备课与教学研究。外语教师负责语言教学内容的设计,思政课教师负责政治理论的解读与思政元素的挖掘,翻译学者负责翻译策略的分析。例如,在设计“中国特色话语翻译”课程时,外语教师提出语言教学重点,思政课教师补充相关政治理论背景,翻译学者提供翻译案例分析,三者协同设计教学方案,确保教学内容既符合外语教学规律,又能准确传递政治与文化价值。

鼓励教师参与实践与研究:支持外语教师参与中国特色治国理念英译本的传播实践,如担任著作国际传播的志愿者,或参与地方政府的对外宣传翻译工作;同时,鼓励教师开展相关的教学研究,如申报“中国特色治国理念英译本与外语教学协同育人”课题,撰写教学案例与研究论文。通过实践与研究,教师既能提升自身的政治素养与传播能力,又能将实践经验转化为教学资源,推动协同育人的

深入开展。

(四)优化评价体系:建立“语言+思政+传播”综合评价机制

完善考核内容与指标:在外语教学考核中,增加“思政素养”与“传播能力”的考核指标。例如,在翻译专业的期末考试中,除了考查翻译技巧与语言准确性外,增设“政治准确性”“文化传播效果”等评分维度;在大学英语课程考核中,增加“中国发展理念理解”“国际传播意识”等开放性试题,如让学生撰写“如何用英语向外国友人介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短文,并从内容准确性、语言流畅性、传播效果等方面进行评分。

采用多元化评价方式:结合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构建多元化评价体系。过程性评价可通过课堂表现、实践活动参与度、线上学习情况等进行考核,如学生在“模拟国际记者会”“英语演讲比赛”中的表现,在社交媒体平台传播中国特色治国理念英译本内容的效果等;终结性评价可采用笔试、口试、实践报告等多种形式,如让学生提交“中国特色治国理念某章节翻译解析报告”,或进行“中国特色话语翻译”口试,全面考核学生的语言能力、思政素养与传播能力。

引入第三方评价与反馈:邀请思政课教师、翻译专家、行业从业者(如外事工作者、国际传播机构人员)作为第三方评价主体,参与教学评价。例如,在学生完成“讲好中国故事”实践项目后,邀请外事工作者对学生的传播内容、语言表达、政治准确性进行评价;在课程结束后,邀请翻译专家对教学内容的设计、教学方法的运用进行点评。通过第三方评价,确保评价结果的客观性与专业性,同时为协同育人的改进提供参考。

## 五、结语

中国特色治国理念英译本与高校外语教学的协同育人,是新时代“理解当代中国”“讲好中国故事”使命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具体体现。二者的深度融合,不仅能为外语教学注入丰富的政治内涵与文化价值,提升学生的语言专业能力与国际传播素养,更能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国家立场与文化自信,培养出符合国家对外传播需求的复合型人才。

尽管当前协同育人仍面临教学内容融合不深入、教学方法单一、师资能力不足、评价体系不完善等问题,但通过重构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法、强化师资队伍、优化评价体系等路径,以及加强政策支

持、校际合作与社会协同,这些问题必将逐步得到解决。未来,随着协同育人实践的不断深入,中国特色治国理念英译本将在高校外语教学中发挥更大的育人价值,为国家对外话语体系建设与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至第四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2022.
- [2] 顾世民,肖成笑.《习近平用典》的外宣翻译策略与对外传播理路研究[J]. 上海翻译,2023(4).
- [3] 周小玲,何思慧.《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翻译研究的可视化分析(2015—2022)[J]. 外语与翻译,2023,30(2).
- [4] 王洪涛,刘倩. 基于两个平行语料库的中国特色话语

翻译教学模式探索——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汉英翻译教学为例[J]. 外国语文研究,2023,9(3).

[5] 刘嘉. 翻译教学的课程思政探索——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英译本的分析讲解为例[J]. 黑龙江教育(理论与实践),2023(2).

[6] 王昊,王浦程. 大学英语课堂教学方法探讨——以《理解当代中国:英语演讲教程》为例[J]. 中国 ESP 研究,2023(2).

[7] 郑佳. 汉英翻译相关理论与方法教学研究——评《理解当代中国:汉英翻译教程》[J]. 人民长江,2023,54(5).

[8] 教育部. 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Z]. 2020.

[9] 张艳莉,李晶.《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英译本在高校翻译教学中的应用研究[J]. 外语教学,2022,43(5).

[10] 黄忠康,余承法. 外宣翻译研究:理论与实践[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

## A Study on the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of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China's Distinctive Governance Concepts and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lling China's Stories Well

GAO Li-li, LIU Bao-qiang, WANG Zi-q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ndong First Medical University, Tai'an, Shandong 271016, China)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globalization, “understanding contemporary China” and “telling China's stories well” have become important missions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higher educatio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core works that demonstrate China's governance concepts, development paths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s provide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ith teaching resources that combine political height and cultural depth. Supported by the theory of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ducational value of the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China's distinctive governance concepts. Combined with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t explores the specific paths of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between the two from four dimensions: the reconstruction of teaching content, the innovation of teaching methods,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ing staff and the optimization of evaluation system. The purpose is to cultivate compound foreign language talents with solid language proficiency, firm political stance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literacy through the in-depth integration of the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works and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so as to contribut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system.

**Key words:** understanding contemporary China; telling China's stories well;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China's distinctive governance concepts;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 五育融合视域下分析化学实验“美育思政”教学研究

周文娟, 张国华, 刘 丹

(江苏理工学院化学化工学院, 江苏常州 213001)

**[摘要]** 本文围绕分析化学实验课展开, 深入探讨如何将美育和思政有机融入专业课程教学中, 以实现“以美育人、培根铸魂、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剖析分析化学实验课、美育与思政教育的关联性, 论述了分析化学实验课程与美育、思政相结合的必要性。通过优化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法、完善课程评价体系和优化师资队伍等措施, 激发学生的学习激情与探索欲望, 提升学生科学思维能力、审美能力和社会责任感, 为实现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与价值引领的有机统一提供了可行方案。

**[关键词]** 美育; 课程思政; 分析化学实验

**[作者简介]** 周文娟(1988—), 女, 江西抚州人, 实验师, 硕士, 研究方向: 分析化学实验教学研究与管理。张国华(1971—), 女, 吉林白城人, 高级实验师, 硕士, 研究方向: 分析化学实验教学研究与管理。刘丹(1987—), 女, 黑龙江鸡西人, 副教授, 博士, 研究方向: 复杂样品的分离分析、新型样品前处理方法开发。

**[基金项目]** 本文系江苏理工学院教学改革与研究课题“‘五育’融合视域下分析化学实验课程开展美育教学研究与实践”(项目编号: 11611412417)。

**[DOI]** <https://doi.org/10.62662/kxwxz0210016>

**[中图分类号]** G41

**[本刊网址]** [www.oacj.net](http://www.oacj.net)

**[投稿邮箱]** [jkw1966@163.com](mailto:jkw1966@163.com)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课程思政是指高校所有课程都要担负育人责任, 发挥思想政治教育作用, 即“课程承载思政”与“思政寓于课程”; 以课程为载体, 充分挖掘蕴含在专业知识中的德育元素, 实现专业和德育的有机融合, 将德育渗透、贯穿教育和教学的全过程。美学教育是以艺术体验为桥梁的, 通过激发学生的审美感知与文化认同, 丰富其精神世界与创新能力, 升华其人生观、价值观、道德情操等内在美。随着“五育并举”教育理念的提出, 在课程教学中融合课程思政和美学教育是新时代教学改革的必然趋势, 有助于实现“立德树人”和“五育并举”的人才培养目标。

分析化学实验是化学学科重要的实践教学环节, 对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意义重大, 也是锻炼学生团队协作精神与创新思维的有效途径。传统的分析化学实验教学多侧重于操作技能的培训, 缺少美育和思政元素。将美育和思政融入分析

化学实验课程, 既能够丰富教学内容、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 又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提升人文素养。

## 一、分析化学实验课程与思政教育、美学教育的关系

### (一) 分析化学实验课程与美学教育的关联

美感源于严谨的科学态度。在分析化学实验中, 它呈现出的秩序与和谐之美并不是偶尔出现的产物, 而是实验者规范、娴熟的操作技能的外在体现。滴定终点时那一瞬间精准的色彩突变, 看似简单的操作, 实则是操作者无数次反复练习、对手腕力道和滴定速度精细控制的结果; 沉淀反应生成规则、色彩绚丽的晶体, 其背后也离不开对溶液浓度、反应温度、搅拌速度等一系列实验条件的严格把控。正是这种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科学态度, 才得以将化学反应内在的科学规律, 转化为肉眼可见、触手可感知的形态美和过程美。这使学生深刻体会到, 严谨的科学态度不仅是探求真理、获取知识的基石, 更是创造美、展现美、传递美的根本途径。

实验设计促进美学素质培养。分析化学实验

在环境监测、食品药品安全等领域具有广泛应用,这要求学生不仅掌握基础理论和操作技能,更需具备设计可靠分析方案以及解决复杂实际问题的能力。实验设计作为连接理论与实践的桥梁,是课程教学的核心环节,直接促进学生美学素养的塑造和提升。学生从样品前处理、分析方法选择到测量条件优化的全流程设计,锤炼的是对科学本身内在美感,如逻辑的严谨、步骤的流畅、结果的精确等的追求、创造与实现能力。当学生通过自主设计的方案,成功获得线性优良的标准曲线、清晰准确的滴定终点或重现性好的数据时,便亲身体验到通过实践将理论之“真”转化为数据之“美”的过程。

## (二)分析化学实验课程与思政教育的关联

培养科学精神与创新思维。分析化学实验是分析化学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分析化学理论课教学紧密相连,在实验过程中要求学生具备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养成严谨细致的实验习惯,如尊重原始数据、恪守操作规范、勇于探究异常现象背后的原因。课程中涉及的实验方法设计、复杂样品前处理以及仪器条件优化等问题,需要学生运用创新思维去分析和解决。通过在实验过程中主动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和创新思维,能够激发学生探索未知的主动性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为其今后参加实际工作及开展科学研究打下良好的基础。

树立职业道德与社会责任感。分析化学实验所获得的数据与结论往往会直接影响到食品安全检测、环境质量评估等与民生紧密相关的领域,这就要求从业者不仅需要具备扎实的专业技能,还应有强烈的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在实验教学环节中,教师一方面通过严格落实实验“三废”环保处理要求,引导学生具备环保意识;另一方面借助数据篡改、结果误报等真实案例的分析,让学生感受到每一个实验数据的背后都可能牵涉到大家的健康安全、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和社会的公正正义,从而培养他们严谨求实、精益求精的职业素养。这有助于学生在今后工作中自觉遵守职业道德规范,严守数据质量底线,切实服务于社会公共安全和国家发展需求。

## 二、分析化学实验融入美学教育实现课程思政的目标

### (一)知识与技能目标

1. 学生通过本课程可以较系统地学习到分析化学实验的基本知识和典型的分析方法,加深并巩固

对分析化学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的理解;正确熟练地掌握分析化学实验的基本操作和技能,具备分析和解决应用化学领域特别是分析检测涉及的工程实际相关问题的能力。

2. 充分认识和理解分析化学实验对“量”的要求,牢固树立“量”的概念,正确运用误差理论分析实验过程中影响分析结果准确度的关键因素和环节;学会合理地选择实验条件和实验仪器,科学地处理实验数据,正确表达实验结果。

### (二)美学教育目标

1. 培养学生的审美意识和审美情趣,使学生认识到科学活动中蕴含的秩序、和谐与简洁之美,养成主动发现、欣赏和追求科学美的良好品质。引导学生超越技术的机械重复,从精准的实验现象、规整的实验数据、优美的仪器图谱和流畅的实验流程中,感受科学实践本身所具有的独特美感,提升审美素养。

2. 提升学生表现美与创造美的实践能力,让学生在分析化学的实验设计和操作中,掌握将理论知识转化为优美实验结果的关键技能。通过规范、娴熟的实验操作获得精确可靠的数据,通过严谨、创新的方案设计呈现出理想的结果,使学生能够将内在的科学规律外化为可靠、完美的实验结果,实现求真与求美的统一。

### (三)课程思政目标

1. 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和求真品质。通过实验中对“量”的精确追求,引导学生树立严谨求实、一丝不苟的科学态度,深刻理解“实事求是”是科学研究的生命线。通过探索实验现象背后的机理和优化分析方法,激发学生勇于探索、敢于质疑的创新精神,培养其追求真理的科学理想和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2. 增强学生的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通过向学生阐明实验数据在食品安全、环境监测等领域的重大作用,引导他们树立“数据即责任”的职业操守。在此过程中,帮助学生养成诚实守信、客观公正的道德准则,并增强绿色环保与服务社会的责任意识,最终使其成长为自觉恪守职业操守,成为国家和人民可信赖的数据卫士。

## 三、分析化学实验美育思政实施路径

### (一)教学内容优化

挖掘课程中的美育元素。教师从实验设计、实验原理、仪器构造、操作规程、现象观察和报告撰写

等多维度挖掘化学学科所蕴含的美学元素。例如,酸碱滴定管、锥形瓶、容量瓶和移液管等玻璃仪器,它们不仅具有造型上的曲线美、直线美与对称美,还体现出严谨的结构设计与功能性美感。在教学实践中,教师要求学生规范使用仪器,如通过控制酸式滴定管的活塞开度以控制滴定速度,从而控制反应速率和反应历程,这一过程让学生在掌握实验技能的同时感受仪器的外在形式美,还引导其深刻理解内在性能美,实现美学感知与实验技能的统一。

融入思政教育案例。根据我校分析化学实验课程具体实验内容,从化学发展史、榜样人物事迹和案例等角度深入挖掘思政元素。例如,分析化学中的酸碱滴定法、氧化还原滴定法和沉淀滴定法被发现得早,但缺少直接滴定金属离子的方法,直到 20 世纪 40 年代,瑞士科学家施瓦岑巴赫在大量研究的基础上,开创性地提出利用氨羧络合剂的滴定法,极大推动了络合滴定法的飞速发展。这告诉同学们科学的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不断积累和进步的,培养学生脚踏实地的精神。

## (二)教学方法创新

项目式教学法。采用项目式教学法,通过设计综合性分析项目,将分析化学的实验技能融入实际问题的解决中。例如,增加“凌波湖水中氯含量的测定”“果蔬中维生素 C 含量测定”“胃舒平药片中铝和镁含量的测定”等项目任务,引导学生组建团队自主完成文献调研、方案设计、样品采集与前处理、样品分析和实验报告撰写等过程。在此过程中,学生不仅综合锻炼文献检索、滴定分析、仪器操作等技能,还深刻体验分析工作的系统性、规范性与创造性。通过项目实践,学生的项目管理、团队协作和解决复杂问题的综合素养得到提升,并深刻体会到运用专业知识为社会提供可靠数据的价值与成就感。

问题导向教学法。以问题为导向,创设具有挑战性和现实意义的分析问题情境,引导学生进行探究。例如,提出“指示剂的用量是否会影响滴定终点误差?”“晶型沉淀生成过程进行搅拌的目的是什么?”等问题。通过一系列针对性、个性化的启发式讨论,促使学生的实验操作不再是机械的重复,而是在教师引导下,从被动操作者转变为主动探究者,有效培养了其批判性思维、科学探究能力以及作为分析工作者的责任感。

虚实结合教学模式。利用虚拟仿真平台,让学

生在进入实验室前,在虚拟环境中安全、无损耗地进行高风险(如强酸、强碱、有毒试剂操作)、高成本(如大型分析仪器 AAS、HPLC 的故障排查与优化)实验的预习和演练。同时引入微课和操作视频辅助教学,针对关键操作难点(如滴定终点的精准判断、重量分析中“沉淀的陈化、过滤与灼烧”)提供标准化示范。线下授课时,通过课堂提问和讨论,教师及时了解学生对知识点的掌握情况,动态调整授课重点。将线上预习与线下实操有机结合,既保障了实验安全,又将课堂宝贵的时间更多地集中于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动手能力和数据分析能力,实现了教学效率和教学深度的同步提升。

## (三)课程评价体系完善

构建多元化评价体系。将实践能力、美学素养和思政教育成效纳入评价指标,建立多样化的课程评价体系。评价指标除了现场操作技能考核外,还增加学生课前预习、课堂表现、实验操作和实验报告等方面。课前预习评价关注学生对实验原理的理解深度、对实验设计中蕴含的科学美、环保和安全意识等方面的思考;课堂表现评价侧重学生问题讨论与互动质量;实验操作评价考查学生实验操作的规范性与团队协作能力;实验报告评价关注数据分析的准确性、实验报告的规范性等方面。

突出美育和思政教育的评价。将美育与思政教育的目标转化为可观察、可衡量的评价指标,为评价工作提供明确依据。美育的评价聚焦学生实验操作的规范性与熟练度、实验报告的完整性与美观性等维度;思政教育的评价侧重学生实验操作的严谨性、对实验数据的诚信态度及社会责任感等方面。

## (四)师资队伍优化

教师能力的提升。将美育和思政融入分析化学实验课程中,教师的角色不仅是知识的传授者,更需要成为学生的指导者和激励者。作为课堂的组织者与推动者,教师自身应当具备扎实的专业技能和综合素养,并持续拓展知识视野、优化教学策略。教师通过参与专题培训、开展同行交流与教学研讨等多种途径,不断提升自己在美育和德育融入分析化学实验课程中的教学能力。同时,教师也应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各类美育思政实践活动,鼓励他们表达自己的创造力和审美观点,给予他们充分的支持和指导。

教育理念的更新。教师应主动寻求角色转型,

从知识的传授者转变为引导学生学习、促进其全面发展的领路人,这意味着教师要从关注“教什么”转向关注“学生学什么、如何学、学到了什么”,以成果为导向反向设计,确保学生的学习成果达到预期。

#### 四、分析化学实验课程目标达成评价

以 2022 级和 2023 级应用化学专业学生为研究对象,开展教学改革实施前后的比较研究发现:改革实施后学生在总体课程目标上的达成度从 0.809 提高到 0.833,高分段人数比例由 6.0% 升高到 7.1%,而低分段比例则从 36.4% 降低到 21.4%。这一结果表明,教学改革不仅加深了学生对课程内容的理解、提升了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有助于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与审美能力。

在本轮实验课程结束后,以授课班级为对象开展问卷调查,从学习态度、学习体验和学习收获等维度进行系统调查。调查表明,学生对这种教学方式给予肯定。他们不仅在实验预习认真程度、实验操作技能、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上有进步,而且对学习的主动性和参与度也明显增强。不少学生反馈,他们通过实验深刻感知到了化学的学科魅力,对化学的学习兴趣得到激发,这一学习过程也帮助他们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培养严谨的科学态度,并促进师生及生生之间的有效沟通交流。

#### 五、结论

在“五育并举”和立德树人的教育背景下,将美育和思政教育融入分析化学实验教学,不仅是贯彻

党的教育方针的具体实施,也是推动教学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路径。通过优化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法和完善课程评价机制,能够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与探索欲望,增强其科学思维能力、审美素养和社会责任感,从而实现专业知识传授、美学素养和思政教育的有机统一。然而,美育和思政课程建设是一个系统性和长期性的工作,需要长期坚持与不断探索实践。在今后的教学中,还需持续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更新教学资源、推进校企协同育人机制,为培养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奠定坚实基础。

#### 参考文献:

- [1] 童俊,马青. 应用型高校落实立德树人的必要性及实践策略[J]. 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2024,37(10):26-30.
- [2] 何英,谭平. 大思政视域下分析化学实验课程建设初探[J]. 广州化工,2022,50(21):262-264.
- [3] 陶梅. “三课堂三浸润一带动”德育与美育融合育人模式研究[J]. 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2025,38(10):34-38.
- [4] 李玲,王娟,王飞翼. 大一学生无机化学实验美育“思政教学初探”[J]. 大学化学,2025,40(1):40-47.
- [5] 华中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 分析化学实验(第5版)[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4.
- [6] 赵玥. 以美育人——分析化学实验教学中的美育教育探索与研究[J]. 科技风,2022(18):34-36.
- [7] 张娟,马艳艳,潘聪洁,等. 混合教学模式在药学专业分析化学实验课程中的实践研究[J]. 大学化学,2024,39(12):57-64.

### Research on “Aesthetic Education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Analytical Chemistry Experiment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Five Educations”

ZHOU Wen-juan, ZHANG Guo-hua, LIU Dan

(School of Chemistry and Chemical Engineering, Jiangs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hangzhou Jiangsu 213001,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Analytical Chemistry Experiment course and delves deeply into how to organically integrate aesthetic education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professional course teaching to achieve the educational goal of cultivating people through beauty, cultivating the soul, and fostering virtue and nurturing talent. It analyzes the correlations among Analytical Chemistry Experiment courses, aesthetic education, and ideological-political education, as well as discusses the rationale for their integration. Through a series of measures such as optimizing teaching content, innovating teaching methods, improving the course evaluation system, and enhancing faculty quality, the aim is to stimulate students' enthusiasm for learning and their desire to explore, enhance their scientific thinking and aesthetic ability, and strengthen their sense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This provides a feasible path for achieving the organic unity of knowledge imparting, ability cultivation and value guidance.

**Key words:** aesthetic education; course ideology; Analytical Chemistry Experiment

# 数字文明视域下农村教育生态重塑与发展研究

艾贵成

(四川三河职业学院,四川泸州 646200)

**[摘要]**在数字文明视域下,聚焦农村教育生态的系统性重塑与发展问题。引入“人机料法环”分析框架,系统解构农村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内涵、核心挑战与实施路径。以数字化为底层驱动力推动农村教育全要素、全链条的生态迭代,推动农村教育向开放、均衡、智慧、韧性与乡土特色兼具的新形态演进。注重顶层设计与基层创新相结合、基础设施与数字素养同步发展,破解接入与能力双重鸿沟。通过评价改革引导系统变革,促进数字时代农村教育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数字文明;农村教育生态;生态重塑;人机料法环;教育数字化转型

**[作者简介]**艾贵成(1972—),男,四川泸州人,四川三河职业学院建筑与能源工程学院高级工程师,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高职教育新能源、石油工程。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国成人教育协会2025—2026年度成人继续教育助力乡村全面振兴课题“数字文明视域下农村教育生态重塑与发展”(项目编号:XCYP2025066S)。

**[DOI]** <https://doi.org/10.62662/kxwxz0210017>

**[中图分类号]** G521

**[本刊网址]** [www.oacj.net](http://www.oacj.net)

**[投稿邮箱]** [jkw1966@163.com](mailto:jkw1966@163.com)

## 引言:从工具叠加到生态重塑

近年来,以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为核心的数字文明正加速演进,深刻渗透社会运行的各个领域。教育领域积极融入这一变革,不断推进、提升、重塑教育生态结构。相较于城市地区,我国农村教育在资源禀赋、师资力量、基础设施、数字理念等方面都有明显不足。数字文明浪潮既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更蕴含了跨越数字化鸿沟、实现优质均衡发展的重大战略机遇。然而,必须清醒认识到,将数字化技术简单“叠加”于传统农村教育生态之上是远远不够的,其结果往往加剧“数字废墟”风险与资源浪费。数字文明之于教育,应如同阳光、空气和水之于生命系统——它不是外在的工具,而是深度渗透、持续孕养、支撑并重塑整个教育生态系统运行的底层基座与核心驱动力。

立足数字文明宏大视域,创新性地将工业工程领域广泛应用的“人机料法环”这一精炼、系统的分析框架引入教育研究领域,旨在系统地解构数字技术如何全方位、深层次地重塑农村教育生态的五个核心维度(即“人—Manpower”“机—Machine”“料—Material”“法—Method”“环—Environment”),分析

其面临的核心挑战,并探索切实可行的重塑与发展路径。

## 一、“人机料法环”框架下的农村教育生态重塑路径

### (一)“人”(Manpower):角色的进化与数字素养的跃升

“人”是教育的根本,是出发点、着力点、支撑点和归宿点。在数字文明视域下,学生、教师、管理者和家长等都处于不断学习、成长、跃升的变革中。学生从被动的知识接收者转变为主动的数字化学习者、内容需要者、创作者和促进者,具备信息检索、批判思维(根据自身需求选择性学习)、协作共创能力。教师从知识讲授者转型为学习设计师、引导者、数据分析师和情感关怀者,掌握数据驱动的精准教学能力、督导能力和开发能力。管理者从传统的行政管理转向基于大数据的教育治理专家,实现上层设计、统筹规划、资源配置优化与风险预测。家长突破时空限制,从教育旁观者转变为可深度参与的协同育人伙伴。

#### 1. 核心挑战

虽然我国智能手机普及率高,大家对微信、抖

音等 App 很熟悉,但是,农村教师、家长群体普遍面临数字技能与意识不足的困境,难以适应教育生态新角色要求,数字素养鸿沟显著。从熟悉的传统教育模式向数字模式转变,角色转变阵痛剧烈,需要持续的心理调适与专业支持。在数字化演变过程中,过度依赖技术可能导致师生、生生间情感连接弱化,以及人文关怀缺失风险,育人本质被技术理性遮蔽。

## 2. 重塑与发展路径

“人”的重塑关键要“两手抓”,一手抓“数字技能”的外部培训与装备提升,一手抓“数字素养与教学理念”的内化与革新。实施嵌入式数字素养提升工程,摒弃孤立培训,将数字技能(如数据解读、AI 工具应用)深度融入教师日常工作(备课、教研、评价)和管理者决策流程,形成常态化、伴随式学习机制。定义新角色与能力模型并配套激励,明确数字时代乡村教师核心能力画像(如学习设计、数据分析、人机协同教学),重构绩效考核与职称晋升体系,强化正向激励。构建人机协同育人新模式,清晰界定 AI 与人类教师的职能边界。AI 侧重高效知识传递、精准测评与个性化练习推送。人类教师聚焦情感引导、高阶思维培养、创造力激发、价值观塑造及本土文化浸润等无法替代的领域。打造全域数字家校共同体,充分利用低成本、高普及率的平台(如定制化微信小程序、区域教育云家校模块),设计易于参与的远程协同育人活动(如线上家长沙龙、学生成长档案共享、乡土项目共评),让外出务工家长深度融入子女教育过程。

(二)“机”(Machine):从孤立硬件到泛在智能环境

数字文明赋予“机”的新内涵是构建无缝融合的智能教育环境。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终端泛在化,低成本学习平板、轻量级 VR/AR 眼镜、环境传感器等设备普及教室与学习空间;二是网络全域化,依托 5G/6G、低轨卫星互联网等技术,实现高速、稳定、低延迟的乡村全域覆盖,“最后一公里”瓶颈有效破解;三是平台智能化与一体化,深度融合国家/省级智慧教育平台、本地化城乡教研管理平台、AI 助学平台,形成统一服务入口。

### 1. 核心挑战

“机”的困境主要体现在弱、多、杂,不系统、不

统一。接入“顽疾”难除,偏远地区网络覆盖盲点与信号稳定性问题依然突出,设备电力保障亦是挑战。运维能力薄弱,缺乏本地化专业维护团队,设备故障率高,更新换代缺乏可持续资金支持。平台孤岛林立,各类系统互不联通,数据割裂,师生需频繁切换账号登录,徒增负担。

## 2. 重塑与发展路径

“机”的重塑关键是“两条腿走路”,一条是基础设施的迭代与普惠接入,一条是平台与服务的融合与智能进化。推动新基建深度下乡,将教育数字化基础设施(网络、算力)纳入乡村振兴与数字乡村建设优先级项目,因地制宜综合利用光纤、5G 毫米波、低轨卫星(如星链模式)等方案解决接入难题。推广“云—边—端”协同架构,核心计算与存储上云,降低终端设备性能要求与购置成本。边缘节点处理本地实时需求,推广轻量化、低功耗终端。显著降低运维复杂度与成本。强制推行平台互操作性,由省级教育主管部门牵头,制定统一数据标准接口(如遵循 LTI、xAPI 等),强制要求接入平台开放对接,实现“一次认证,全网通行”和无缝数据流通。建设虚拟实践场域,基于 VR/AR/数字孪生技术,开发“虚拟科学实验室”“云端数字农场”“乡土文化数字博物馆”等,弥合农村学校物理实验条件与文化资源的不足。

(三)“料”(Material):从统一教材到智适应资源供给

数字文明赋予“料”的新内涵是实现资源的精准化、在地化、智适性与动态进化。利用 AI 引擎,基于学生学情画像实时生成个性化习题、阅读材料和学习路径。深度融合乡土资源,运用 VR/AR、GIS 技术开发本土自然地理、历史文化、特色产业的“数字研学”课程。资源库依据教学反馈与学习数据分析,实现内容的自动优化、更新与精准推荐。

### 1. 核心挑战

“料”是数字视域下农村教育的基础、核心,其面临不足、不好、不适等困境。资源应用效能低下,现有资源库内容与农村本地教学进度、学生基础、文化背景脱节,教师“不会用、不愿用”。优质资源获取壁垒较高,商业性优质数字资源价格高昂,农村学校无力承担。免费公共资源质量良莠不齐,筛选成本高。本土资源数字化能力匮乏,缺乏将独特

乡土资源(非遗、农技、地方史志)转化为高品质、互动性数字课程的专业人才与技术支持。

## 2. 重塑与发展路径

“料”的重塑关键是“两结合”,一是预设性优质资源与生成性动态资源的结合,二是规模化资源供给与个性化精准推送的结合。AI驱动个性化资源引擎,构建省/市级智能教育资源库,深度集成学生知识图谱、学习风格、兴趣偏好等画像数据,实现“靶向作业”与拓展资料的精准推送。发动“数字乡贤”定向支援,建立激励机制,鼓励高校(师范院校、职校)、教育科技企业、公益组织为特定县域/乡镇定向开发开源、免费、深度本地化的数字课程资源包(如《黄土高原水土保持VR探究课》《苗绣纹样数字化设计与3D打印》)。推行师生共创内容(P2C)模式,引导学生利用数字工具(短视频剪辑、图形化编程、3D建模)记录、探究、创作并展示学习成果。模式主体核心优势案例方向,AI精准推送“省级平台+智能算法”高效匹配学情,减轻教师筛选负担。基于学业数据的个性化习题推荐“数字乡贤”包,“高校/企业/机构+本地教育者”进行高度本地化、专业化、开源免费的《XX县特色农业VR实践课》《XX族民歌数字化传承》师生共创(P2C),使本地教师与学生激发主体性,成果高度贴合本土情境,动态更新学生制作乡土生物图鉴App、地方传统节日数字档案。

(四)“法”(Method):从标准化教学到规模化因材施教

数字文明赋予“法”的新内涵是实现教学、评价、治理范式的根本转变。数据驱动的精准教学、基于真实问题的跨学科项目式学习(PBL)、翻转课堂成为主流形态。突破单一的总结性评价,融合多维度过程性、发展性评价,利用大数据构建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动态数字画像与成长报告。基于全域教育数据的科学决策,优化师资调配、经费投入、风险预警,实现精细化、预见性管理。

## 1. 核心挑战

“法”是重塑农村教育的范式革命、流程再造与多元协同,其面临路径、伦理、隐私、评价等方面的困境。路径依赖惯性强大,教师对传统讲授法高度熟悉且依赖,转向新方法面临巨大惯性阻力,需持续赋能与激励。数据伦理与隐私风险凸显,学生全

流程学习数据的采集、存储、分析与应用边界模糊,存在滥用与泄露风险。评价改革内生动力不足,若中考、高考等高利害外部评价体系未发生根本性变革(如仍侧重纸笔测试分数),学校层面的教学法与评价法改革空间与动力显著受限。

## 2. 重塑与发展路径

“法”的重塑关键是“双轮驱动”,一是数据驱动的个性化教学新范式,二是过程性与发展性评价新体系。深化“数字支教”内涵,城市名师通过“双师课堂”不仅远程授课,更侧重于向乡村教师示范新型教学方法(如PBL设计、数据解读),并提供在线教研指导和教练式反馈。构建多维度学生数字画像,合法合规地整合学业成绩、课堂行为(参与度、互动频次)、作业质量、实践活动记录,甚至可穿戴设备采集的体能与心理状态数据(需严格伦理审查),形成全景式、发展性的学生评估报告,支撑个性化教育干预。实践“证据导向的持续改进”(ED-CI),鼓励教师利用课堂实时反馈工具(如弹幕、投票)、在线作业平台数据等“小颗粒度”证据,即时诊断学习障碍,快速调整教学策略,形成“教学—反馈—优化”的敏捷闭环。建立健全数据伦理治理框架,制定县域层面的教育数据管理办法,明确数据所有权归属(学生/家长)、使用权限范围(教师/管理者/研究者)、严格的隐私保护条款(如匿名化、脱敏处理)和安全保障措施,并通过培训提升全员数据伦理意识。

(五)“环”(Environment):从封闭校园到无边界智慧社区

数字文明赋予“环”的新内涵是构建物理、虚拟、文化、政策融合的育人场域。物理环境方面,校园升级为智能感知空间(自适应照明、温湿度调控、安防监控、能耗管理),提升舒适度、安全性与可持续性。虚拟环境方面,无缝接入全球优质教育资源的元宇宙学习空间(如虚拟名校课堂、国际科创社区),打破地域限制。文化政策环境方面,培育鼓励创新探索、宽容试错、崇尚终身学习的数字文化。建立确保公平性、普惠性、可持续性的长效政策与经费保障机制。

## 1. 核心挑战

“环”是重塑农村教育的空间融合、生态协同与价值共创,其面临两极分化、数字废墟、文化冲突等

困境。马太效应加剧分化,数字化应用能力强的学校迅速提升,而能力弱的学校差距被进一步拉大,可能导致新的教育不公。“数字废墟”隐患深重,依赖项目制投入,缺乏后续运维资金与本地能力,导致设备闲置、平台荒废,造成巨大浪费。数字文化与乡土文化冲突不可避免,数字技术的强势介入可能冲击地方性知识、方言、传统技艺的传承,引发文化认同危机。

## 2. 重塑与发展路径

“环”的重塑关键是“两贯通”,一是物理—虚拟空间的双向融通,二是学校—社区资源的开放协同。构建“县域教育大脑”,在县级层面建立集教育数据中心、资源调度中心、质量监测中心于一体的智能指挥平台,实现对全县学校运行状态(设备、网络、课堂、安全)、师资供需、学业质量的实时感知、智能分析与均衡干预。创新可持续运营模式,探索“政府规划监管、购买专业服务、企业运维保障、学校专注应用”(PPP模式变体)的机制。政府负责标准制定、购买基础服务;企业承担专业化运维、升级。学校按需使用,确保系统长效运行与技术迭代。数字赋能乡土文化传承创新,系统性利用数字技术记录、保存、传播地方方言、非遗技艺、农耕智慧(如建立方言语音库、非遗技艺VR教学系统)。鼓励师生运用数字工具进行乡土文化创新表达(如用图形化编程设计民族纹样动画、制作家乡历史微电影),使学校成为乡土文化数字化的策源地和传播中心。强化政策与长效投入保障,制定《农村教育数字化转型中长期专项规划》,明确各级财政投入责任与比例,设立常态化专项资金。政策重点向偏远薄弱地区和群体倾斜,刚性保障数字教育的底线公平和可持续性。

## 二、实施路径与未来展望:走向韧性、智慧、有根的乡村教育新生态

农村教育数字生态的重塑是一项复杂系统工程,需多维度协同推进。顶层设计与地方创生并重,国家层面加强指导框架、标准规范、伦理规则的建设,为地方实践提供清晰轨道。同时,充分授予县域自主权,鼓励基于本地实际(经济、文化、地理)探索“一县一策”“一校一品”的差异化发展模式,激发基层创新活力。基础设施先行与数字能力培育同步,坚决推进网络、算力等“硬基建”下沉到村校,

解决“有无”问题。同步甚至前置开展教师数字素养、管理者数据决策能力、本地资源开发队伍的培育,避免“有路无车”“有枪无弹”的资源闲置困局。

协同进化破解双重鸿沟。在努力弥合城乡、区域间“数字接入鸿沟”(Access Divide)的同时,必须投入更大资源,通过持续赋能、文化建设、机制创新来攻克更深层次的“数字使用鸿沟”和“数字创新鸿沟”。其核心在于促进“人”(师生、管理者、家长)的数字素养、思维模式与创新能力实现群体性进化。

深化评价改革牵引系统变革。以教育评价体系改革为“牛鼻子”和突破口。推动中高考改革,增加过程评价、实践能力、创新素养的权重。鼓励县域和学校基于数字技术积极探索综合素质评价的有效模式(如基于数字画像的多维度评价),以评价改革倒逼教学方法(“法”)的深度转型,带动整个生态的良性循环。

在数字文明的深度赋能下,未来的农村教育生态有望彻底摆脱“薄弱”与“滞后”的固有标签,展现出独特的韧性与活力。山村学子可借VR设备“亲临”卢浮宫感受艺术瑰宝,亦能利用部署在田间地头的传感器,在“数字农场”项目中开展真实的数据分析与科学探究。

乡村教师不仅是知识的传递者,更成长为运用数字工具活化乡土文化、连接外部世界的“数字文化使者”。

乡村学校将超越传统校园的物理围墙,嬗变为集学习中心、文化传承基地、数字技能培训站、社区智慧枢纽于一体的乡村社会新地标,成为连接城乡、融合古今、汇聚资源的活力节点。这不仅是教育形态的重塑,更是通过教育这一核心支点,对乡村社会结构、文化传承与发展动能进行的一次深层次、系统性的激活与再造。数字文明之光,将照亮中国乡村教育振兴与乡村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新里程。

## 参考文献:

- [1]张季平.数字时代农村教育数字化转型:价值意蕴、面临困境与路径选择[J].农业经济,2024(9):120-121.
- [2]刘善槐,毋懿懿.大力发展农村教育托底教育强国建设[J].中国电化教育,2025(2):1-6.
- [3]俞树煜,王雯嘉,胡梦颖,等.农村小规模学校教育信息化发展的成效、阻碍和对策[J].现代教育技术,2025,35(6):115-124.

[4] 穆航,刘善槐. 数字技术赋能农村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逻辑向度与实践路向[J]. 教育与职业, 2025(10): 31-38.

[5] 张靖,李永杰,李树华,等. 人口新形势下教育数字化何以赋能县域“教育洼地”[J]. 中国教育信息化, 2025, 31(6):109-120.

[6] 赵书琪. 教育强国背景下农村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内在逻辑、共生机制与行动框架[J]. 教育与职业, 2024(24):22-30.

[7] 吴遵民,熊振,杨瑜,等. 教育强国的必由之路:数字教育促进学习型大国建设的路径与机制研究[J]. 远程教育杂志, 2024, 42(1):15-23.

## Research on the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Rural Education Ecolo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gital Civilization

AI Gui-cheng

(Sichuan Sanhe College of Professionals, Luzhou Sichuan 646200,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digital civilization,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systematic reshaping and development of the rural education ecosystem. It introduces the “Man-Machine-Material-Method-Environment” analytical framework to systematically deconstruct the implications, core challenges, and implementation pathways of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rural education. By leveraging digitalization as a fundamental driving force, the research aims to promote ecological iteration across all elements and the entire chain of rural education, advancing it toward a new form that is open, balanced, intelligent, resilient, and rich in local characteristics. Emphasis is placed on combining top-level design with grassroots innovation, synchronizing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with digital literacy enhancement, and addressing the dual divide of access and competence. Through evaluation reform to guide systemic change, the study seeks to facilitat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education in the digital era.

**Key words:** digital civilization; rural education ecology; ecological reconstruction; Man-Machine-Material-Method-Environment;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education

# “夏陶然道路”的推广及其对教育作风建设的启示

王祥龙<sup>1</sup>,雷银鹏<sup>2</sup>

(1.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河南郑州 450001;

2. 郑州商贸旅游职业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郑州 450042)

**[摘要]**抗战时期,中共领导的根据地教育面临着向新民主主义教育转型的诸多困境。夏陶然在泗南县峰山区中潼小学的教育实践适应战争与农村的可能与条件,开创了一条将教育与生产劳动紧密结合的新路径,成为淮北抗日根据地教育创新的典范。“夏陶然的路”对根据地的教育事业产生了广泛影响,更与中国共产党在同一时期开展的整风运动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呈现出双向互动的关系。夏陶然的教育创新实践所体现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与自我批评等精神,也为教育作风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启示。

**[关键词]**夏陶然的道路;教育创新;整风运动;淮北抗日根据地;教育作风;中国共产党

**[作者简介]**王祥龙(2000—),男,山东费县人,郑州大学历史学院中国近现代史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共党史、抗日战争史。雷银鹏(1996—),女,河南新密人,郑州商贸旅游职业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助教,历史学硕士,研究方向:红色文化、思想政治教育。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大别山区革命歌谣文献资料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22CDJ028)的阶段性成果。

**[DOI]** <https://doi.org/10.62662/kxwxz0210018>

**[中图分类号]** G529

**[本刊网址]** [www.oacj.net](http://www.oacj.net)

**[投稿邮箱]** [jkw1966@163.com](mailto:jkw1966@163.com)

1940年3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开展抗日民主地区的国民教育的指示》中指出:“开展抗日民主地区的国民教育是当前深入动员群众参加与坚持抗战培养革命知识分子与干部的重要环节,各地党的领导机关及其宣传部必须认真地把这一工作当作我们的中心任务之一。”在敌伪袭扰、物资匮乏、群众教育观念落后的多重困境中,淮北抗日根据地教育工作者探索出一条融合生产劳动与革命教育的独特路径,其中以夏陶然在泗南县峰山区中潼村小学的实践最具代表性。“夏陶然的路”不仅是教育方法的创新,更与整风精神高度契合,成为整风运动中反对主观主义、践行群众路线的鲜活样本。经整风运动的催化,这一模范样本在整个根据地得到推广,并为根据地的整风运动与教育作风建设提供经验与鉴戒。本文即通过梳理夏陶然的教育实践、其经验的推广过程及其与整风运动的互动关系,揭示淮北抗日根据地教育创新的历史逻辑与时代价值。

## 一、根据地的教育困境与夏陶然的教育实践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教育为抗日战争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但淮北抗日根据地的教育事业面临着诸多困境,泗南县峰山区中潼村小学便是问题的集中显现。1942年9月,原

为新四军第四师九旅二十五团侦察员的夏陶然因伤病在精兵简政中被派往该校担任校长。其坚持群众观点,了解群众的需要,善于把教学与社会、与家庭结合,真正把生产与上学的矛盾解决了,创造了一套鲜活的生产教学方法。

### (一) 淮北抗日根据地的教育困境

因日伪的突袭和扫荡,学校办学时断时续,教学环境恶劣,随时面临关停的风险,严重影响了正常教学秩序,这是根据地教育面临的首要问题。

其根本原因在于经济落后,产生了读书与家庭生产之间的冲突。在传统生产模式中,适龄儿童虽未成年,但已开始承担一定的生产与家庭事务,通过扩大劳动力来弥补家庭的经济不足,这使得入学率极低。夏陶然在总结中潼小学被办“滑了”(坏了之意)的主要原因时指出,“就是由于这个村庄太穷,学生念书与他们家庭生活之间的矛盾(困难)不能解决,所以常常是有先生,无学生,无生气”。另外,民众的传统观念阻滞了抗战教育的发展,其对政府开办学校、开展劳动教育的意义不了解,总不愿把自己的儿女送去上学。“他们以为政府要把学生抽去当勤务员,因此为了适应环境,学校教育某些地方不得不采取旧有形式”,另有一些人歧视劳

动,认为进学校目的是读圣贤书,将来“治人”,而劳动只能“治于人”,不是教育的正统。传统观念与现实矛盾的交织,使得尚未具备自主能力的儿童入学十分困难,亦阻遏了教育动员。夏陶然为动员家长同意学生边上学边农作,买了包纸烟把学生家长都请了来,说明了意思,他们还是不赞成,认为又上学又拔草是“驼子跌脚,两头不着实”,还不如请几天假。

同时,传统的教育模式也难以适应战争环境与根据地建设之需。抗战时期,根据地虽有部分私塾改办为学校,但仍存在阶级教育的弊病。以中潼村为例,赵家塾馆在改办学校后,所收的学生大都是有钱人家的孩子,校长的生活待遇是由政府按月供给口粮,束修免交了,但节礼仍按旧习照送,广大贫穷人家的孩子仍被排斥在学校门外,造成了教育的不公平。以往的一些校长和教员采用强制、粗暴的方式对待学生和家,村民控诉说:“某校长硬把我孩子抓到学校,说不去就抓人。没想到去了几天,就把小孩子打得眼睛都出血”“说起某校长,我们实在供不起,吃好面还不说,就是碱大了些,他闻一闻就不吃”。以上种种严重激化了学校与群众之间的矛盾,导致群众对学校 and 教师充满不信任。在教学内容上,传统教育过于注重书本知识的传授,脱离了农村的实际生产生活,使得教育对群众的吸引力不足。

此外,教育资源匮乏、校舍与师资极度短缺的客观条件也限制了根据地基层教育的发展。夏陶然想要整顿办“滑了”的学校,“比开荒还难”,必须对以上种种困境做出系统性回应。

## (二)夏陶然的教育创新实践

夏陶然虽然文化水平不高,又无师范和教育经历,但是他并未盲目照搬传统教育模式,而是从实际出发,“摸着石头过河”,探索适合战争环境和农村实际的教育新路。夏陶然的教育创新首先是从解决“代饭”问题开始的。因前任校长的作风问题,当地群众害怕代饭时要有酒有肉,为了解除群众顾虑,挽救基层教育工作者的形象,夏陶然表示“政府每月发给我的口粮和菜金,请村长代领代发给代饭户,代饭人家吃什么,我吃什么”。这样群众接受了夏陶然这个外来校长,也为其开展教育创新实践提供了条件。

### 1. 生产与教育的辩证统一

要解决读书与家庭生产的冲突,就必须让学生在学的时候也能为家庭带来实际收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夏陶然教育创新的核心内容。基于此,他将学校的学生按照家庭情况和个人意愿分成不同的小组,如放牛小组、割草小组、挖菜小

组、编筐小组等,让学生在学习之余从事生产劳动,农忙时学生上午参与家庭生产,中午返校学习,傍晚再集体进行田间劳动。“集体互助劳动+弹性学习”模式不仅解决了学生的入学问题,还提高了学生的劳动技能和家庭收入。“学生除了念书之外,生产方面,较比他们在家里干活时的成绩,还大得多。于是,在开学之后,曾被家长留在家里帮助干活的学生,又送来了;有些本来就未去上学的小孩子,看到这种情形,其家长也要求把他们的小孩子送到学校里,去跟夏老师念书。因此,学生的人数,就逐渐地多起来了。学校也活跃起来了。”为解决教学物资短缺,夏陶然带领学生开垦校园荒地种植蔬菜,既补充伙食,又将田间管理转化为“自然课”;组织编斗笠小组,销售所得充作办学经费,算术课则直接教授记账方法。这使学生在实践中学习,不仅提高了学习兴趣,还增强了知识的实用性。这种“生产即教育”的实践,使学校从“消耗型”变为“产出型”,一年内便实现经费自给。

### 2. 群众路线的教育实践

夏陶然坚持“教育与群众结合”的道路。在修缮漏雨校舍时,考虑到动用民伕会增加群众负担,决定带领学生自己动手修教室,但此时又出现了“劳动非教育正统”与“劳动减轻负担”两种办学观的矛盾,夏陶然最终选择带领学生,一天内完成修缮。针对前校长的官僚作风,他提出“三不原则”:不打骂学生、不强迫入学、不脱离群众生活。“教育与生产相结合”道路的产生是从农民最切身利益出发,深入群众中发现问题的产物。夏陶然到贫困家庭走访,调查儿童入学难的原因,观察儿童劳动的特点,“从‘带孩子小组’的孩子们喜欢结伴成群玩耍的特点,观察到拾柴、放牛的孩子同样有这个特点”,决定进行分“组”教学,使学生人数从8人增至87人,另有56名“流动生”参与校外学习,维护了教育公平。另外,他发动学生成为“教育中介”,通过儿童团动员校外儿童,让学生向家长宣传生产知识,利用上学放学时段组织街头宣传。再者,夏陶然依靠群众的教育方法表现在他对家长和社区资源的充分利用上。他积极与家长沟通,邀请有经验的农民到学校分享生产经验;组织学生参与社区教育活动,利用最接近民众的组织形式推广社会教育,如夜校、冬学等形式,使得小学教育成为社会教育、家庭教育的重要支点。这种做法不仅丰富了教育资源,还增强了教育的实用性和针对性。

### 3. 教育管理的民主化探索

在管理上,夏陶然打破传统师道尊严,推行“学生自治”。首先,各类生产小组由学生选举生产管理委员会,负责劳动成果分配,“钱、材料、编成的斗

笠,都存在学生家里,每天总结一次,学生自己记帐,学的算术也用上了”。其次,个别学生在学习与生产中不积极或好吵架的,夏陶然动员学生群众去批评他,劝告他,由集体评议“记调皮账”,而非体罚。再者,推行“小先生”制,动员校内年龄大的四年级学生做助手,辅导低年级的学生,并且参与到识字班、夜校等群众教育的办学,这种模式不仅缓解师资不足,更培养了儿童的民主意识。另外,学生参与社区性活动,如组织儿童团站岗、查路条等,当两名便衣战士拒绝出示路条时,学生敢于上前盘查,称“夏校长也是当兵的,规矩不能破”,展现出教育对公民意识与革命担当的塑造与强化。

早在夏陶然道路之前,中共中央和根据地党委、行政公署已经明确要求根据地的国民教育要“提高和改进教育内容,使其既适合战时又适合农村”,但是如何落实却成了难题,夏陶然的教育创新恰好为政策、方针的落地提供了实践样本,其教育实践“首先适应了村子里的条件与可能,又转而超出了那旧的藩篱,提高其原来水平”。

## 二、整风运动的催化与“夏陶然道路”的推广

夏陶然的教育实践在中潼小学取得了成功,1943年夏季,淮北区党委、行政公署开始推广夏陶然的教育方法,但是未能将夏陶然的教育实践从朴素的经验提升至理论的道路,直至时任中共淮北区党委副书记的刘子久在《关于学习问题给淮北区党委的信》中对此经验进行理论分析,经整风运动的催化,“夏陶然的道路”得以生成,成为在农村艰苦地区办学的范本。

### (一)夏陶然教学法在淮北抗日根据地的推广

夏陶然的教育方法提高了入学率,巩固了学校,为贫雇农子女入学创造了有利条件,这引起了上级重视。1943年春末夏初,泗南县举办的小学教育研讨会肯定并宣传了夏陶然同志使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经验。同年六、七月间,泗南县政府连发三次训令,要求各级教育工作职责认真结合《解放日报》社论的精神,学习夏陶然的经验,并把它传达给全体师生。以一个月的时间,以整风的精神,对照夏陶然的作风和经验,检查自己的工作。

夏陶然教育的成功也逐渐引起淮北区党委的重视,1943年7月8日,中共淮北区在《关于加强领导国民教育工作的指示》中要求:“在小教中发现的夏陶然同志,地委、县委还须派人实地去考查,确实了解其真实情况,帮助其解决各种困难问题,用通信撰论发起访问等等办法加以鼓励与介绍,以推动别的学校与教员,使之成为热烈的运动。”

8月,夏陶然参加前窑暑期小学教师训练班并做经验分享。淮北行署教育处副处长潘棋在报告

中强调:根据地的教育应以抗战为中心,为战争服务,为工农和根据地建设服务。并指出必须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办教育。夏陶然是新民主主义教育路线的忠实践行者。潘棋等人以《夏陶然的路》为题在《拂晓报》写了一篇社论以扩大宣传,但是,当这篇社论送到区党委审查时,有的同志就认为这是有关我们教育方针的大事,中央及华中局都没有这样的指示,这样提出问题并不妥当,因而这篇文章,就未用原题原文与社论的形式发表。因之,夏陶然的那套办学方法当时也就未被我们采用与发扬。

虽然,“夏陶然教学法”此时仍是个体经验,未在全根据地得到推广,但淮北行署主任刘瑞龙通过深入调查研究后给予充分肯定,其在12月25日《淮北政权的一年》的报告中指出:小学教育最大的成就,是夏陶然同志实验的成功。他过去没有做过教育工作,但在他主持的中潼小学,创造出一套新的教学方法:师生结合,学用结合,学校与社会结合,教育与劳动结合。这一套新民主主义的教育原则,都在他的学校里试验,并得到成效,获得新的经验,这是今后淮北小学教育以至中学教育都应引为模范的。刘瑞龙对夏陶然的教育经验进行了总结,提出“四个结合”的教育方法,正是对夏陶然经验的政策化,并在1944年春召开的淮北第7次边区教育行政会作了学习“夏陶然教学法”的安排部署。

### (二)刘子久的信与整风运动的赋能

1944年7月,刘子久阅读了一些根据地的教育文件,发现其与夏陶然所作者,竟不谋而合。这证明了夏陶然所走的路,正是我们的教育方面应该走的一条正确道路。结合工作实际与整风学习的体会,刘子久从“走夏陶然的路”说起,给中共淮北区委写了总结信。这封信受到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重视,先后通过新华通讯社和《解放日报》予以宣介,进一步推动了学习推广“夏陶然道路”的深入开展。

刘子久的信一经公开出版、发表、广播后,对淮北抗日根据地产生了重大影响。淮北区党委及时组织边区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学习刘子久的信,联系当地实际,提高思想认识,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根据地教育领域随即开展“对照夏陶然查作风”活动,批判教育中的官僚主义、教条主义,推动各校采用分组教学、流动课堂等灵活形式。1944年暑期教师研究班的主要内容是学习夏陶然的办学精神,这也是整风学习内容之一。

同时,淮北行署教育处成立教育实验组,由夏陶然指导推广其经验,大部分基层中小学都参照夏陶然的经验结合实际、结合生产,试行小先生,试办

校外班。至9月的统计数据显示,一个月来已经把全县总人口1/6的群众,组织到学习战线上来,若以8岁至45岁中的儿童和成年计算,则受教育人数已达1/4,若于乡村已达60%以上,这在现在的淮北来说,是难能可贵的,学校形式和教育内容也更加适合于农村分散环境和农村生活的特点,例如,泗南县推行“牧场教育”,将放牛儿童编为学习小组,由女生教识字,实现“放牧不忘读书”;萧县三区学生通过种地、拾粪创收7万余元,既解决经费又救济贫生。这些实践验证了刘子久的判断,“夏陶然道路”是“教育领域的吴满有方向”,即群众自主创造的先进典型。1945年11月21日,中共中央通过新华社广播高度赞扬夏陶然,称其是“淮北教育界英雄”。

### 三、教育创新与整风运动的双向塑造

“夏陶然的道路”的形成与推广本质上是整风运动在教育领域的实践深化,而教育创新的成效,又反过来印证了整风的必要性与正确性,并扩大了参与整风的群体,实践经验亦成为重要的整风材料。这种双向互动,推动淮北根据地教育从“恢复重建”走向“道路创新”。

#### (一)整风运动对教育观念的改造

整风运动前,淮北教育存在两大顽疾:一是教条主义,照搬国统区学制与传统教育模式,脱离农村实际;二是官僚主义,教员“坐堂授课”,对群众需求漠不关心,甚至出现作风腐化的弊病。夏陶然坚持问题导向,通过调查研究,发现学生失学原因,找到教育与生产相结合的方法,坚持群众需要即教育方向。“夏陶然的道路”中蕴含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精神实质与整风运动的核心精神高度契合,但是这种经验未在根据地广泛传播开来,原因在于大多数教育干部没有经过整风,旧教育的传统思想还相当根深蒂固地存在着。刘子久的信不仅推动了淮北区党政机关的整风运动,更在教育领域开展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整风学习,淮北行署组织全体教师学习中共中央发布的“整风二十二个文件”以及《解放日报》关于教育的社论,教导小学教员运用整风的方法,结合实际、提高思想,进一步改进各项工作。“夏陶然的道路”得以在整风学习中得到更大规模的推广,结合前面的相关学习,夏陶然的教育经验已经提升至理论与精神的高度,以此推动了根据地教育观念的改塑。

#### (二)创造群众路线的整风样本

“夏陶然的道路”自中潼村小生成,后被推广至泗南县,刘子久的信将其塑造成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践行群众路线的典型性整风学习案例,毛泽东批示将此信公开发表,使其成为全党的整风学习材料。这种从地方经验到普遍推广的过程,体现

了整风运动中重视典型示范、推广成功经验的工作方法。

群众路线是整风运动的基本运行准则,也成为运动思想教育的核心内容,夏陶然“从群众创造中发现真理”的实践为整风运动提供了践行群众路线的鲜活样本。对整风运动的理解相对突出其统一思想、路线斗争的一面,但另一方面,整风的目标亦在于检讨干部习焉不察的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夏陶然道路”的成型与推广可反映出各级领导干部存在的某些弊病以及整风学习带给他们的冲击与启示。上文提到,《走夏陶然的路》这篇社论未能通过淮北区党委的审查,领导机关无法将这一宝贵经验广为推广,因而没有一个广泛的群众教育改革运动。对此争论,刘子久认为:以今天整风的眼光看来,则非同小可,这是群众创造天才的体现,并反省道:这反映了我们在思想方法与领导方法上的保守性,缺乏辩证唯物论的革命性和创造性,反映了我们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不够,反映了我们不大相信群众的创造能力,反映了我们的眼睛向上,不肯向下,不肯向群众学习,反映了我们不大懂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思想方法与领导方法的问题。

因部分地区和部门的整风运动尚未深入,脱离群众、官僚主义的风气仍然存在,需要领导干部认真关心群众利益,认真发扬党内外的民主,认真向广大群众中与各个阶层中的模范人物学习,将这些模范人物的事迹当作推动全盘工作的范例。想要普及这种作风,领导机关的任务是了解这种“小事”的伟大意义,而加以发扬光大,使之条理化,系统化,把它由不自觉的阶段,提高到一种自觉的阶段。夏陶然的案例并不是孤立存在,这种群众中的天才、圣人、状元、领袖、诸葛亮还有很多,应善于发现他们,使他们成为坚持群众路线工作方式的枢纽。

#### 结语:“夏陶然道路”对教育作风建设的启示

“夏陶然的道路”打破了传统教育的束缚,开创了一种适应战争环境和农村实际的教育新模式,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为中国共产党的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其中蕴含的教育理念和实践经验为新时代应当如何“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提供了深刻镜鉴。

群众路线是教育创新的根本遵循。夏陶然的成功在于他“不是教育群众,而是向群众学习教育”。当前教育改革需警惕“精英化”“脱离实际”倾向,应像根据地那样,将“群众是否满意”作为衡量标准,鼓励基层探索贴合本地需求的办学模式。劳动教育是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夏陶然将生产劳

动转化为“活教材”,印证了“劳育”的育人价值。新时代“五育融合”应继承这一传统,劳动教育的首要目标即是通过劳动教育改变旧社会鄙视劳动和劳动者的观念,养成尊重劳动自力更生的意识,从而激发学生及群众抗战的决心和信心,而不单单是为了生产而开展劳动教育,要避免劳动教育形式化。作风建设是教育发展的保障。整风运动清除了教育领域的官僚主义,为创新扫清障碍。当前需持续整治教育中的形式主义,让教育工作者回归“教书育人”初心,正如夏陶然那样,“用真心换民心,用实干兴教育”。

### 参考文献:

- [1]安徽省宿县地区教育史志编辑室. 淮北解放区教育史资料选编(第1辑)[M]. 内部资料,出版年份未知.
- [2]陈元晖. 老解放区教育简史[M].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
- [3]介绍夏陶然的道路[J]. 时代青年,1947(4):11-12.
- [4]刘子久. 夏陶然的道路[M]. 沈阳:东北书店,1947.
- [5]本书编写组. 豫皖苏边区文艺史料选编[M]. 出版信息不详.
- [6]中共泗洪县委党史工作委员会. 泗洪党史资料(第六辑)[M]. 内部资料,1986.
- [7]王铁. 怎样进行劳动教育[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5.
- [8]董纯才. 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史(第2卷)[M].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1.
- [9]豫皖苏鲁边区党史办公室,安徽省档案馆. 淮北抗日根据地史料选辑(第7辑)[M]. 内部资料,1985.
- [10]史文敏. 邓子恢在淮北[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
- [11]刘瑞龙. 淮北汽集(上)[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
- [12]中国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 华中抗日根据地建设研究——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60华诞[M]. 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10.
- [13]中共徐州市委党史办公室. 徐州党史资料(第8辑)[M]. 内部资料,1985.
- [14]淮北教育界英雄夏陶然(1945年11月22日)[N]. 解放日报,1945-11-30(4).
- [15]安徽省宿县地区教育史志编辑室. 淮北解放区教育简史[M]. 内部资料,出版年份未知.
- [16]赵诺. 抗战胜利前后太行根据地减租减息的运筹与突破[J]. 抗日战争研究,2023(1):52-71.
- [17]罗岗,孙晓忠. 重返“人民文艺”[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 [18]延安中央党校整风运动编写组. 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二)[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 [19]郭红霞. 开在枯寂荒芜的土地上的劳动教育之花——淮北苏皖边区的劳动教育研究[J]. 邯郸学院学报,2018(3):90-92.

## The Promotion of the “Xia Taoran’s Path”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Educational Style Construction

WANG Xiang-long<sup>1</sup>, LEI Yin-peng<sup>2</sup>

(1. School of History,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Henan 450001;

2. School of Marxism, Zhengzhou Vocational College of Commerce & Tourism, Zhengzhou Henan 450042,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education in the Communist-led base areas faced numerous challenges in transitioning to New Democratic education. Xia Taoran’s educational practices at Zhongtong Primary School in Fengshan District, Sainan County, adapted to the possibilities and conditions of war and rural life. He pioneered a new path that closely integrated education with productive labor, becoming a model of educational innovation in the Huaibei Anti-Japanese Base Area. “Xia Taoran’s Approach” exerted a far-reaching influence on the educational endeavors within the base areas. Moreover, it exhibited a profound, intrinsic connection with the Rectification Movement launch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during the same period, revealing a bidirectional,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The spirit embodied in Xia Taoran’s educational innovations—including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adhering to the mass line, and practicing criticism and self-criticism—also provided invaluable insight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al conduct.

**Key words:** Xia Taoran’s Path; educational innovation; rectification campaign; Huaibei Anti-Japanese Base Area; educational style construction; the CPC

# 黄炎培职业教育视域下农村劳动力培养新模式探索

王 月

(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铁道通信信号与电气化学院,湖北武汉 430205)

**[摘 要]**黄炎培最早在中国提出职业教育,并且创造性地在农村职业教育方面取得丰富成果,结合新时代农村的特点研究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认真总结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通过农村劳动力相关数据分析,结合中国农村劳动力现状,探讨融合新时代特点的黄炎培农村职业教育新思想。同时以黄炎培农村职业教育新思想为指导,根据现阶段中国农村劳动力现状和农村劳动力培养模式现状,探索融合新时代中国现代化特点的农村劳动力培养新思路、新方法,提炼并探索农村劳动力培养的创新点,切实提高农村劳动力职业教育化水平,解决中国面临的农村劳动力剩余和技能缺失的问题,最后提出对农村劳动力未来发展的新期望。

**[关键词]**黄炎培;职业教育;农村劳动力;培养新模式

**[作者简介]**王月(1985—),女,吉林四平人,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铁道通信信号与电气化学院高级实验师,工学学士,研究方向:教育管理、计算机技术和通信技术。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华职业教育社一般规划课题“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视域下中国农村职业教育新模式探索”(项目编号:ZJS2024YB244)的研究成果。

**[DOI]** <https://doi.org/10.62662/kxwxz0210019>

**[中图分类号]** G712

**[本刊网址]** [www.oacj.net](http://www.oacj.net)

**[投稿邮箱]** [jkw1966@163.com](mailto:jkw1966@163.com)

黄炎培作为中国职业教育的奠基人,他创造性地对中国职业教育进行了详细划分,专业从手工业到农业,实践场地从工厂到田间,为职业教育的基础建设提供了基本框架和思路。由于当时农业生产在整个国家生产中占主导作用,黄炎培对农村劳动力的培养也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当前,随着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农村农业和劳动力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那么在新的形势下我们如何培养好农村劳动力,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思想,尤其是黄炎培的“大职业教育观”带给我们很多的提示。

## 一、农村劳动力现状

农村劳动力在农业生产和城市建设和工业生产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关注并合理利用农村劳动力有利于解决现阶段我国存在的贫富差距、社会稳定及工农业发展问题,下面我们从农村劳动力数量、质量等方面进行分析,详细介绍中国现阶段农村劳动力的现状。

### (一)劳动力数量与结构

全国农村劳动力总数: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2024

年的数据,全国农村劳动力总数达 6.45 亿,占全国劳动力总数的 58.1%,是中国劳动力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劳动力按照年龄可以分为青年、中年和老年,每个年龄段的农村劳动力都有自己专有的特点。

### (二)教育程度

农村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较低,普遍为初中及以下水平。根据数据,大学本科以上学历者仅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 3.2%,大专及以下学历者占绝大多数。教育程度直接影响职业教育的理解能力和学习能力。

### (三)技能水平

青年劳动力不屑于农村工作与生活,有强烈意愿进入城市工作与学习,但是自身也没有一定的专业技能。中年劳动力农业生产技能水平偏低,因为要兼顾照顾家庭,所以在农业生产和城市务工之间来回循环。老年劳动力农业生产经历受限于传统的农业生产活动,缺乏现代农业生产技能,不懂得精准技术农业生产。

#### (四)劳动力流动与就业

近年来,由于城乡发展差距和就业机会的不平衡,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已经流向了城市,尤其是农村青年劳动力群体。许多农村劳动力缺乏发展机会,相应的就业形式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他们往往从事一些体力劳动或低技能的工作,收入水平相对较低。

#### (五)教育资源与培训

农村地区的教育资源相对匮乏,学校设施、教师配备等条件相对落后,这影响了农村劳动力的教育水平和技能提升。尽管政府和社会各界在推动农村劳动力培训方面做出了一些努力,但受传统思想影响,农业经验生产仍然占较大的比例,农村劳动力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机会仍然有限。

总的来说,当前农村劳动力现状表现为数量庞大但教育水平普遍较低、技能水平不高、劳动力流动频繁且就业形式受限等特点。为了改善这一现状,需要政府和社会各界共同努力,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和支持,提高农村劳动力的教育水平和技能水平,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和乡村振兴。

### 二、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观点

20世纪初,以黄炎培为首的中华职教社最早提出职业教育思想,打开了职业教育的大门。黄炎培到各地考察,系统总结,结合当时中国实际,系统地阐述了职业教育的基本思想,因为近代农业的发展才是当时社会经济的主流,其中关于农村职业教育的实践与思想取得了丰硕成果。虽然社会在变化,职业教育也在不断发展,但是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仍然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首先,黄炎培详细地阐述了职业教育的作用,职业教育的作用大到服务社会,小至解决个人生计。具体来说可以归纳为几个方面,谋个性之发展:强调职业教育在促进个人成长和个性发展方面的作用;为个人谋生之准备:职业教育为个体提供谋生技能,帮助个人获得经济独立;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通过培养职业技能,使个人能够为社会做出贡献;为国家及世界增进生产力之准备:职业教育有助于提升国家整体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水平。

其次,黄炎培认为职业教育在整个教育系统中举足轻重。第一,职业教育应该是连续的:职业教育应建立起从初级到高级的完整系统,并贯穿于整

个教育过程和职业生涯。第二,职业教育应该是整个的:职业教育不仅应在教育体系中占据独立地位,还应与其他各类教育相互沟通、衔接。第三,职业教育应该是正统的:应打破传统观念,将职业教育视为与普通教育同等重要的“正统”教育形式。这些思想现在仍然值得我们去深思。

最后,黄炎培也提出了职业教育的教育方式,他认为职业教育应该以教育为方法,以职业为目的,培养适合社会合作需要的各行业人才。同时学校的专业、程度、年限、课时、教学安排等需根据社会需要和学员志愿与实际条件确定。另外充分依靠教育界、职业界的各种力量,实现校企合作、产学研结合。最后要强调用科学的方法解决职业教育中的问题,注重实证研究和数据分析。职业教育教学注重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结合,培养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同时将理论知识与实践操作相结合,实现知行合一。在教学过程中同时也要注意理论知识的传授和实践技能的培养。在传授知识的同时,更要注重技能的训练和掌握。

### 三、融合新时代特点的黄炎培农村职业教育思想

新时代背景下,农村劳动力及农业生产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农业的机械化、集中化程度越来越高,导致农村剩余劳动力越来越多,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和农村之间的流动相对较大。结合新时代社会背景和黄炎培农村职业教育思想,新时代特点的黄炎培农村职业教育思想可以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 (一)注重因地制宜

黄炎培农村职业思想中的划区施教,实际上就是因地制宜。不以学校为中心,以区域为中心,更能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 and 人才发展的需求。在新时代背景下,这进一步要求职业教育紧密结合农业现代化的需求和区域经济发展特色,如智慧农业、生态农业等领域的发展。不同地区的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文化特色等存在差异,农村职业教育应充分考虑这些差异,制定符合当地实际的农村劳动力培养方案。例如沿海城市重点培养渔业生产,平原地区重点培养粮食种植,山区主要建议发展经济作物,用好当地的优势资源,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农业生产的优势互补。

#### (二)注重实践与创新

黄炎培农村职业思想中的先富后教、综合改

进,在现在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它实际上是告诉我们要注重实践,不能空谈,只有能真正实施的教育方式才是好的,只有实践了,我们才能在社会的各方面进行综合改进。新时代背景下,农村劳动力培养应更加注重实践教学,通过实习实训、校企合作等方式,提升农村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和动手能力,让劳动力有技能、有工作、有收入,这样才方便后续的进一步提升。随着农业现代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农村职业教育也需要注重培养劳动力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和技术进步。除了农产品的种植生产,我们还要培养农村劳动力销售、包装、经营的能力,鼓励中青年劳动力在家乡创业,开办农村经济经营公司,盘活农村经济,解决农产品销售难题,避开中间销售环节,采用直营模式,提高农民收入。

### (三)融入现代化教育思想

黄炎培思想中的“大职业教育观”,告诉我们职业教育不能独立发展,它要与社会的方方面面联系起来。政府部门、职业院校、劳动力、企业、教师等都是职业教育的组成部分,都影响着职业教育的发展。

新时代农村职业教育应树立终身教育的理念,为农村劳动力提供持续的职业技能培训和教育支持。鼓励和支持农村青年创业创新,培养具有创业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农村劳动者。

针对涌入城市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我们要淡化农民工概念,在衣食住行、上学养老等方面为农村进城工作的剩余劳动力提供帮助,增加他们的社会归属感和幸福感。鼓励一部分农村青年劳动力逐步扎根城市,为中国城镇化建设提供人才支持。同时落实以职业院校为主体、企业参与、教育部门支持的各类公益技能培训班建设,采用线上线下多种教学模式,有针对性地对进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进行专业化培养,颁发培训结业证书,通过考核的授予技能等级证书,由对口企业安排合适岗位,教育部门做好跟踪回访。

针对留守农村的农业生产劳动力,我们要在其农业生产等技能上给予支持,可以采取送课到农村的办法,把职业教育课堂开到农民的家里,实践在田间地头,不但要有种植培养,还要有农村机械维修、农村机械设备操作等的培训。当然要实现上述目标,这就需要有经验丰富、知识先进的专业

教师,教育部门要专门为农村劳动力培养具备现代农业知识和技能的专业化教师,提高农村职业教育的教学质量和水平。定期为农村职业教育教师提供培训和学习机会,帮助他们更新知识、提升技能,配套地提高这部分教师的待遇和职称,提高他们的积极性。

融合新时代特点的黄炎培农村职业教育思想强调了因地制宜、注重实践与创新、融入现代化教育理念、加强师资力量建设。这些思想对于推动新时代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 四、黄炎培职业教育视域下农村劳动力培养新思路

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农村劳动力培养是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有效方法,在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视域下,结合中国农村劳动力实际情况,我们总结了农村劳动力培养的几个思路。

### (一)差异化的培养策略

深入了解各地区的农村经济结构、产业发展方向及劳动力需求特点,制定符合当地实际的农村劳动力培养方案。针对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层次的农村劳动力,设计差异化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确保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例如,对于愿意在农村发展的有志青年,重点培养其农业生产及营销方面的基本技能,对于主要靠在城市从事工业、服务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重点培养其专业技能和本领。

### (二)多样化的技能培训方式

教无定法,教无定形。针对农村劳动力不同的情况,我们可以采取多种多样的技能培训形式。从组织形式上可以分为两类,校内培训和校外培训。

校内培训即脱产培训,这个方式主要面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相关职业院校增设专门的实训室服务农村劳动力,让他们在学校进行集中化学习,同时学习时加大实习实训的比重,确保农村劳动力能够熟练掌握相关职业技能。根据行业发展趋势和市场需求,不断更新和优化课程内容,引入新技术、新工艺和新方法,提升劳动力的技能水平。脱产培训也可以校企合作完成,学校出师资力量,企业出实践场地,这样培训完就能上岗,技能与岗位无缝衔接,达到一举两得。

校外培训以现场指导式培训为主,也可以是短

时间的集中授课。这种方式主要用来培养农村农业生产劳动力,结合农业生产的实践性特点,采用现场指导式培训能节省时间、增强效果,第一时间解决生产中遇到的问题。

### (三)全面发展的职业教育理念

工业在进步,农业也在不断地发展,所以我们要树立终身教育的理念,为农村劳动力提供持续的职业技能培训和教育支持,例如新的种植方法、新的品种,帮助他们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和技术进步。同时还要注意农村劳动力的全面发展,除了职业技能培训外,还应关注培养农村劳动力的职业素养和综合素质,如沟通能力、团队协作能力等。关注农村劳动力的心理健康和人文关怀,为他们提供必要的心理支持和帮助。

### (四)多方参与的合作机制

农村劳动力的培养需要社会各方的积极参与,农业企业、科研机构等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共同建立职业教育实训基地和产学研合作平台。通过校企合作,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课程设置和教学计划,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为农村劳动力提供更多的实践机会和就业渠道,让农村劳动力培训完就能参与生产,培训完就能就业。政府要给予政策支持,提高企业、科研机构、职业院校参与的积极性。

根据农村劳动力的特点,企业设置灵活的用工机制,让农村劳动力在企业工作和农业生产中得到合理安排,根据农村劳动力特点,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有岗位,回村从事农业生产有指导。

### (五)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提升教育质量

充分利用好新时代中国网络发达的特点,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进行授课。现代信息技术可以解决农村劳动力培养分散和时间空间的问题,借助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开展在线教育和远程教学,可为农村劳动力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学习途径。建立数字化教学资源库和在线学习平台,为农村劳动力提供丰富多样的学习材料和学习工具,让农村劳动力在家就能用手机、平板随时接受培训,随时查阅资料,随时连线专家,随时解决生产中的实际问题,让职业教育触手可及。

### (六)强化政策支持和资金保障

专项资金加大对农村职业教育的投入和支持力度,提高农村劳动力的培养质量和效益。制定相

关政策措施,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参与农村职业教育事业,形成多元化的办学格局,让利益相关方都能参与到当中。

## 五、农村劳动力未来发展期望

规范农村劳动力培养制度,创新农村劳动力培养新模式,农村劳动力资源会得到合理配置,农村劳动力将充分发挥其在农业生产和工业制造中的作用,对社会的经济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 (一)职业技能与素质提升

持续深化劳动力农业领域的专业技能,包括现代农业技术、种植养殖技术等,以适应农业现代化和产业发展的需求。除了专业技能外,农村劳动力还应注重提升自身的综合素质,如沟通能力、团队协作能力、创新能力等,这样更能适应市场变化和职业发展需求。

### (二)就业与创业机会拓展

农村劳动力应积极探索多元化的就业渠道,包括农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农业企业等,实现就地就近就业。鼓励和支持农村青年返乡创业,利用所学知识和技能,结合当地资源优势,发展特色产业和现代农业,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力。

### (三)教育与培训体系完善

加强农村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提供多元化的职业技能培训课程,满足农村劳动力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学习需求。树立终身教育理念,为农村劳动力提供持续的教育和培训支持,帮助他们不断更新知识、提升技能,适应社会发展变化,使教育与培训体系进一步完善。

### (四)社会保障与福利改善

加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提高农村劳动力的养老、医疗、失业等保障水平,为他们提供稳定的生活保障。通过政策扶持和资金投入,提高农村劳动力的工资水平、福利待遇和劳动条件,增强他们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 (五)农村环境与文化振兴

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打造美丽宜居的乡村环境,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生活品质。重视乡村文化传承与发展,保护和挖掘乡村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农村劳动力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农村劳动力的培养需要职业院校、企业、政府部门三方合力,充分地利用好农村的劳动力资源,

变压力为动力,让农村劳动力在农业生产中起关键作用,在工业生产和服务经济中起主要作用,让农村劳动力在社会的各个方面发光发热,为家庭创造更多的财富,为国家创造更多的价值,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 参考文献:

- [1]赵巍,姜波,王彦平.黄炎培职业教育评价观的内涵、当代价值及启示[J].教育与职业,2023(24):106-111.
- [2]姚丽娟,闫秀婧,汪浩然,等.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民职业教育发展研究——以天水区域为例[J].农村实用技术,2023(12):74-76.
- [3]秦雅因.黄炎培劳动教育思想的科学内涵和现实意义[J].辽宁高职学报,2023,25(11):86-89,112.
- [4]杨文杰,高境翼.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劳动力就业现

状及路径探析[J].农业经济,2024(10):98-100.

[5]孙玉雪,林静.乡村振兴视角下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对农业现代化的影响[J].安徽农业科学,2024,52(21):237-240.

[6]曹丽娟.农村人力资源开发促进形成农业新质生产力研究[J].农村经济与科技,2024,35(18):12-14,51.

[7]陈叶玲,肖昊.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劳动力培训优化对策研究[J].安徽农业科学,2022,50(17):269-270,273.

[8]张庆,刘彦超.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存在问题及对策分析[J].人才资源开发,2019(23):37-38.

[9]陆秋.高职院校参与农村劳动力培训的定位和策略研究——以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为例[D].南京:南京农业大学,2021.

[10]何晓.国外农村劳动力培培训的经验借鉴[J].农村·农业·农民(B版),2018(20):53-54.

### Exploring a New Model for Cultivating Rural Labo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ang Yanpei's Vocational Education

WANG Yue

(School of Rail Communication & Signals and Electrification, Wuhan Railway Vocational College of Technology,  
Wuhan Hubei 430205, China)

**Abstract:** Huang Yanpei is the first to propose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China and has achieved fruitful results creatively in rural vocational education. Studying Huang Yanpei's vocational education thought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ew era rural area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his paper carefully summarizes Huang Yanpei's vocational education thought, analyzes relevant data on rural labor, and examines Huang Yanpei's new ideas for rural vocational education integrated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ew era, in light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hina's rural labor. Simultaneously, guided by Huang Yanpei's new ideas on rural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based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hina's rural labor and its training models, it explores new approaches and methods for cultivating rural labor that integrat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in the new era. It aims to refine and explore innovative points in rural labor training, effectively enhance the vocational education level of rural labor, and solve the problems of surplus rural labor and skills shortage faced by China. Finally, it proposes new expectations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rural labor.

**Key words:** Huang Yanpei; vocational education; rural labor; new cultivation model

# 从理念到实践:越南职业教育服务工业化现代化的新趋势研究

许正伟,马光林,苏满鸾

(南宁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广西南宁 530001)

**[摘要]**越南将职业教育确立为服务国家工业化现代化的重要战略支点之一。本文从发展理念、育才机制和实施路径等探讨越南职业教育的新发展。教育理念确立了“六个明确”指导思想、构建了多维高质量发展体系,并将软技能、碳信用纳入职业教育标准。育才机制通过创新专业设置、提升社会认可与完善教育体系来提升人才质量。实施路径通过国家战略引领、国际合作和数字化转型推动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越南职业教育改革成效显著,为其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关键词]**职业教育;职业人才;越南;工业化现代化

**[作者简介]**许正伟(1985—),男,黑龙江虎林人,南宁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硕士生导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中越教育比较。马光林(2002—),男,重庆人,南宁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苏满鸾(1999—),女,广西南宁人,南宁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民委“一带一路”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东盟职业教育研究中心专项资助重点课题“越南职业教育的最新政策和发展动向研究”(项目编号:DMZJZB202301)。

**[DOI]** <https://doi.org/10.62662/kxwxz0210020>

**[中图分类号]** G719.3

**[本刊网址]** [www.oacj.net](http://www.oacj.net)

**[投稿邮箱]** [jkw1966@163.com](mailto:jkw1966@163.com)

越南积极融入世界,国际地位不断上升,已成为全球关注的热点区域之一,并且处于人口红利的黄金时期,丰富的人力资源成为实现国家工业化现代化战略目标的关键突破口。2024 年,越共中央总书记苏林指出,“教育是新时代的首要国策,实现民族腾飞新纪元目标的首要任务是集中培育社会主义新人”。在此战略导向下,职业教育在培养高素质、高技能人才方面的关键作用日益凸显,逐渐成为越南推进工业化现代化的重要支撑。

## 一、越南职业教育发展理念的转型

### (一)“六个明确”的指导思想

革新开放以来,越南职业教育指导思想经历了显著变迁。革新开放初期主要聚焦于干部队伍建设方面。如越共七大和八大政治报告在提及职业教育时主要围绕干部培养问题,尚未形成完整的职业教育思想。进入新时期,越共十三大是越南职业

教育的重要转折点,提出“适应经济结构转型、技术革新和工业革命 4.0,发展优质职业教育”的战略导向,逐渐确立“六个明确”指导思想。第一,政治任务定位。将革新发展职业教育明确为政治任务,凸显其在国家战略中的重要地位。第二,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确立职业教育在人力资源开发中的主导作用,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第三,推进改革事项。认定革新职业教育是越南融入国际社会的重大紧迫任务,需优先推进。第四,现代化发展路径。明确职业教育向开放、灵活、现代、高效且国际化的发展方向转型。第五,市场结合原则。坚持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需求、就业保障、可持续发展紧密结合的办学准则。第六,资源倾斜政策。重点加强对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边境海岛等特殊区域的职业教育资源投入。指导思想的转变表明越南职业教育从单一的干部培养迈向全面服务国

家战略,为推动工业化现代化奠定思想基础。

## (二)“多维体系”的高质量发展

越南构建了涵盖培养机构、培养目标、培养形式、课程设置、教材编写及实践教学等多维度完整的职业教育体系。在培养机构上,致力于现代化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根据 2024 年第 1569 号《首都河内规划 2021—2030 年,2050 年愿景》决议,越南以打造国际化且互联互通的高质量职业教育体系为导向,建设国家级职业教育与培训实践中心,推动职业教育的社会化现代化进程,促进职业教育机构的转型升级与资源优化整合。在培养目标上,紧密围绕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培养职业人才,以实现各领域人才的均衡布局与协调发展。2024 年第 73/KH-UBND 号的《职业教育工作规划》强调,要将职业教育、职业培训与创造就业机会、经济发展、社会保障等工作进行统筹规划,确保职业教育紧密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在培养形式上,聚焦职业教育关键领域,针对不同层次和需求提供多样化职业教育路径,满足个体职业发展的多元需求与社会供需的动态要求。在课程设置上,遵循社会发展实际需求原则,因地制宜开发职业教育课程。以太平省为例,依据本地产业特色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开发长短期相结合的职业教育课程,提升职业教育对地方经济的支撑作用。在教材编写上,关注技术专长、企业管理和软技能的培养,部分省份能够根据投资者的需求统筹编制职业教育的教材。在实践教学上,一方面积极与投资者协作,为实践活动筹集充足的资源;另一方面加强与生产单位的合作,开展深入现代化生产线的专业实践培训,提升实际操作能力,实现职业教育与产业实践紧密结合。

## (三)“软技能”和“碳信用”的新标准

随着全球化和数智化的深入推进,职业发展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拓展,软技能和碳信用因其对劳动者职业竞争力的提升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作用,在职业教育领域的重要性愈发凸显。越南顺应时代趋势,将二者纳入职业教育标准体系。软技能是劳动者在现代职场高效履职、职业进阶的必备非技术要素。越南职业人才的软技能培养相对滞后,Greeni-Park 公司总经理 Nguyễn Trần Phong 指出“越南职业教育存在许多需要克服的局限性,尤其

是软技能”。为此,越南启动职业教育软技能发展项目,在全国 30 多个教育机构开展软技能教育试点,预计会将软技能科目纳入职业教育课程体系,重塑越南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在碳信用方面,作为面临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双重任务的发展中国家,越南将碳信用引入职业教育标准,对推动经济社会的绿色低碳转型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越南职业教育及时增设碳排放管理、碳市场交易、低碳技术应用等课程,助力学生洞悉碳信用基础理论、市场运作机制及技术应用推广策略等。将软技能与碳信用纳入职业教育新标准,越南有望培育出大批综合素质过硬、可持续发展能力卓越的技术人才,为推动工业化现代化提供人才支撑。

## 二、越南职业教育的育才机制创新

### (一)专业设置优化:适应性调整与创新性布局

越共擘画了 2025、2030 和 2045 三个关键阶段的发展战略目标体系,紧密关联越南民族腾飞的诉求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内在逻辑,衍生出优质人才的需求框架,在职业教育方面采取以下优化调适:一方面,前沿领域布局,契合新产业新技术,设置职业教育新专业。鉴于新兴产业的不断涌现和人才需求的动态演变,越南职业教育秉持“优先考虑新领域、新产业和新技能”的“三新”原则设置新专业,确保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需求同步发展。《2024 年职业教育目标与任务》指出“聚焦半导体芯片生产、氢能、碳信用等前沿新兴产业,深度开展新专业创设工作”。例如,随着新能源汽车市场份额的攀升,越南职业院校迅速将相关教学内容融入课程体系,并与 Vinfast 等企业合作,培养新能源领域专业人才,精准对接新产业人才需求。越南通过专业动态调整,削减陈旧专业、拓展新兴专业,增强职业人才的就业竞争力与环境适应力,提升越南职业教育的技术内涵,推动其现代化发展。另一方面,国际化专业拓展,响应国际产业转移,开辟职业教育新领域。随着国际产业链加速转移,亚洲区域成为产业转移的重要承接地带。其中,半导体产业作为战略性产业,在全球产业链重构进程中占据关键地位,成为国际产业布局的焦点领域。2024 年,越南总理亲自主持半导体产业人才培养专题会议,深刻剖析全球产业链转移的机遇与挑战,明确指出人才是把握历史机遇的核心要素。基于此,越南依托现有职业教

育平台,整合相关领域的人力资源,大力拓展半导体职业技术培训体系,加快完善政策和机制,着力培养高质量的职业技术人才。

## (二)社会认可提升:技能核心与传播策略

越南将发展职业技能确立为职业教育的核心价值取向,强调通过提升劳动者的技能推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一方面,整合传播策略,从社会认知层面来看,越南采用整合传播与多元参与策略,重塑职业教育形象。在信息传播上,积极顺应媒介融合趋势,整合电视、广播、互联网及社交媒体等多种传播渠道,构建全方位的宣传矩阵。在叙事传播方式上,分享优秀师生的成长历程,从情感与理性层面双管齐下,破除社会对职业教育的偏见。在多元主体参与上,积极开展全国性的优秀职业教育学生表彰大会、教师授课比赛、创业大赛等活动,并设立4月10日为劳动技能日。这些举措为社会各界提供了参与职业教育的广阔平台,使民众在实践参与中深化对职业教育价值的理解和认可。另一方面,提升国际认可度,通过开展国内外培训、学术交流等活动,构建职业教育教师专业发展共同体,提升其教学水平与专业素质。根据世界经济论坛(WEF)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指数(GCI)调查数据,越南在基于企业评估的职业教育质量指数上显著提升。2023年越南得分为4.82(7分制),较2022年排名上升8位,超过了预设提升5位的目标,在东盟地区仅次于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这一数据彰显了越南职业教育改革的成效,反映出社会、企业对职业教育的认识发生了积极变化,为职业教育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推动了职业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 (三)教育体系完善:社会认可驱动下的多层次融合式发展

越南积极推动职业教育体系的完善,在提升社会认可度的基础上推进融合式发展。一方面,建设全层次职教体系,培育高质量职业技术人才。越南坚持“大职教”理念,加强职业教育招生工作指导,不断完善涵盖短期、初级、中级和高级的全层次职业教育体系,大力培养各类职业人才,以满足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需求。突出表现为明确招生目标,实现职业教育的广覆盖和深投入。以2024年河内市职业教育为例,招生目标为235000人且各层次分布明确,如高级层次26000人,中级层次30000人,

初级层次和短期层次(3个月以下)179000人。初级和短期职业教育培训人数占比较高,能快速响应市场对特定技能的急切需求,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鲜活动力。另一方面,创新“9+”模式,推进职普融合发展。越南“9+”创新型教育模式在教育分流与职业教育质量提升上发挥着重要作用。第522/QĐ-TTg号《2018—2025年普通教育职业指导和学生分流方案》明确规定部分学生在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后,可以直接进入职业教育系统。越南劳动、荣军和社会部副部长Đỗ Năng Khánh指出:“2023年职业教育的招生已经呈现出积极趋势,在分流问题上释放出积极信号。”“9+”模式的核心价值在于多途径促进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社会教育的深度融合,具体措施包括实施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相互认可。“9+”模式致力于打破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之间的制度性壁垒,建立学分互认、学时换算、学历衔接的融合机制,有效提升职业教育的社会认可度与吸引力,为学生提供更为多元的升学路径与就业渠道,拓宽人才发展道路;同时促进职业教育与社会教育的相互融通,主要体现为职业教育机构与用工企业的深度合作,构建“学中做,做中学”的实践教学体系,不仅提升了学生的实践能力与就业竞争力,也满足了企业对高素质技能人才的需求,实现了校企双方的互利共赢。

## 三、越南职业教育发展的实施路径

### (一)国家战略引领:政策驱动与顶层设计

越南通过国家战略引领,推动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一方面,明确战略规划与政策支持。越南将职业教育列为国家战略,明确其服务于国家工业化现代化的定位。越共十三大报告强调“推动发展优质职业教育机构”,将职业教育纳入国家人力资源开发战略,提出“制定针对因经济结构转型、技术革新和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影响而进行职业转型的劳动者进行再培训的机制、政策和措施”。第2239/QĐ-TTg号《面向2045:越南职业教育战略(2021—2030年)》提出,2026—2030年要建立一个高效、高质量、高现代化管理能力的职业教育体系,接受职业教育或培训的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75%,其中,45%的劳动力拥有职业教育文凭或培训证书,努力使越南职业教育体系达到“东盟4国”和G20新工业化国家水平。越南政府还颁布了第2222/QĐ-

TTg号《实施2025与展望2030职业教育与培训数字化转型计划》,从基础设施、课程体系、师资培训、质量评估等方面制定具体目标,为职业教育满足工业化现代化需要提供政策支持和行动指南。另一方面,推动机构重组与资源整合。为实现国家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满足经济社会转型对高素质技能人才的需求,越南积极推进以审查、安排与重组为核心的职业教育体系改革。当前越南职业教育面临诸多挑战,包括职业教育机构规模庞杂、设置缺乏科学性、资源分配不均衡、教学质量参差不齐等。截至2024年6月,越南全国职业教育机构数量约为1900所,机构布局与专业设置缺乏科学规划,导致资源的分散与浪费。为了扭转这一局面,越南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改革职业教育,重点对公立职业教育机构展开全面检查与重组。通过综合评估,撤销或合并重复建设、效率低下的职业教育机构,实现重新布局和优势资源的整合。从改革成效来看,与2017年10月25日第19-NQ/TW号决议中的数据相比,2023年统计数据显示,越南公立职业教育机构数量下降了14%,减少了181所。这表明越南对职业教育机构的审查、安排与重组工作已取得初步成效,使得职业教育机构网络规划更加精简高效,职业教育发展更加科学合理。

### (二)开展国际合作:资源引入与共建共享

越南践行深度融入国际战略,推动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一方面,直接引进外智,推动职业教育创新发展。在国际职业教育发展格局中,越南凭借独特的地缘优势与政策环境,已然成为国际职业教育培训机构运营的理想市场之一。越南秉持主动的战略姿态,引进国外前沿的职业教育理念、多元化的教学方法及精细化的管理经验,不断充实本国职业教育体系架构,如在国外职业教育转让的基础上,引入“大行业观”(đại sũnghê)的职业教育理念,推行连贯式职业教育培养模式,为职业教育发展注入新活力;同时引进优质的国外职业教育课程,开拓更宽泛的职业选择范畴和更广阔的学习机会空间,如越南国际理工学院从德国直接引进22套专业课程,在1037名职业教育学生中开展试点,学生毕业后可获得越南和德国高等职业教育院校联合颁发的双证书。另一方面,借助国际合作,完善职业教育发展模式。越南积极推动职业教育国际化发

展,通过与国外知名职业教育机构建立合作关系,不断完善本国职业教育发展模式。以“2024年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论坛暨中国—越南职业教育产教联盟成立大会”为例,中越两国高校、企业代表围绕“互通·互融·共享·共赢”主题,深入交流职业教育国际交流合作经验,推动多项合作项目落地。其中,广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与越南同安高科技学院签约共建“中国—越南新能源汽车现代工匠学院”,标志着中越职业教育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人才培养与技术交流开启新征程。在国际合作的广度拓展上,越南还积极与美国、日本等国开展交流,形成多元化职业教育国际合作新格局。

### (三)数字化转型:技术赋能与体系革新

越南积极适应数智时代发展,推动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一方面,加强基础设施与平台建设。在国家工业化现代化与数字化浪潮的推动下,越南通过完善制度体系实现职业教育与数字化的深度融合。越南职业教育总局局长Trương Anh Dũng明确指出“积极推进职业教育对信息化的应用,促进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首先加强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越南通过构建高速稳定安全的网络环境,提供丰富的数字化教学资源,普及智能化教学设备,支撑职业教育教学模式变革创新,为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打造了坚实的硬件基础。其次,搭建数字化职业教育平台。越南积极整合国内外优质资源,精心编写特色数字化教材,开发符合行业标准的教学软件,建设统一共享的数字资源平台,努力实现资源高效配置和最大化利用。越南信息选择技术股份公司Lê Công Thành指出:“AI技术发展迅速,被视为新一代工人的必备技能,越南人必须掌握AI技能。”该公司与越南人力资源供应集团签署合作备忘录,聚焦AI技能培训,为越南劳动者适应数智时代需求提供支持。同时,积极建立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信息安全保障。越南以《职业教育法》等战略文件为基础,构建数字化转型的法律政策框架,越南通信传媒部通过开发信息技术、传播安全知识、指导遵守相关法规等方式,探索建立信息安全管理制

数字资源投入,从政策制定、师资队伍建设、教学设施改善、教学科研强化等方面入手,全面提升职业教育教学数字化建设。如通过制定认证和评估标准(第 05/2024/TT-BLĐTBXH 号规定),提升教师数字化素质,培养教师数字化、智能化技能,构建适应数字化转型需求的教师队伍,为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提供强大师资。健全评价反馈机制是顺利推进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关键环节。越南部署 LMS 学习管理系统,构建师生交互式学习环境,实现教学进度的精准管理与科学评价。同时,强化数字化教学的监管与评估,建立多元化评价机制,从制度层面保障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质量,推动职业教育持续创新发展。

#### 参考文献:

- [1]越共十三大文件(第一卷)[M]. 河内:真理出版社, 2021:137.
- [2]国家民委“一带一路”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J]. 东盟职教研究简报,2024(3):18.
- [3]代以平,冯珊珊. 越南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举措及启示[J]. 教育与职业,2023(1):74-81.
- [4]宋秋英. 越南社会工作职业教育的发展脉络、特征与启示[J]. 职业技术教育,2022,43(9):68-75.
- [5]2023 年越南职业教育领域的发展方向[EB/OL]. <https://www.molisa.gov.vn/baiviet/239531>, 2024-1-16/2025-7-30.
- [6]越南职业教育的任务与解决方案[EB/OL]. <https://dantri.com.vn/giao-duc/8-nhiem-vu-va-giai-phap-cua-giao-duc-nghe-nghiep-trong-nam-2021-20210205213630111.htm>, 2021-6-2/2025-7-30.

## From Theory to Practice: New Trends in Vietnam's Vocational Education Serving Industrial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XU Zheng-wei, MA Guang-lin, SU Man-luan

(School of Marxism, Nann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ning Guangxi 530001, China)

**Abstract:** Vietnam has identified vocational education as a key strategic pillar in serving the country's industrial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new developments in Vietnam's vocational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development philosophy, talent cultivation mechanisms, and implementation pathways. The educational philosophy has established the "Six Clarifications" as the guiding principle, building a multi-dimensional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system while incorporating soft skills and carbon credits into vocational education standards. The talent cultivation mechanism enhances the quality of personnel through innovative program design, increased social recognition, and an improved education system. The implementation pathways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through national strategic guidanc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Vietnam's vocational education reforms have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 providing solid talent support for its industrial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Key words:** vocational education; skilled personnel; Vietnam; industrial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